詩•詞•坊

清詩的春夏

周黎庵 著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中華書局（香港）



周黎庵，名劭，浙江鎮海人，1916年生。東吳大學法學士。十七歲開始寫作。三十年代末歷任《宇宙風》等雜誌編輯，並出版《吳鈎集》、《華髮集》等著作。四十年代中期，在上海執業律師。五十年代起復迴出版界擔任編輯。現任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及上海書店出版社編審。編有中國古典文學詩文集數十種。

詩·詞·坊

清詩的春夏

周黎庵　著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中華書局（香港）

（蘇）新登字 006

詩 詞 坊

主　編：金性堯
策　劃：鍾潔雄

書　　　名：清詩的春夏

著　　　者：周黎庵
出　　　版：江蘇古籍出版社
合作出版者：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發　　　行：江蘇省新華書店
印　　　刷：上海市印刷七廠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80519－340－1/I·79　　定價：　8.00 元

主編的话

繼《小說軒》之後而有《詩詞坊》的問世。

1988 年夏，香港中華書局的編輯前來找我，希望我主編一套《詩詞坊》叢書，規格略如《小說軒》。商談之後，隨即擬訂選目和寫作要求，不久又徵約了一些作者。所謂寫作要求，其實也別無新鮮的話。這些作者對古典文學雖素有研究，每冊字數也不多，卻也要求以獅子搏兔之力來完成。主編的重心在搭配選題，物色門當戶對的作者。寫法上的細節，則不拘一格，求同存異。但有一點，我是一再強調的：這套叢書是在香港出版。

近幾年來，京滬等地，對中國古典詩詞的賞析評介的出版物，出得很多，對讀者不無金針度人之功。這套《詩詞坊》有些不同，特點是在二千字幅度之中，環繞某一主題，聲東擊西，由此及彼，或大題小做，或長話短說，間也用“横向聯繫”的方法，就像一幅山水畫，由遠峯高聳而綴以朝曦翠藹、水聲禽語。用《小說軒》的前言的話，便是“漫話式”。以漫話式評介詩詞是否得體，當然見仁見智，世上仁智之見本來永難調和，所以只能算是一種嘗試；成敗利鈍，只有交由讀者檢驗。叢書本爲集體產物，但西崦暮齒，既編又寫，承此任務，故又不能不略抒個人感受。

詩歌原非中國所獨有，繪畫亦如是。外國原有詩畫

同質之說，所謂詩爲有聲之畫，畫爲無聲之詩，但把詩題在畫上，使兩者相映成趣，卻是中國詩壇畫苑之特創。一幅陳列在展覽館裏的名畫，又經過名家的題詩，你賞覽之後，還忍心匆匆離開？還有中國詩中的對仗，也是獨特的擅長，不能簡單地斥爲桎梏，“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旛出石頭”，前者隱含哲理，後者概括史事，卻對得何等工巧而又自然。其中就有詩人高度的智慧、創造的甘苦，卻不是憑點小聰明做得出來。我只是隨手舉了這兩點，說明中國古典詩歌在技巧上的成就。當然，對仗、平仄這些技巧，也因漢字本身與外文不同之故，但不管怎麼說，總是獨具的一種特色。我們固然不能像過去國粹派那樣，凡是祖宗傳下來的東西就是寶貝，就可以沾沾自喜，但傳下來的東西而又打不倒、砸不爛、搶不走的就應該愛護，應該傳播。我們應當有勇氣揭露家中的醬缸，但更有責任將先人積累的、擲置的智慧遺產一五一十地經之營之。

詩之源爲賦，詩之流爲詞爲曲，馬致遠的“小橋流水人家”、關漢卿的《單刀會》、王實甫的《西廂記》、湯顯祖的《牡丹亭》，其本質實是詩。讀了《單刀會》，再讀蘇軾的《赤壁懷古》詞，更激起人的大江東去、迴腸蕩氣的陽剛之感。古人常以詩詞歌賦並稱，就因四者都有內在的聯繫。從心理學角度說，凡是表現內在的美好善良、富於想像力而能誘導人們快感的，便具有詩的質素，如說詩意、詩化，即具有審美上的效果。質言之，詩的世界便是和庸俗的、低級的世界相對立的。

這套叢書，就是企圖讓讀者的心靈多一點詩的溪壑、美的潤澤，間或窺見歷史的窗口，讓千百年前的詩人和你娓娓對話，將已逝的流光重新喚回到眼前；如同林語堂先生在《讀書的藝術》中一節說的，“一本古書使讀者在心靈上和長眠已久的古人如相面對，當他讀下去時，他便會想像到這位古作家是怎樣的形態和怎樣的一種人。孟子和大史學家司馬遷都表示這個意見。”雖然《詩詞坊》不是古書，只是擷述古書中的人物和作品。

每本書的篇幅不多，當着朝陽初升，或燈火乍明，以至車廂舟艙之中，忙裏偷閒，隨手開卷，偶有會心，掩卷冥想，詩情畫意，忽來心頭，這便是對我們最大的慰勉，如果發現書中的錯誤，及時惠示指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亦正符合《詩經・鶴鳴》詩人之原旨。

金性堯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日於上海

目　錄

清詩的四季（代序）……1
明耕清穫……7
四十年中四百詩……11
顧門高弟傅山……17
亭林弟子潘耒……22
江左三大家……27
兩截詩人錢謙益……32
崑山歸奇……37
秀水朱彝尊……43
吳偉業的梅村體……47
白髮填詞吳祭酒……52
秦淮三名妓……58
柳如是的詩才與志氣……63
宋派三詩人……69
煙波釣徒查慎行……74
煙草詩人厲鶚……79
宣城南施……84
萊陽北宋……88
鹽筴出詩人……91
流放詩人吳兆騫……95
滿族詩人……101

捉刀詩人高士奇……106
捉刀詩人續談……111
斷送功名到白頭……116
世變滄桑拙政園……120
冒襄與董小宛……125
陳維崧與水繪園……129
萊陽兩姜……132
虞山兩馮……136
談狐說鬼的詩人……140
淸詩異葩金聖嘆……145
嶺南義士屈大均……149
《南山》詩獄……154
王士禛的神韻詩說……159
《秋柳》詩……163
袁枚的性靈詩說……168
沈德潛的格調詩說……173
翁方綱的肌理詩說……177
淸詩夏季三大家……181
掌心雷詩人王曇……184
黃景仁的盛世悲歌……187
糊塗詩人鄭燮……193
後 記……198

清詩的四季（代序）

話說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刊行過一本英文月刊，叫作《天下》（這是《莊子》一書中的篇名，語意雙關），是用英文寫作的，但寫的都是有關中國文化的篇章。該刊的其中一位編輯是吳經熊，他曾是第一任的上海臨時地方法院院長。吳氏不但精通法律，對中西文學亦造詣很深，在《天下》月刊中，他和林語堂可稱雙璧。《天下》刊行至多不過二年，到八・一三事變停刊，其鼎盛時期是 1935 年冬及 1936 年，林語堂英譯沈三白的《浮生六記》，中英對照，按期連載，轟傳一時，他自己也爲芸娘的柔情發了魔。吳經熊則寫了《唐詩之四季》（或稱《唐詩的四季》）。

吳經熊從小受過深湛的古典文學訓練，對詩詞愛好甚篤，他別出心裁地把中國古典文學中最具特色的唐詩，巧不可諧地分成春、夏、秋、冬四個時期，用自然界氣候的變化和人們對它的變化所產生的感受，來說明唐代詩人和作品的類別和異點。

時至今日，我所藏的《天下》月刊早已蕩然無存，無法在半個世紀後取出來重讀一遍，所以也不能引徵原文，只是就記憶所及，略述它的一些概況罷了。

唐詩的春季，即是唐的前期詩，即是今體詩經過一個時期的孕育，到此時已成就了一定的體裁和格局，爲

此後唐詩的發揚光大奠下結實的基礎，可說是唐詩的孕育期；也合乎春天孕育萬物的自然規律。它的代表人物當然是陳子昂、張九齡、杜審言、宋之問、沈佺期和“初唐四傑”的王勃、盧照鄰、駱賓王、楊炯等。

唐詩的夏季，是唐詩的鼎盛時期，如一般所說春播、夏耕、秋收、冬藏，其實夏天也包有一些收穫在內。經過唐代初期的一番播放、孕育，到了唐玄宗開元年間（713），便出現了百花齊放的燦爛時期，衆香國裏，繁花如錦，著名的詩人李白、杜甫、王維、岑參、李頎、孟浩然、高適、王昌齡、常建、王之渙等等，無不在這一時期嶄露頭角，造成一部最動人聽聞的鼓吹。這是中國文學史上，不，也是世界文學史上最燦爛的一頁。

但是到了秋天，便是經過安史亂離，從唐肅宗至德年間開始，唐詩雖然因春、夏兩季的播種耕耘而收穫到豐碩的成果，但到了那時，究竟已是金風蕭瑟，葉落氣涼，不如盛世的景象了。雖然這個秋季的中唐，也有過劉長卿、韋應物、錢起、盧綸、韓愈、劉禹錫、孟郊、賈島、張繼、白居易、李賀、姚合等傑出的詩人，究竟是蟬曳殘聲，景象已迴不同於往時了。尤其是在這個時期，出現了郊寒島瘦，詰屈聱牙的樊宗師，那是明朗的夏季所決不會產生的；連最重要的詩人韓愈，也難免有以文爲詩之誚，他們的作品，就不能讀了令人迴腸蕩氣，心境愉快。

到了晚唐，那自然更不必說了。雖然日本詩人大沼枕山說“一種風流吾最愛，南朝人物晚唐詩”，那當是

指李商隱、溫庭筠和杜牧而言，但李商隱《無題》詩寫得那麼晦澀，典故用得那麼堆砌，那豈是盛世之音所宜有，何況那些作品，正合着後人“獺祭”之誚，無論是天、地、人，總缺少一個“籟”字。

以上所述，是吳經熊對唐詩評判和賞析的基本論點，然後分成四個不同的時期和季節詳盡地予以介紹和描述。主要的當然是翻譯他們的作品，因爲讀者的對象是懂英語的異國人士，而《天下》月刊的使命和宗旨，正是在溝通中西文化。

吳經熊的《唐詩之四季》曾否在《天下》月刊刊登完畢，我已記不起來，可能是冬季部分尚未登畢而八•一三戰事已在上海爆發了，《天下》就此廢刊。吳經熊也就避地香港，而且興趣和信仰也大有改變，他成爲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致力重新翻譯《新約》和《舊約》的工作。

在這裏還要介紹一位天才人物徐誠斌，此人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是一位知名的人物，他是香港有史以來第一位華人擔任香港教區的主教。他於四十年代末畢業於上海著名的聖約翰大學，以三年的時間唸完四年的學分而畢業，這在該大學是罕見的。那時上海已成爲“孤島”，卻仍能托租界的庇護執行政府的命令。我在那時正編輯和林語堂、陶亢德合作的《宇宙風》半月刊，得以廣交那時聚集在孤島上的各方人士，大概是通過柳存仁教授的介紹，和他相識。

說句老實話，聖約翰大學當然是教會大學中的著名大學，但對中國文學卻並不注重。徐誠斌的中文程度那

時並不很高明，但他卻有志要在中文上用功夫，自告奮勇地要翻譯吳經熊的《唐詩之四季》，我當然鼓勵他，允許他在《宇宙風》半月刊上連載，並答應替他作文字上的潤色。聰明的人眞是無所不能，不久便文通理順，天才橫溢，好像佛家了悟一般。以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到牛津去面壁四年，不但莎士比亞研究的造詣連英國學人都欽服，就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也使我心折。這樣一個天才，竟天不假年，恐怕連“中壽”都沒有，便歿在香港區主教的任上，準確的逝世年月我都不知道，他曾否結過婚，是否遺有子女，都無從獲悉。只有他翻譯過的《唐詩之四季》，在半個世紀後，還深深印在我腦中，作爲我與徐誠斌友誼的紀念。

中國是一個詩之國，方塊字固然有很多的缺點，但寫詩塡詞，以至做楹聯作四六，卻是拼音文字所無可比擬的。不過詩經過唐代的二百多年，實在已被唐人做盡做光了，後人要繼續做下去，當有望塵莫及之嘆。所以宋詩雖然別樹一幟，究無法與唐人抗衡，以後元、明兩代，雖代有傑出詩人，他們對中國古典文學燦爛光輝貢獻的代表作品，並不是詩，而是（宋）詞、（元）曲、（明）小說了。

依我個人的愛好而言，在詩的領域中，只有淸人的詩，尙能繼承唐人的衣鉢，不論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可上摩唐人之壘；當然也可以這樣說：“但是不逮遠甚。”

吳經熊英文著作和徐誠斌中譯的《唐詩之四季》，給我一些靈感和啓發，淸詩是否也可以和唐詩那樣，用一年中四個季節來加以分期研究呢？我越想越覺得可

能，於是我把淸詩也加以依樣葫蘆。

我把淸詩也分成春、夏、秋、冬四個時期：

春季：順治元年（1644）——康熙六十一年（1722）。

夏季：雍正元年（1723）——乾隆六十年（1795）。

秋季：嘉慶元年（1796）——道光二十年（1840）。

冬季：道光二十一年（1841）——宣統三年（1911）。

在愛新覺羅氏統治中國的二百六十八年中，在詩的領域中，春季佔七十八年，夏季佔七十三年，秋季佔四十五年，冬季佔七十二年。其中春季是順治和康熙兩朝。夏季是雍正和乾隆兩朝。秋季最短，是嘉慶一朝和道光朝的三分之二，爲什麼把道光朝分割爲兩個季節呢，因爲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上的劃時代時期，在政治史上是中國從那時起開始進入近代史的階段，在文學史上則從那時起迄 1919 年五四運動時止，被稱是近代文學史時期。從道光二十一年開始到宣統三年辛亥革命止，便是淸詩的冬季了。

淸詩的春季與夏季，是淸詩的鼎盛時期，共達一個半世紀，佔整個淸代二分之一以上，所有傑出的詩人和作品大部分薈集在這個時期中。在這本小書中所要寫的，便是這個時期的詩人和他們的作品（包括理論），因之，我命名這本小書爲《淸詩的春夏》，即是淸詩的上半期詩的意思。當然，“春、夏”這兩字好拗口，不

及“春秋”兩字那樣響亮。不過，意義確實不同，我敘述的淸詩的季節，不能把 1840 年後的淸詩作爲淸前期詩來寫；而且“春”、“秋”兩字，歷來是用作另一種意義來解釋，並不如“春”、“夏”是確定不移地說明季節，因此也便確定下來，作爲本書的書名了。

明耕清穫

清詩的四季中的春天，是清詩中豐收的季節，它等於唐詩四季中的夏天，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都產生在這個時期。清詩人中最傑出的人物，卻產生在春天，顧炎武、錢謙益、吳偉業、王士禛、朱彝尊、查愼行，都屬於由明入清的清初詩人。

爲什麼清和唐有這些不同呢？有兩個主要的原因。首先是近體詩到唐初才形成完備的體裁和格律，它還屬於奠基的階段，要過了一個時期才能發揚光大。清詩則不然，自從晚唐即唐詩的冬季以來，詩經過七個半世紀的落寞，到了十七世紀的中葉，已有了回潮的趨勢。尤其是明代三百年中前兩個世紀的擬古摹仿的敗筆，雖經公安、竟陵救之以空靈疏放而莫能挽回。到了萬曆年間，政治和軍事雖已腐敗到了極點，而文學尤其是詩，卻從薪燼中爆發出了新的火花。大批淩駕於明人之上的傑出詩人，都是誕生在萬曆末期以至明亡的四朝之中。

中國歷史易代之際人物的斷代隸屬問題，素來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史學上如此，文學上亦如此。以明代詩人而言，高啓爲朱明一代詩人的冠冕，但是他生於 1336 年，死於 1374 年，充其量在明代只活了六、七年，怎能把他算爲明人呢？但對他的隸屬似乎從來不曾有過爭論，皆說高啓應該是元人而不是明人。對於顧炎武卻

有不同的看法，說他應該屬於明人而不是清人，這是和權威的史學著作《清史稿》作了相反的意見。沈德潛的《清詩別裁集》也沒有收顧炎武的詩，近人鄧之誠的《清詩紀事初編》，則採取完全不同的看法。

其實顧炎武一共活了七十歲，1644 年明朝亡國時他只三十歲，除了幼年和少年時代，假定他十五歲開始能做詩的話，他在明代不過生活了十五年，而在清代卻活了四十年，主要的詩作和其他學術著述都完成於後四十年中，似乎不能不算他是清人。說他和陳子龍一樣是明人，似乎於理未充。

但對易代之際人的斷代隸屬問題，歷來好像有了一個框框或尺寸，是要看他是否曾入仕新朝或應科舉爲依據。高啓受了明太祖的招致，年月雖不長，和楊維楨（鐵崖）不同，也只好說是明人；侯方域僅僅中了個副榜，便只好入於清人了。顧炎武在清代統治四十年中，始終以明諸生自居，從未向清廷稱臣，且避地西北，逃避秀才的歲試，因之，說他是明人也很有理由。

本書不擬在這些問題上多加探討，只是從詩的內容上着眼。現存的顧氏遺詩，差不多全是入清後所作，那末，把顧氏作爲清詩的開山鼻祖，似乎也並非沒有理由了。

除了顧炎武之外，其他清詩春天的重要詩人，差不多都生長於明末，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江左三大家不必說，其他名家如王夫之、黃宗羲、施閏章、宋琬、屈大均、朱彝尊、王士禛等等都是如此；只有查愼行生於順治七年（1650），可以算爲地地道道的食毛踐土的

淸詩人。

上面所說的一些詩人，都孕育、成長在明代季年，明末萬曆以來政治的腐敗、軍事的失利，都對詩人的作品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他們面對着國勢的衰弱，民亂的蜂起，災異的連綿，更重要的是帝王殉國，小朝廷覆滅，淸人入主，這和過去兩個半世紀雍容華貴的三楊台閣、擬古摹倣的前後七子，以及空靈疏放的公安、竟陵有完全不同的創作環境，他們的作品自然不期而然的符合現實手法，這和天寶安史之亂產生出杜甫等偉大詩人有前後相似之處，不可不謂中國文學史上一個劃時代的轉折點。這是淸詩的繁盛在春季而不同於唐詩在夏季的另一原因。

艱苦困難環境中孕育成長起來的詩人，其豐碩的成果，卻隨着政治上的易代落入淸朝。自然，這種收穫只是抽象的東西，並不是什麼實物；而且這些詩人，雖然入仕淸朝或應新朝的科舉，但他們故國之思未泯，民族的隔閡未除，所詠的詩作，往往流露出對故國故君的懷念，或借故迹以憑弔，或假往事而傷感，很少有對新朝事物有所描寫與歌頌。甚至指名直斥，不稍隱晦，不但不爲自己的頭顱，也不爲他們的九族着想，孤忠直節，雖九死其猶未悔，眞不愧爲詩國中的精英，中國古典文學中的瑰寶。像顧炎武、屈大均等人都是如此。

春季的淸詩如此繁榮，是不是政治氣候的溫暖孕育他們的生長呢？當然不是。事實上是政治對這個剛走出牧幕不久的民族來說，還不曾成熟；他們不能單靠強矢長戟來定天下，對外行的東西還得借重於漢人；這樣就

會造成較爲寬容的政治氣候，即使詩人們有些“狂悖”的句章，他們也不聞不問，事實上也無法聞問。要是把春季詩人的作品放在清詩的夏季，碰到政治上已完全成熟的雍、乾兩朝，那殘酷到了極點的文字獄，一定要提早數十年了。

明代季世的艱苦耕耘，給從遊牧帳幕中剛走出來的清朝展開了自唐以來所未有的詩國盛世，從而摘取明代耕耘所產生的豐碩果實，成爲中國古典詩歌最後的一個時代，也就是僅僅次於唐詩的時代。即使到了清詩的秋季和冬季，軍事和政治上受到西方列強炮艦的猛烈衝擊，思想文化上也飽受歐風美雨的強有力的影響，但是這些時期的詩人還是多得不勝枚舉；其作品之多，也是歷代所罕有的。到了黃遵憲、丘逢甲、梁啓超等作品一出現，詩的正統便要禪讓給白話詩了。

四十年中四百詩

清詩的春季，首先要提到顧炎武（亭林）。不但其人之氣節和學術，是三百年來第一流人物，即以詩而論，也不愧爲清詩的冠冕。後人給他概括起來的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成爲中華民族屢經患難而終能復興的象徵，所以首先推崇的應該是亭林先生的道德氣節。次之，則是他的學術論著，《天下郡國利病書》、《日知錄》、《肇域志》等等，都是擲地有聲的大著作。再次之，方才提到他的詩文，所謂詩文乃其餘事而已。《清史稿》把他列入《儒林》而不是《文苑》傳中人物，當也是持這個理由。

像這樣一個堅持反清，四十年中從未忘卻恢復故國之念的孤臣孽子，應該是清朝統治者所深惡痛疾的人了。然而，二百多年之後，於光緒季年，爲了緩和民族矛盾，出於張之洞等的建議，把他和另兩位行事相似的大儒黃宗羲和王夫之，明詔從祀文廟。清代從祀兩廡的典禮，比前代要嚴格得多，連同上述三位，也只有湯斌、陸隴其、張伯行等七、八人，詩人中有這樣一位享受殊遇的大儒，這在歷代是罕見的事。當然，除了他，船山先生王夫之也是清詩春季中的一位知名詩人，他不但寫詩，還是詩論家，清人的第一部詩話《薑齋詩話》便是他的作品。



顧炎武詩如其人，嚴謹方正。

顧詩數量並不多，現存的不過四百多首，以四十年中寫下四百首，每年平均不過十首，或許有許多作品湮滅不傳。不過從他的傳世之作來看，實在是精練到了極點，從來不曾有過像其他詩人一樣的應酬唱和之作，而且他天性莊重嚴謹，所以更沒有旖旎的風懷。他的作品，不論是擬古、詠史、即景、弔祭等等，都是環繞着抗拒清朝、恢復朱明這個大主題開展着筆的，內容可歌可泣，筆端字挾風霜，硬語盤空，悲壯蒼涼，達到思想性與藝術性的高度結合，這與他在《日知錄》中所說“詩主性情，不貴奇巧”一語是言行一致的。清人汪端《明三十家詩鈔》論顧炎武詩云：“其詩憑弔滄桑，論多激楚，茹芝採蕨之志，黍離麥秀之悲，淵深樸素，眞合靖節、浣花爲一手。”可謂確論。

顧炎武天性方嚴，不苟言笑，據說面貌醜陋古怪，且眇一目，和同邑歸莊（玄恭）有“歸奇顧怪”之稱。但是據那時寫眞名手禹之鼎所畫顧氏六十造像看，倒還並不有什麼異人之處，並且造像照例不畫人的殘缺，所以雙目仍然炯炯有神。他有三個嫡親的外甥，都出仕清廷掇巍科做大官，大外甥徐乾學（健庵）對人說，他最怕舅舅的眼光，所以總是低着頭避開。顧炎武老是瞧不上這個奔走聲勢、招權納賄的親戚，但也沒法斷絕這門至親，只是諄諄告誡他的學生切莫與之來往。他自己則不得已，每至京師，只好屢住其家。至於其他人呢，錢謙益是他的同社同郡，他在明代就瞧不起這個“東林浪子”，甚至他陷獄之時，若能得錢氏片紙便可出獄，他都不屑爲之。而負東南重望的復社領袖吳偉業更隻字未

見提及。朱彝尊本來是他志同道合的好友，曾追隨他在西北共圖恢復中原，及朱氏一應博學鴻詞而任翰林院檢討後，即與之交絕，再不提起這個好友了。他最得意而且最親密的弟子潘耒（次耕）也和朱彝尊同時被薦，而且勢要波及他，他凜然在《寄次耕時被薦在燕中》一詩中寫道："爲言顧彥先①，惟辦刀與繩！"這是何等的決絕，簡直沒有給人進一句話的餘地！

他在明亡以後清朝統治之下所寫的詩，簡直是"昌言無忌"，毫無畏懼的直書，像《感事》七首中的：

> 傳聞阿骨打，今已入燕山。毳幕諸陵下，狼煙六郡間。邊軍嚴不發，釋使去空還。一上江樓望，黃河是玉關。

"阿骨打"是金太祖的名字，清人入關前一度自稱"後金"，這裏當是泛指入關的清朝統治者。"毳幕"、"狼煙"是歷來指斥外來入侵異族的貶詞，他信筆拈來，別無隱諱，若置諸雍、乾朝文字獄大興時代，這是不堪設想的禍事。

他爲了逃避崑山土豪劣紳的逼害，更重要的是不願參與秀才例應參與的歲試，明亡之後，便問道北上，在山東勾留一個時期之後，便轉向西北，從此便不再履故土一步。這當然含有重要的用意，江南民風柔弱，雖有鄭成功、張煌言經營閩浙海隅，但他覺得西北土地淳厚，民風強悍，完全可作爲匡復的根據地，所以一去四十年，到死後才得骸骨還葬故土。他不但是學術家、詩文家，而且還是軍事家、經濟家，傳說他每到一處，必

然置地產妻室，不久又捨而他去，這種如陶朱公三致千金的故事，顯然和他深思遠慮圖謀恢復的計劃有關。

章炳麟在《太炎文錄續編・顧亭林遺事》中，說他創辦票號，爲山西人壟斷一代錢匯業務的創始人，他的主要助手便是著名醫家、書家又是詩人的山西陽曲人傅山（青主），又說他還是會黨的創始人，不知有何根據。太炎先生在倡言革命排滿時代，他當然引顧炎武爲同調。

他在清廷統治下的四十年中，不知多少次拜謁南京的明孝陵和京師附近昌平州明代諸陵，如《再謁天壽山十三陵》一詩，作於順治十七年（1660）二月，那時他已是四十八歲了。永歷雖尚流落於西南，恢復大業的希望渺茫，清廷的統治也日益嚴密，他所作的詩也只好



顧炎武屢次拜謁南京明孝陵，追憶前朝遺思。

暗晦一些，居然想出一種“韻目代字”的辦法來掩蔽清吏的耳目，其作用有似現代的密碼。當然這種原始的密碼，只要識破它的規律，立刻可以破譯無遺，但在那時究竟還能起一些作用，甚至後來的亭林詩箋校者也不知詩句的用字是什麼意義。

① 晉陸機《爲顧彥先贈婦》詩，有“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語，意思是京城中骯臟空氣，把人的清白之軀都沾污了，顧氏借此語表達自己的志節。

顧門高弟傅山

潘耒固然是顧炎武（亭林）的弟子，傅山則生於明萬曆三十四年，年齡要長亭林七歲，自然不會屬籍爲亭林門人。不過，傅山對亭林傾倒備至，而且與亭林合作多年，是他的得力助手；所以稱傅山爲顧門高弟，也並不爲過。當然，和潘耒是有區別的。

顧炎武在崑山受土豪劣紳的逼害，且要逃避著籍諸生的清朝歲試功令，不得不離鄉北行，從山東轉向西北，終身未再履故里一步；直到身後方萬里歸櫬，葬在



傅山

一位心繫故國的遺民詩人。

崑山。他的西北之行，以居住山西爲時較久。他的目的是考察西北形勢，物色人才，徐圖恢復故國。當然這等大事，他一個人孤掌難鳴，必須有人合作，在當地人士中，主要的便是傅山、王弘撰等，而尤以傅山爲最親密。此外，也有志同道合的人，間關萬里到西北和他會合，共商大計，其中就有屈大均、朱彝尊、潘耒等。屬於清詩春季的詩人。但可惜的是朱、潘兩人後來去應博學鴻詞制科，任清廷翰林院檢討，這使得顧炎武異常痛心，從此他再不提起朱彝尊的名字；但對潘耒因爲關係特別親密，且原諒他處境的艱危，只好容忍下來。

傅山，字青主，山西陽曲人，少年受知於袁繼咸，袁是明末內外力戰以身殉國的忠臣，崇禎中遭誣被劾繫詔獄，傅山伏闕上書頌冤，義聲震天下，世稱爲義士。甲申之變，他變服作道士裝，隱居不出，顧炎武到晉，兩人志同道合，自然很容易走在一起。

傅山不但是清詩春季的一位重要遺民詩人，而且對書畫、醫藥等技藝也非常精通，書畫評論家把他列入“逸品”，他還精通小學，閻若璩《潛丘箚記》說亭林極稱其識字，能給小學大師顧炎武稱道“識字”兩個字，正是極爲不易的事。顧炎武在《廣師篇》中評他說：“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可說是稱譽備至。

傅山最知名的還是他的書法，而且還有一些神奇的傳說。據說有一天他正在揮毫作書，偶有客來，輟而離去接待，他的幼子善效父書，便把筆將全幅寫成。傅山回來忘記自己不曾寫完，竟辨不出下半幅並非自己所



傅山書詩軸

書，不覺失聲驚嘆，長吁道：“吾書中氣已絕，我其不久於人世矣！”後來他的兒子告訴說是他續成的，傅山更是潸然淚下；這個兒子不久竟然夭折了。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說，傅山著有《霜紅龕集》十二卷，“子眉詩附焉”，這個傅眉是否那個寫字的兒子，當然已無從考證了。

《霜紅龕集》流傳尚多，傅山的書畫卻極爲珍罕難見，得之者奉如拱璧。據說太原傅山所設的藥肆名“衛生堂”，其市招即爲傅山親自所書“衛生堂藥餌”五個大字（見阮葵生《茶餘客話》），這塊招牌幾乎和北京嚴嵩所書的“六必居”同樣著名；但現在是否尚存，則不得而知了。

章太炎《書顧亭林軼事》一文中有一奇說：“近聞山西人言亭林嘗得李自成窖金，因設票號，屬傅青主主之。始明時票號規則不善，亭林與青主更立新制，天下信從，以是饒於財用。淸一代票號制度，皆亭林、青主所創也。”在海通之前寧波、紹興人所開的錢莊還未崛起時，中國的整個金融業便操縱在山西人手裏，即使到了十九世紀最後一年，八國聯軍攻陷京師時，北京由山西人開設的“四大恒”票號還是最響亮的票號牌子。誰知道在淸代首創此業的人，竟是顧炎武和傅山！

這裏抄錄傅山的詩兩首：

好音無一字，文采會賁岩。正選高松坐，全忘小草鑱。天涯之子對，眞氣不吾緘。祕讀《朝陵記》，臣躬汗浹衫。

　　河山文物卷胡笳，落落黃塵載五車。方外不嫺新世界，眼中偏認舊年家。乍驚白羽丹揚策，徐領雕胡玉樹花。詩詠十朋江萬里，閣吾傖筆似枯槎。

這兩詩都是贈顧炎武的，是念念不忘君國，地道的遺民之詩。但是康熙十八年薦開的博學鴻詞制科，也放不過這位遺民，而且西北的官吏薦賢的手法實在很不高明，簡直鬧得不願與薦應試的遺民死去活來。傅山朝夕受顧炎武熏陶，當然不肯應試，清廷還是不放過他，未應試即授以中書舍人官職。他不受而歸，這總算對得起他的老朋友。

　　他的遺民生活眞是夠苦的，全祖望《鮚琦亭集·傅先生事略》說："以連染遭刑戮，抗詞不屈，絕粒九日幾死，門人有以奇計救之者，得免。然先生深自咤恨，以爲不如速死之爲愈。而其仰視天俯畫地者，未嘗一日止。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始以黃冠自放，稍稍出土穴與客接。又自嘆曰：'彎強躍駿之骨而以佔畢朽之，是則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滅者矣。'"可見得他並不自安於詩人生涯，他想的是躍馬橫戈、效命疆場，可惜壯志無法實現。

　　最後的日子裏，他起了一個極不平常的別號，叫做"公之它"，確實很難理解他命名的意義何在，但總有深意存在是一定的。

亭林弟子潘耒

在顧門弟子中，潘耒特別受到亭林青睞，這有好幾重原因，首先是潘耒的天分高，從少便有神童之譽；次之他在從亭林之前，曾師事徐枋（俟齋），徐是亭林所欽佩的節義之士。再則潘耒是從迢遠的山陽到西北來受業的，使得亭林更爲刮目相看。但更主要的因爲潘耒是潘檉章的胞弟，亭林最悲痛吳炎、潘檉章的被難，對潘耒自有愛屋及烏之意。所以談潘耒不得不首先敘述潘檉章的事跡。

清朝的文字獄，是中國文網史上最爲殘酷的，但開國之初，滿人不通漢文，且方以力征奠定宇內，更無餘力及於文事，所以遺民懷貳之士，還可以寫作詩文，暢所欲言。及定鼎二十年之後，即康熙二年，方才注意到文字之反側，並不比武力差弱，遂開始大加壓制。以後歷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爲時達一百三十多年，慘酷的文字獄，把漢族讀書士子，壓得萬馬齊喑透不過氣來；這樣才算鞏固了清朝的統治。其中最早最慘酷的一起大獄；便是湖州莊氏的明史案。

莊氏名廷鑨，目盲而負富名，其實是一個妄人，很想著書立說以自見，乃購得鄉人故明朝大學士朱國楨《明書稿》改爲己有，並延請當時知名之士與修訂之列。潘檉章和吳炎都是吳江人，年雖僅二十餘，已負史

莊氏史案本末卷下

吳興朱國禎號平涵明朝熹宗時輔臣撰明史幾百
卷藏於家至順治時其家已落子孫不能守以其稿
本質之莊姓者莊故富豪能文墨廣聘諸名士續成
之而更布之板其所續烈皇帝朝諸傳於我 朝龍
興事有犯諸人不察也盛行之坊間聞吳興有縣令
挾其書與其為難而莊不即荅於是首之朝 天子
震怒逮繫若干人如查繼佐陸圻范驤皆浙中名宿
其他姻黨親戚一字之連一詞之及無不就捕毋逮
一人則其家男女百口皆鋃鐺同縛杭州獄中至二

清初的“莊氏史案”株連慘烈，受殃者不計其數。

學高名；其實潘、吳兩人並未見到莊廷鑨的原稿，只是在刻本上列有他們的姓名。案發之後，莊氏當然闔族受殃，與參訂之列的名士死者七十餘人，而且還要牽累妻兒遠戍極邊。潘耒的胞兄潘檉章便這樣蒙冤而死，一妻兩子充軍到遼寧開原東的尙陽堡。潘耒其時年方弱冠，雖未牽連定罪，但一家如此遭遇，旦夕都在恐怖憂懼中。

湖州史獄發生時，亭林遠在西北，非常注意這件大獄，對潘、吳兩節士之冤死，義憤塡膺，毫無忌諱的高唱：

> 永嘉一蒙塵，中原遽翻覆。名胡石勒誅，
> 觸眇苻生戮。哀哉周漢人，罹此干戈毒。去年
> 王子年，獨向深岩宿。

石勒與苻堅都是亂華的胡人，忌諱甚多，苻堅眇一目，凡臣下有“殘”、“缺”、“偏”、“少”、“無”、“不具”等字樣，都遭殺戮，這和朱元璋因爲做過和尙，凡是“光”、“禿”等字，都要避諱，統治者之殘酷，前後如出一轍。但莊廷鑨是一個妄人，他滿以爲盲人都是左丘明，所以立志要修史，殊不知朱國楨著書時對建州是敵國，自可暢所欲言，而莊廷鑨則已處在建州的統治之下，實在也太大膽和糊塗。《榴龕隨筆》云：“如書中所云王某孫婿，即淸之德祖，所云建州都督，即淸之太祖也，而直書名。又云‘長山衄而銳士飮恨於沙燐，大將還而勁卒銷亡於左衽’。如此之言，散見於李如柏、李化龍、熊明遇傳中，又指孔（有德）、耿

（仲明）爲叛。又自丙辰迄癸未，俱不書清年號，而於隆武、永歷之即位正朔，必大書特書，其取禍之端有如此。”

莊氏之禍，累及潘氏一門，播來自十八歲逢此變故後，間關萬里到西北去找尋顧炎武問學，便是希望於學業之外，還可以得到一些同情與安慰。據同時人歸莊《觀梅日記》：“吳生開奇者，亡友潘力田（檉章之字）之弟，吳赤溟（吳炎之字）之門人也。二君以國史事被殺，家徙塞外，故生改姓，竄於山中，改姓吳，蓋從母。”但徐枋《潘母吳太君壽序》則言潘耒改姓名吳琦，大概琦是名而字開奇。潘耒這樣的變姓易服，草間偷活，懷着國仇家恨，投着亭林這樣名師，當然傾身相事，眷戀師門，不敢忘德了。他的《遂初堂集》有《己酉冬自淮陰抵平原呈亭林先生六十韻》五古長詩有云：“素絃哀絕調，枯樹慘同株。戢影依慈母，含辛對阿奴。向人言慷慨，伏枕淚模糊。三冬曼倩惜，一榻幼安俱。汲古慚修綆，攻文愧小巫。孤生原譾劣，曲學況牽拘。窺豹非全目，雕蟲豈壯夫！夙懷期負笈，雅志有懸弧。碩德惟劉董，儒宗有鄭盧。龍門雖自峻，蠡測肯辭愚。問字侯芭去，傳經服虔呼。贏糧非早暮，命駕敢踟躕。汶野黃雲凍，沂山白草枯。隻身經雨雪，遠道涉崎嶇。捧杖微誠遂，橫經鄙願輸。駑駘還賴策，蓬草或堪扶。斧削資良匠，陶鎔付大爐。垂恩無以報，感激一微軀。”師徒之情，灼然可見。亭林有詩答之云：

> 生平不擬託諸侯，吾道仍須歷九州。落落

> 關河蓬轉後，蕭蕭行李雁飛秋。爲秦百姓皆黔首，待漢儒林已白頭。何意故人來負笈，艱難千里媿從遊。

喪亂之餘，更是融合無間。但多年之後，到了康熙皇帝有了成熟的政治手腕時候，他改變對漢族士人只採高壓的政策，不再揮舞刀斧，於康熙十八年開博學鴻詞科，要心懷反側的漢族士人投入他的彀中，潘耒也不能免於應薦赴試，開首亭林當然愷切勸阻，但後來了解到潘耒的處境艱險，不像他人尚可以推託，也只好由他。這樣潘耒便以布衣中試授爲翰林院檢討，與朱彝尊、李因篤、嚴繩孫合稱四大布衣。在職數年中，朝廷制誥版碑文字，無不出諸其手。但國仇家恨，始終盤桓在他的心頭，所以不久即辭官還鄉。他的詩集叫《遂初堂集》，便是遂我初服的意思。

江左三大家

清詩人中有兩個“江左三大家”的稱號，清詩的春季和夏季各有一個。夏季的遠不逮春季，因之知名度亦不如春季三大家遠甚。春季的便是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三人，而夏季則是乾隆朝的詩人袁枚、蔣士銓、趙翼三位。這裏說的只是春季的三個詩人。

所謂“江左”，便是在地理上靠長江下游左面一些區域，在那時的政治地理屬江南省，即南直隸，自從司馬氏東晉南渡時開始便名爲江左，一直沿用迄今。錢謙益是江南常熟人，吳偉業是江南太倉人，龔鼎孳則爲合肥人。大家不要以爲合肥是在安徽，地處江北，不應該稱江左；實則明代迄清康熙中葉，並未有安徽、江蘇兩省的名稱，兩省實際都屬於江南省，康熙中分割爲兩省建置，但還有許多地方相沿未改，如兩江總督這個名稱一直沿用到清亡，尙是主管江南、江西兩省的政務而不稱“三江總督”。

這三個人牽連在一起，確實很有見地，首先，他們都是掇高第的詩文家，按次序錢謙益是萬曆三十八年一甲三名進士，吳偉業是崇禎四年會元和榜眼，龔鼎孳也是崇禎七年進士。

他們三人有很多相同點，首先都是著名的詩人，在政治上說來，又都是身事兩朝的貳臣，還有並不太重要

的相同點，便是各擁有一位紅粉知己。但更重要的一點，便是這三大家在淸詩的春季中的地位和對其他三季淸詩的影響。

錢謙益是明淸兩代詩文承先啓後的樞紐人物，他在這個時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容輕易抹煞的。吳偉業則自創一格，人稱“梅村體”，影響後人極大。龔鼎孳與他們兩位相比，不免相形見絀，把他稱爲三大家之一，恐怕不大相稱；只是因爲他素來廣通聲氣，頗負愛士之名，所以大家都捧捧他罷了。龔鼎孳著有《定山堂集》，詩、詞、文也都臻上乘，但對當時和後世的影響自不太大，對於錢謙益和吳偉業，將會另列專章來談論，所以在本文中主要是論述此公。

龔鼎孳在三大家中，不獨年輩較後，才學亦有所不逮，但是他的命運卻是最好的。投降了李自成後，又投降了多爾袞，以後一帆風順，終於做到一品尙書的高官，死後且得“端毅”的美謚，比錢、吳要優越得多。

他是崇禎七年的進士，連庶吉士都選不上，只是個榜下知縣，到湖北黃州去當一個縣令，在張獻忠攻楚的時候，倒能以書生知兵，登陴守備，和張敬軒打了一仗，“詩成橫槊指黃巾，戰定摩崖看赤壁”，少年氣槪，頗爲不凡。他和吳偉業結識，便在那時。吳偉業以翰林主試湖北，龔鼎孳以甲科知縣調簾爲同考官。主考與同考雖非上下屬，但地位相去很遠。過了十八年，吳偉業在家隱居了十年又出仕淸廷，龔鼎孳已官居極品，尙是黑頭。吳偉業相形見絀，不得不趨奉結託，鼎孳當然不會虧待這位前朝老名士，兩人詩酒唱酬，極友朋之樂；

當然也不免感慨往事，追念往昔。詩人在這種場合中，往往是借歌伎、伶人或樂師之事來發洩他們的慨懷，這也是受到杜甫贈李龜年一首著名七絕的影響。明末有一個著名伶人王紫稼，崇禎末季他正當盛年，已名動公卿，吳偉業有一首《王郎曲》七古，很爲他增加不少聲價。國亡後三人重逢京師，王紫稼年已老大，卻仍操故業，龔鼎孳在筵席上口占云：

> 薊台霜高舞柘枝，當年楊柳尚如絲。不堪重唱梅村曲，腸斷王郎十五時。

那時重逢的三個，王紫稼已年近三十了，尚不得不作花落江南的李龜年，流落湖湘的李師師，賣餅爲生的李和兒，正襯託出江左三大家中兩大家的身世感慨，眞堪和杜工部的名句並傳。這位王紫稼後來在吳門竟被巡按御史李琳先杖斃獄中，此是後話。

龔鼎孳雖然是兩朝的貳臣，但總算有點良心，而且天眞得很，認爲滿漢一體，應該無分畛域，在三百年前還不曾有“五族共和”之說時，實在是無知得可笑。他屢次在滿洲大人和異族統治者面前爲漢人爭取權利，當然不會討好，還算是他運氣，僅僅得到降職的處分，從一品大員連降十幾級爲上林苑監。倘若不巧，與他同樣愚蠢的陳名夏和陳之遴，便得一個殺頭一個充軍。而且上林苑監秩雖低卑，卻可以欽使的身份出使廣東，並不久即官復原職。在三大家之中，他是在新朝中最享榮華富貴的一個。

江左三大家雖然成就不同，後人對他們的批評各有

《初歸居巢感懷》

失路人歸故國秋，
飄零不敢弔巢由。
書因入洛傳黃耳，
烏爲傷心改白頭。
明月可憐銷畫角，
花枝莫遣近高樓。
臺城一片歌鐘起，
散入南雲萬點愁。

——龔鼎孶

高下，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對於詩，他們都是崇尚唐人，對於宋詩及元、明以來的剽古擬古的萎靡詩風都取反對的態度，他們和顧炎武及明代遺民一起，共同上掃王、李、前後七子、竟陵、公安這些流派的頹風，下啓有淸一代三百年間重振詩風的盛局。龔鼎孶得附錢、吳兩大家之驥尾而入江左三大家之列，也是他的幸事。

龔鼎孶的最可取和膾炙人口之處，是他愛士，眞所謂愛才若渴，所以他在當時爲衆望所歸，淹沒了他兩次投降的壞名聲。他死後有人以詩弔唁，說是“寄聲縫掖賤①，休作帝京遊”，便是說此人死後，天下寒士，再無以受嘘吹，可不必再去京師了。

① 縫掖（腋），寬袖單衣，古代儒生所服，後因以作儒生的代稱。

兩截詩人錢謙益

“兩截詩人”是筆者替錢謙益（牧齋）取的稱號。他不但人是兩截人，詩也是兩截詩，所以稱之爲“兩截詩人”，旣論其人，也論其詩。

人是兩截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乾隆皇帝在《國史列傳》中特辟《貳臣傳》，主要是爲他這樣的人而設。詩何以也成了兩截詩？這卻是好像天公有意替他安排的，而實際上是偶然巧合的事。

錢謙益（1582—1664）活了八十三歲，他的主要詩文集，是《牧齋初學集》和《牧齋有學集》。《牧齋初學集》刻於明崇禎十六年（1643）秋，由他大名鼎鼎的弟子瞿式耜梓印。《牧齋初學集》刻成僅僅半年功夫，明代就覆滅了；以後入淸的二十年中所寫的詩文則名《牧齋有學集》，這不是天生地設的巧爲安排嗎？所以他的人，上半截是明人，下半截是淸人；詩也是如此，寫成完全不同的兩截詩。

他在《牧齋初學集》中所寫的詩，主要突出三個內容，首先是對建州邊患的關切，他以書生自詡知兵，甚至要慷慨請纓，募兵北上和滿洲決一死戰；次之則是對宦官和權奸的痛恨和對抗擊張（獻忠）、李（自成）及外寇將帥的歌頌，完全是一個忠君愛國的正面人物形象。不料甲申三月，天崩地裂，他雖幸而先遭革職南歸

閒居，不曾參與大順入京迎降之列；但南渡的小朝廷也只支撐了一年，當那“荒唐王爺”豫通親王多鐸攻下南京之時，他竟是迎降的文臣班首。以後，便要過他的下半截人和下半截詩的生涯。

不過他的下半截人和詩都做得並不徹底，有些首鼠兩端，即是他既然歸順清朝，做了清廷的官，暗底裏卻還在和南明的殘餘勢力交通往來，這是他身後政治上已很成熟的乾隆皇帝所最痛恨和不能容忍的。所以在乾隆四十年乾隆施展橄欖枝和大棒兩面手法時，把橄欖枝插在陳子龍等一些爲朱明殉葬的孤臣孽子身上，而大棒卻在錢謙益的頭上飛舞，把他貶到十八層地獄，永遠不能翻身。不但《牧齋初學集》和《牧齋有學集》從此沉淪了一百多年，直到辛亥革命前夕的上海租界上，才有書賈敢把這兩部著作重印出來。乾隆還明詔任何著述，凡是有錢謙益作序文的，須一律抽燬，否則，連這些本集也要列爲禁書。

寫了錢謙益這麼多貶詞，話說回來，他的詩文總究是明、清之際主要的大家，他在當時文壇和文學史上的地位是未容輕易抹煞的。詩在朱明三百年中是一個低谷期，始終在前後七子擬古的桎梏中徘徊，雖經公安三袁、竟陵鍾、譚予以排擊，但他們本身的力量實在也很脆弱，未能蕩盡那股積垢多年的濁流，以致直到末季，復社、幾社等文學團體，依然抱着七子的旗幟不放，直到錢謙益出而主持東南文壇，大加廓淸，才使當時詩壇面目一新，給後來淸代的詩文開創一個嶄新的局面。他主張詩須本性情，導意志，又須從動蕩的時代、連蹇的

遭遇中迸發而出，反對摹倣，反對幽眇淒冷、脫離現實的寫作傾向，強調鋪張排比的大家格局的手法，並且別具慧眼地提倡向健康的民歌學習，這些主張和理論，都在他的詩文中得到實踐。整個《牧齋初學集》中的詩文，大都是有現實內容的作品，迥異於朱明一代枯僵的詩。入清以後，便在清詩的春季中大放異彩，而且管領羣芳，在春季的百花園中，獨佔鰲頭。

錢謙益是萬曆庚戌（1610）一甲三名進士（俗稱探花），三十歲即登朝列，但仕途坎坷，屢躓屢起，總算仕至卿貳（侍郎），但爲了枚卜（推舉入閣）遭到嚴譴。南渡召用，升任禮部尙書。後爲降清的文臣班首，並在招撫東南諸郡立了功勳，照例至少要給他一個尙書的原官，像福王的大學士王鐸，聲名才具不如他遠甚的人，在新朝依舊當相國，可錢謙益卻只得一個崇禎朝的原官禮部侍郎，這是使他最耿耿於懷的。所以任職不久，便辭官還鄉閒居。

在常熟拂水山莊絳雲樓幽居的歲月中，既不甘寂寞，又心懷怨恨，不免勾起了故國之思，這是很可以理解的心情。他有兩個極其著名的弟子，都是值得後人景仰的民族英雄，一個是瞿式耜，那時正在西南輔佐南明督師；另一即名垂宇宙的鄭成功，也正在金門、臺灣結合浙東的抗清力量張煌言、張名振等窺伺東南，力圖匡復。尤其是瞿式耜，是他的同鄉，而且共過患難，一起監禁在詔獄；那時雖遠在桂林，還時常有信使往還。對鄭成功雖然師生之誼爲時甚短，但因地域較近，不但時通音問，而且還想去親自犒師；甚至以河東夫人的首

餉，準備爲鄭、張裝備一支五百人的師旅，即所謂“五百羅漢”。這些都見於他的詩集中。他所以這樣幡然變計，恐怕和河東夫人的態度很有關係，這裏姑且不談，到有關柳如是的章節中再說。

甲申之變，他已是望六之年，據說關帝聖君在扶乩下壇時曾告訴他，他的壽命只有五十七歲。到了老而未死，不免責問聖君爲何並不靈驗，聖君乩筆答曰：“爾自不死，吾其奈何？”這樣的譏諷嘲謔當然是出諸蘇松一帶士人之口，實在使錢謙益難以承受，他心理上的矛盾與痛苦眞是難以表達的。

到了晚年，生計也捉襟見肘，連視爲第二性命的宋槧《漢書》也不得不忍痛以賤値讓給謝三賓。雖有紅粉知己爲伴，終於在絳雲一炬，平生珍藏的宋梓元刻都化爲雲煙，這位凄惶的半截老人便伴着兩截詩卷走盡了人生的歷程。

這裏抄錄錢謙益最負盛名的三首七言律詩《和盛集陶落葉詩》：

秋老鍾山萬木稀，凋傷總屬劫塵飛。不知玉露涼風急，只道金陵王氣非。倚月素娥徒有露，履霜青女正無衣。華林慘淡如沙漠，萬里寒空一雁歸。

《金陵秋興之一次草堂韻》：

雜虜橫戈倒載斜，依然南斗是京華。金銀舊識秦淮氣，雲漢新通博望槎。黑水遊魂啼草

地，白山新鬼哭胡笳。十年老眼重磨洗，坐看江豚蹴浪花。

《後秋興十三之一》云：

海角崖山一線斜，從今也不屬中華。更無魚腹捐軀地，沒有龍涎泛海槎。望斷關河非漢幟，吹殘日月是胡笳。恒娥老大無歸處，獨倚銀輪哭桂花。

崑山歸奇

清詩的春季詩人中，有兩位明遺民都是江南崑山籍，他們是顧炎武和歸莊，人稱“歸奇顧怪”，所謂“奇”、“怪”，便是不正常、與人不同的意思。他們不但詩文奇怪，行事奇怪，而且相貌也很奇怪。秉體受之父母，相貌奇怪並不足奇，其詩文行事之奇，其實也並不奇，只是他們身感易代之痛，滄桑變革，欲圖恢復不能，處世自多特行，而影響詩文，當然是硬語盤空，慷慨淋漓，不屑作一般語。

歸莊（1613—1673）字玄恭，是明代大古文家歸有光的曾孫，他的名號也非常奇特，明亡後改名祚明，或自稱歸藏、歸妹、歸乎來、元功、園公、懸弓、爾禮、普明頭陀、鏖鏊鉅山人，這些奇怪名號和後來的龔自珍很相似，兩人的詩文和行事也頗有相仿之處。

顧炎武雖被稱爲“顧怪”，其實並不怪，他的生性非常嚴肅，相貌的確古怪。歸莊則奇而且狂，行事與詩文都沒有顧炎武那麼嚴肅，在復明活動失敗暨絕望之餘，他便佯狂遁世，心中必然是非常痛苦和出於萬不得已的。

歸莊於詩文外，尤善草書，酒醉潑墨，興酣淋漓，得張旭遺意，往往在其所居大書聯語，駭世人耳目，有一聯云：

入其室，空空如也；
問其人，囂囂然曰。

世傳尙有膾炙人口的一聯：

兩口寄安樂之窩，妻太聰明夫太怪；
四鄰接幽冥之宅，人何寥落鬼何多。

歸莊的復明運動，是身體力行，並非徒託空言，在江南起事不成，則北走徐海，與萬壽祺（年少）、閻爾梅（古古）等相結合，並和顧炎武取得聯絡，圖謀在西北起事推翻清朝的統治。這當然也不能取得成功，就此僧服佯狂以終世。他的詩文充滿民族氣節和愛國思想，對清兵南下，姦盜殺掠的暴行以及降清的漢臣，他都予以無情的揭露和諷譏，但對迎降清兵的錢謙益則婉予勸譏，希望他能幡然悔悟。對其他降淸漢臣則罵之爲狗，嘗與萬年少唱和作《狗詩》六章，其四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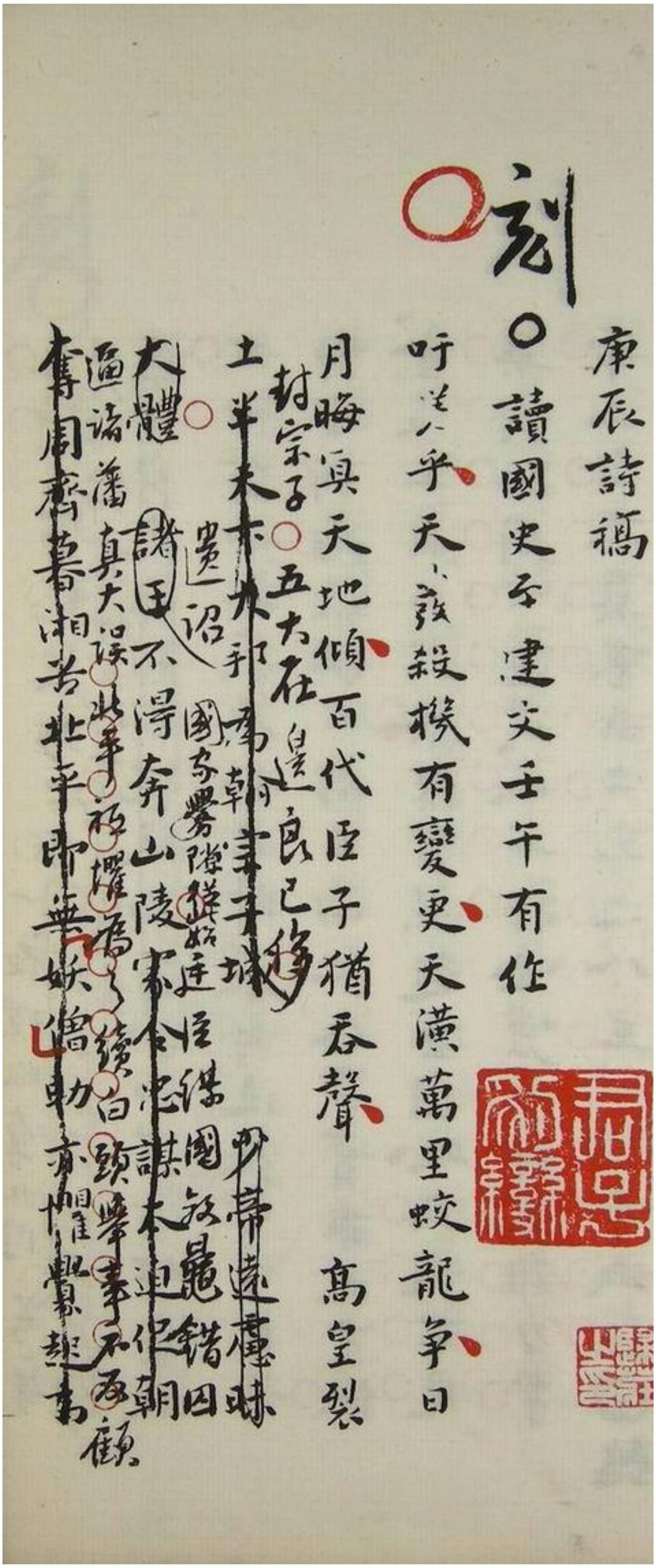
相驚有國狗，岌岌冠方山。足識京都路，聲聞茅舍間。張牙終遇敵，搖尾亦何顏。好逐劉安去，仙家列上班。

他在“劉安”下自注比攝政王多爾袞，可謂大膽之極。

順治中，流誦一篇長達數千字的《萬古愁》曲子，相傳曾流入宮禁，淸世祖福臨很激賞此曲，每膳常命樂工歌以侑食。當時不知道作者是誰，後來經過魏禧和全祖望等的考證，確定爲歸莊的作品，文章的風格和作者爲人，完全和歸莊符合，大致不會錯。此曲用屈原的筆



歸莊詩奇、行奇、貌奇，怪不得有“歸奇”之稱。



歸莊手稿

法，從盤古開辟天地直敘到明清之際，瑰瓌恣肆，於古之聖賢君相，無不詆訶，而獨痛哭流涕於桑海之際，是與《離騷》、《天問》一類可以並傳的文字。因文長不能盡錄，只舉其所謂痛哭於桑海之際的數闋：

> 〔蛟龍泣〕痛！痛！痛！痛那十七年的聖天子掩面向煤山弔。痛！痛！痛！痛那詠《關雎》嗣徽音的聖母，屍撇在後宮門沒一個老宮娥私悲悼。痛！痛！痛！痛那掌上珍的小公主，一劍向昭陽倒。痛！痛！痛！痛那有令德的東宮，生砍作血蝦蟆。痛！痛！痛！痛那無罪過的二王，竟作了一對開刀料。痛！痛！痛！痛那受寶冊坐長信的隻身兒，失陷在賊窩裏。

這是朱明王朝亡國時宮中的一副慘狀，然後是清兵入關，佔據了北京：

> 〔變調〕宮庭瓦礫拋，陵寢松楸倒。但聽得忽剌剌一天胡哨，車兒上滿載着瓊瑤，馬兒上斜摟着妖嬈，打糧處處把脾兒燥。急得那些殺不盡的蠻子們一樣的金線鼠絛，紅纓狗帽，恨不得把都們便做個親爺叫。

這一闋是對清兵入關的控訴，忽剌剌的胡哨、脾兒燥、金線鼠絛、紅纓狗帽，以那時都是禁諱字眼，他毫無顧忌地大膽用了進去。清世祖也眞是寬洪大量，把歸莊對他及其同族的破口大罵竟用來命樂工歌以侑食，可見確

是欣賞歸莊的奇才。曲子的結尾是說到歸莊自己：

> 〔歸山早〕俺再不向小朝廷拜獻降胡表，再不向錢神國告納通關鈔，再不向衆醉鄉跪進精渾醪。拔盡鼠狼毫，椎碎陳元寶，萬石君已絕交，楮先生告辭了。俺自向長林豐草，山坳水嶠，一曲伴漁樵。

最後他唱：“您便是銀春作餌，金紫爲綸，漫天匝地張羅釣，呸！呸！呸！俺老先生擺尾搖頭再不來了。”

歸莊所作的詩文，身後散佚無存，道光以後，禁令稍寬，有多家爲之輯軼重刊，最近又搜輯遺詩遺文刊爲《歸莊集》，據今刊本於《萬古愁》曲子後存詩七絕一首云：

> 世事浮雲變古今，當筵慷慨奏清音。宮槐落葉秋風起，凝碧池頭共此心。

這首詩擬歸莊於唐代詩人王維，但與全曲情意不洽，而又違背歸莊原志，恐是後人聽說淸世祖命樂工歌以侑食的故事而作，是不應羼入歸莊的作品中去的。

秀水朱彝尊

清詩的春季，多用南北的地域來稱呼詩人，如“南施北宋”、“南查北王”、“北王南朱”。施閏章（愚山）和朱琬（荔裳）究不足以領袖南北兩大文壇；查愼行也只有趙翼獨力推崇，未見得會令人信服，只有朱彝尊才足和王士禛銖錙悉稱，分庭抗禮，不愧爲清詩春季的南北兩位大家，三百年來論詩者似乎沒有什麼異論。

朱彝尊（1629—1709）字錫鬯，號竹垞，晚號小長蘆釣魚師，浙江嘉興（秀水）人，爲明相國朱國祚曾孫。他既有宰輔的門第，又生在崇禎初元，甲申國破時，已是成丁之年，自然身切家國之痛，懷着抗清復明的志願，所以他的少壯時代，是以遺民自居的。劉師培把朱彝尊的一生分成四個時期：“以故相之裔，値板蕩之京。甲申以還，蟄居雒誦，高栗里之節，卜梅市之居，東發深寧，差可比迹。觀於《馬草》之外，仿僞滿之苛殘；《北部》之篇，弔皇陵而下泣，亡國之哀，形於言表。”這是指他少年的志節。“及其浪遊嶺嶠，回車雲朔，亭林引爲知音，翁山高其抗節。雖簪筆傭書，爭食鷄鶩，然哀明妃於靑冢，弔李陵於虜台，感慨身世，迹與心違。”這是說朱彝尊遠遊西北，與顧炎武、屈大均相結納，其時朱彝尊年已及壯，鑒於恢復無望，

壯志漸餒，顧炎武雖很器重他，引爲同志，但他已經有些動搖了。

到了半百之年，適逢淸廷對文士壓制之外，又加上籠絡的一手，於是朱彝尊“獻賦承明，校書天祿，文避北山之移，徑誇終南之捷。甚至軺車秉節，朵殿承恩，仕奔子雲，豈甘寂寞；陷周庾信，聊賦悲哀”。這是說康熙十八年己未擧行的博學鴻詞大科，朱彝尊以布衣膺薦赴試，取在一等第十七名，和一等第七名的李因篤、二等第二名的潘耒及二等末名的嚴繩孫四人號稱“四大布衣”，被授爲翰林院檢討的官職。這是朱彝尊的第三時期，態度已完全改變過來，所謂“西山蕨薇已精光，一隊夷齊下首陽”，他是連像吳偉業那般忸怩作態也索性不要了。

因爲他老壽，活到八十一歲的高齡，所以還有第四個時期，則是“後先異軌，出處殊途。冷落靑門，憶否故侯之宅；蕭條白髮，難沽處士之稱。此則後凋松柏，莫傲歲寒；晚節黃花，頓改初度者矣”。原來己未鴻博人物，以布衣而躋身淸華，翰林院編、檢是一般讀書人要幾十年佔畢寒窗，經過大小多少場考試才能獲得的，而他們輕易得之於朝夕間，當然會引起人們的妬忌，目之爲“野翰林”。由妬忌而排擠，不數年而鴻博人物遂空於朝廷。故說他“後先異軌出處殊途”，朱彝尊雖未仕明代，難與錢謙益、吳偉業並論，不會寫進《貳臣傳》中去，但“後先異軌”之譏，總難免有疚於心了。

在淸詩的春季詩人中，朱彝尊堪稱是一位多面手。他不但工詩，且於詞、文、學術，無所不通，而於詞之

一道，尤負盛名。正因他無所不通，致不能專精於一。同時負盛名的大家，如王士禛之詩及其創論神韻詩說，朱彝尊無之；查慎行之專宗宋詩，他則不名唐、宋，亦不能自成一格。好譏評人的趙執信，在《談龍錄》中雖不能不許評他爲大家，但說：“或問於余曰：阮翁（王士禛）其大家乎？曰：然。孰匹之？余曰：其朱竹垞乎！王才美於朱而學足濟之；朱學博於王而才足舉之，是眞敵國矣。他人高自位置，強顏耳。曰：然則兩先生殆無可議乎？余曰：朱貪多，王愛好。”

“貪多”，是趙執信對朱彝尊一針見血的兩字的評，貪多務得，是他最大的病處。稍後的詩論家趙翼對他頗持奇論，認爲“其詩初學盛唐，格律堅勁，不可動搖。中年以後，恃其奧博，盡棄格律，欲自成一家，如《玉帶生歌》諸篇，固足推倒一世，其他則頹唐自恣，不加修飾，究非風雅正宗”（《甌北詩話》）。這樣，雲松老人便要把他拉下“北王南朱”的寶座，而易云爲“北王南查”。

清聖祖對鴻博人物中的朱彝尊是特別優遇的，入值南書房，朝夕隨從，以從七品翰林院檢討而蒙京師賜第，是淸代三百年中的曠典，後來的一二品大員也難能有此殊榮。出典江南大省鄉試，是朱彝尊一生最得意之秋，但不久即以攜帶抄胥入大內抄錄進呈秘籍，被掌院學士牛鈕所劾，降一級出內廷。降一級是薄譴，然檢討是翰林中最低一級，若眞的降級，便是翰林院中的佐雜官了，所以不久雖即復官，終至意興闌珊，官場夢斷，只好還鄉去做小長蘆釣魚師。

朱彝尊的集子總名《曝書亭集》，他在嘉興建有曝書亭。其在任職淸廷之後，於康熙二十五年所刊詩集八卷，自題爲《騰笑集》，削刪自己過去“布衣”之稱，取孔稚圭《北山移文》中“南嶽獻嘲，北壟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之句以自嘲。

朱彝尊雖亦是經師，但尙沒有道學家架子，他婚於馮氏，爲馮鎭鼎長女，但對馮的幼女頗有戀情，寫過不少發魘的情詩，恐怕就是集中的風懷詩了。袁枚有《題竹垞〈風懷〉詩後》一詩，其序云：“竹垞晚年自訂詩集，不刪《風懷》一首，曰：‘寧不食兩廡特豚耳’。此黨言也。按元、明崇祀之典頗濫，蓋有名無考，附會性理數言，遽與程朱並列。竹垞恥之，託詞自免，意蓋有在也。不然，使竹垞刪此詩，其果可廁兩廡乎？亦未必然也。”詩云：

尼山道大與天侔，兩廡人宜絕頂收。爭奈升堂寮也在，楚狂行矣不回頭。

朱彝尊不作假道學態，當然獲得袁枚的好感而引爲同調。

朱彝尊晚年還有一樁有趣的故事，他性喜食鴨，夢見滿池都是鴨子，鴨倌告訴他都是供他食用的，於是恣意食啖，到了晚年又夢，則池中僅餘兩隻鴨子，自知天祿已盡，乃戒家人不再食鴨。不料病中其女來探視，深知老人食性，攜饋燒鴨兩隻爲獻，他一見，遂此謝世。此一故事與唐代李德裕夢羊如出一轍，附述於此，以供談助。

吳偉業的梅村體

詩歌中一種特殊與衆不同的風格，名之曰“體”。用一個“體”字來表示別具風格的稱謂，由來甚久，唐代的“元和體”、“長慶體”、“香奩體”、“長吉體”，以及後來的“鐵崖體”之類，都顯示“體”的主要詩人自行創造別具一格的詩風；到了明代，就不大叫“體”而稱爲“派”了，其實也是差不多的事情。

清詩的春季詩人中，也有一位重要詩人的作品被稱爲“梅村體”的，那便是江左三大家之一吳偉業（梅村）的詩。

所謂“體”，大都是指七言歌行而言，七言古風，最容易寫也最不容易工，所謂“易學難工”。本來詩與音樂是分不開的，但後來近體詩逐漸脫離音樂，成爲只能讀而不能唱，“旗亭賭唱”是唐詩的夏季詩人韻事，若是唐詩的秋季詩人韓愈、賈島、孟郊以至樊宗師的詩，有誰能卡着喉嚨去歌唱呢？像島、郊、宗師等這樣的人古往今來有的是，他們以古奧滯澀爲工，生搬古典及爛用奇僻怪事以炫己長，如唐代李商隱被人譏爲“獺祭魚”；但李商隱究竟是李商隱，不能出很多的李商隱，語所謂“學我者病”。明代七子擬古復古的作品是這種澀體的表表者，尤其是李攀龍的詩文，簡直令人無法卒讀；王世貞雖略好一些，究難逃後人的詬病。



吳偉業獨創“梅村體”，詩風別具一格。

吳偉業的“梅村體”便是站在王、李對立面寫出來的詩體。他或許並沒有什麼主觀意圖來創造一個體裁，而是很自然地使讀者有一種特殊的印象，他的作品有與人迥然不同的風格，後世詩人有仿效之者，便名之曰“梅村體”。

“梅村體”的主要淵源來自唐代的元、白，尤其是白居易的歌行。白居易的詩，自稱老嫗兒童都能解誦，這是白居易最大的優點和成功。他在唐詩中地位，可以和李、杜並舉而毫無愧色。千載而下，吳偉業是他最成功的傳人。

“梅村體”最重要的條件是音樂之美，宮商抗墜，音節瀏亮，讀來鏗鏘有聲，如珠落玉盤，滴溜溜轉；如鐵騎突出，刀槍齊鳴，一氣呵成。這主要是他的選韻，選韻是吳偉業最拿手的傑作，他從不用奇澀拗口的險韻，如“十三元”之類，他用的都是擲地有聲的字眼。更有一絕是換韻，古詩由仄換平的地方，他接連用兩個響亮的平韻如“十五刪”，不但使音樂的節奏變成急管繁絃，聯繫着詩的內容也發生劇烈的頓挫變化，使人心隨神往，跟着踏入另一個新異的詩境。

作詩用典，本來是詩人才盡不得不靠典故來救濟的無可奈何之舉，《詩》三百和早期如蘇、李等詩，原沒有什麼典故好依靠，“池塘生春草”五字千古，無一字有來歷。只有腹儉如明代七子，才不得不滿紙餖飣來救才盡之窮。吳偉業當然還不及白居易那種能使嫗孺皆解的白描本領，時而不免要使用典故，但是他決不死搬硬套，他的用典渾融切合，使人看了覺得很自然妥貼，沒

《梅村》

枳籬茅舍掩蒼苔，
乞竹分花手自栽。
不好詣人貪客過，
慣遲作答愛書來。
閒窗聽雨攤詩卷，
獨樹看雲上嘯臺。
桑落酒香盧橘美，
釣船斜繫草堂開。

——吳偉業

有生湊活吞的痕跡；有時且能化腐朽爲神奇，把一個死典故用活了。當然，“梅村體”的又一長處是題材動人，這是生活在明清之際的動蕩環境，天然賦予他的詩材，決不是承平時世的人所能憑空捏造的。

至於吳偉業的爲人，是謹愼小心，少年登第時還有些朝氣，敢於彈劾首輔張主發，以後便圓滑妥協，更無劍拔弩張之態了。按照他的詩所取題材，在淸代大量禁書目錄中，原不該讓他可作漏網之魚；可是幸運得很，高宗還在“潛邸”當寶親王時已編成的《樂善堂詩集》中，有過一首讚揚吳偉業詩的七律，後來登了大寶，便成爲御製詩了。所以不論何種吳詩版本，包括《梅村家藏稿》，歷來總把這首御製詩冠諸集首，成爲吳詩的護符，使任何羅織周納的人也奈何他不得。即使是高宗本

人也不好自食其言，把他與錢謙益一律看待。

高宗這首詩好就好在尚未成爲“乾隆體”時的作品，而且可以確信不會是出於捉刀諸臣之手，所以把它抄在下面，以作本文的結尾：

梅村一卷足風流，往復披尋未肯休。秋水精神香雪句，西昆幽思杜陵愁。裁成蜀錦應慚麗，細比春蠶好更抽。寒夜短集相對處，幾多詩與爲君收。

白髮填詞吳祭酒

吳偉業這位詩人，在清詩春季中的地位，並不輸於錢謙益，也不遜於顧炎武。一方面他有卓越的天才，另一方面是喪亂的時代造就他的。他在文學上多才多藝，詞也不弱於他的詩，其他如書畫、戲曲、史學，也是一代能手，甚至於痲衣之術，亦有深湛研究，在清詩的春季詩人中，無人可以與之抗衡。

此人一生性格上充滿着矛盾，他的心頭上總有兩種相反的思想在交戰。要想講忠烈氣節，卻又怕死貪生；要想風流放誕，卻又硜硜自守；要想淸貧恬淡，卻又未甘寂寞；要想劍拔弩張，卻又畏首畏尾。這樣的矛盾心理，使他既不能如顧炎武之一往直前，雖九死其猶無悔；也不敢如錢謙益之一跌到底，受盡世人嘲罵。其結果是既不能靠他的圓滑處世而能夠左右逢源，反而到處碰頭撞壁，落得個自怨自艾，成爲一個這個時代的犧牲品和可憐蟲。

少年登第，會元榜眼，奉旨完婚，光宗耀祖，意氣飛揚，是讀書人得意之秋，仗着東林遺風和復社門戶，一登朝便彈劾首輔溫體仁和張主發，風裁整峻，名動朝野；但一遭到蹉跌，深知守舊勢力盤根錯節，決不能輕易動搖，從此成爲殘枝寒蟬，再也不敢稍露鋒芒。南都覆滅，他雖未在朝列，但東南忠臣義士，在草野的也並

不少，很多奮起抗爭，只有他是避兵逃難，狼狽如喪家之狗，詩集中只看到他如《礬清湖》等避亂之作，而沒有一篇像陳子龍、夏允彝的作品。蟄居十年，靜極思動，實際上是有了親家的奧援，卻把責任推給父母和有司的敦促，結果卻時運不濟，事與願違，朝局既非，靠山忽倒，不得不鎩羽而歸。終老林泉，卻又缺乏求田問舍之資，不得不以垂老之年，遍遊江浙，下交地方官吏，爲抽豐之謀，晚景頹唐，一何可憫！觀其臨終咐囑及所賦絕筆，與陸游“死去原知萬事空”的名句，眞不可以道里計；則其悲劇的一生，實有些咎由自取。

吳偉業以詩文來掩飾其出仕清朝，三百年來不知瞞過多少讀他作品的人，如一向講究史德的趙翼，在《甌北詩話》中說：“梅村出處之際，固不無可議。然其顧惜身名，自慚自悔，究是本心不昧。以視夫身仕興朝，彈冠相慶者固不同；比之自諱失節，反託於遺民故老者，更不可同年語矣。《遣悶》云：‘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親在何敢死。憔悴而今至於此，欲往從之愧青史’。至今讀者猶爲凄愴傷懷。”這是趙氏對人的最平恕議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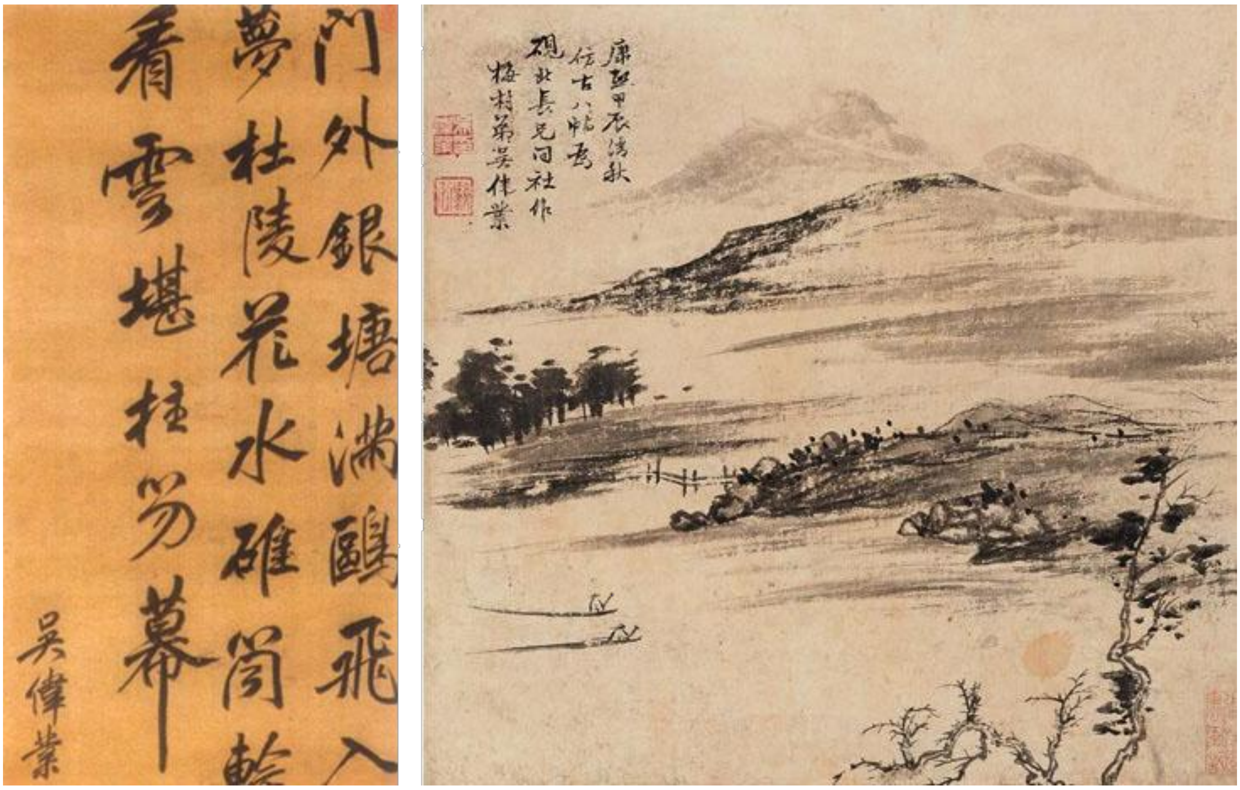
吳偉業生平出處大節，實在還有兩樁大事值得探討：一是據邵懿辰說，他曾見到史可法奏報北都投降李自成諸臣的奏章，有吳偉業之名（當然還有可法之弟可程之名）。補充的證據，是《梅村年譜》於甲申那年行事多有未詳。據吳偉業身後的《墓表》及《行狀》都說他是年“丁嗣父憂”和“甲申之變，先生里居”，這些事隔多年的諛墓文字，未必可信，而甲申三月迎降大順

政權者，並不是稀罕之事，如海寧、溧陽兩陳、金之俊、龔鼎孳、周亮工等，都是吳偉業友好，丁嗣父之艱，是否必須回籍守制，還須查考；當時情況混亂，南北消息阻隔，大順政權防備不嚴，投降後乘間南歸者亦復不少。邵懿辰雖是著名學人，但所言僅是孤證，未足爲據，述之聊廣異聞而已。

另外一樁更是孤證，卻較爲可信：吳偉業於順治十年（1653）膺薦北上，雖出於樞臣的疏薦，實在由於他的親家大學士陳之遴（他的女兒嫁給陳的兒子陳直方）。有此奧援，遂違平生所守，而且所懷不小，有如錢謙益乙酉那時一樣。他在到南京時呈薦他的督臣馬國柱詩說“慚愧薦賢蕭相國，召平只合守瓜丘”，他能如秦故東陵侯召平的種瓜嗎？那全是掩飾之詞，切不可爲他瞞過。到北京之後，正值朝廷對漢臣開刀，陳名夏落得個身首異處，親家翁陳之遴第二次遣戍遼陽，冰山忽倒，這個被薦的人，還會受什麼重視？以會元、榜眼的巍科，弘光朝的少詹事，事隔十年，僅任爲國子監祭酒，都是四品閒曹，這不是使他大失所望嗎？這樣，便使他不到一年，便匆匆辭職南歸，這究竟何故？在他的詩文中當然有許多藉口，還可以說是被有司、父母敦促，不得不敷衍一下，這又是遁詞。

在衆多的清人筆記中，有一則關於吳偉業北上的記載。吳偉業於詩文書畫之外，還精子平、麻衣之術，他連舉七女，中年尚無子息，他自視以後一定可得子，於是趁郁夫人有不妬忌之德，廣置姬妾，而且多江南佳麗，果然五十後生子暻等三人。暻充閭之會（彌月），

東江唐孫華以老名士居上座，梅村抱暻謂孫華說：“此子當與公同舉進士。”孫華當然大爲不懌。到了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科，暻中二甲第十二名進士，孫華倒中了三甲第二十名，這是一件有名的故事。



吳偉業不但詩好，書畫也是一絕。

吳偉業北上，時暻尚未生，當然要攜姬妾同行，在北京雖然並不得意，但聲名猶在，仍可廣通聲氣，希圖大用。因之賓客紛至，滿漢都仰高名，其時入關未久，習俗未改，禮教與漢俗迥異，所謂“大人”者，一見江南佳麗，不爲沙吒利之劫奪歸邸，竟公然恣橫，吳傳業自爲不堪，然又不敢抗爭聲張，忍聲吞氣，不免抑鬱成疾，這便是世傳爲“絕命詞”《賀新郎》之所由作，題曰《病中有感》，詞云：

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夭，高名難沒。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殘月。剖卻心肝今置地，問華陀解我腸千結。追往恨，倍凄咽。

故人慷慨多奇節，爲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炙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訣絕。早患若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完缺。

一派自怨自艾之言。其實順治十一年他並沒有死，談遷的《北遷錄》親眼看到他病癒的光景。他的眞眞絕命詩，是要在十多年之後，有《臨終詩》四絕云：

一

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應填補，總比鴻毛也不如。

二

豈有才名比照鄰，發狂惡疾總傷神。丈夫遭際須身受，留取軒渠付後生。

三

胸中惡氣久漫漫，觸事難憑任結蟠。塊壘怎消醫怎識，惟將痛苦付汎瀾。

四

姦黨刊章謗告天，事成糜爛豈徒然。聖朝反坐無冤獄，縱死深恩荷保全。

可見《賀新郎》詞並不是他的絕筆，只是那時受盡人間

所不能忍受的污辱，去死無異，遂不覺其言之哀而詞之絕了。

吳偉業經過這場奇恥大辱，也可以說是自取其辱，遂倉皇南歸，從此不再作出岫之雲。

他死後的碑版傳記都記載他臨終時的一句話，便是要以僧服殮，墓碣上不要刻什麼官銜，只題詩人吳梅村之墓數字，則其情也可哀已。

秦淮三名妓

有了才子，不可無佳人；有了江左三大家，便不可無秦淮三名妓。

明代的士風，不像淸代那麼嚴肅拘謹，尤其是明中葉以後，帝皇就是逛窰子、研究秘方的帶頭人，上行下效，風氣自然狂放淫靡。加以明代士子居鄉，氣焰囂張，地方官吏，對之莫可奈何。而江南一省，稱爲“南直隸”，省會南京，又稱“留都”，每逢鄉試之年，集淸代改建爲兩省的江蘇、安徽秀才，加上南雍的監生，數以萬計的士子聚集在南京應試。他們寓居在南京時間並不短，八月鄉試，春末便已到臨，謂之“過夏”。寓居的地方，最高級的叫作“河房”，便在秦淮河的兩旁，是妓院的薈集地。士子寓居於此，便於廣通聲氣，相互酬酢往來。

明代的高級妓女，可不像後來那樣專以賣淫爲業，她們必須懂得多種技藝，才能高張艷幟，招引王孫公子，身價自高。除了貌美之外，主要是能諳曉琴棋書畫。尤其是詩，至少要能夠吟成兩首小詩，并能背誦多首名家的名作，方可稱爲秦淮名妓。

三十年代王書奴所著的《中國娼妓史》，敘及明末不少可歌可泣、婉轉纏綿的故事，其中歸德才子侯方域與李香君的故事，更被衍爲《桃花扇》一書。再上溯一個時期，則身關一代興亡的陳圓圓，也正是從秦淮而到

北京的。當然，她所交結的是武夫吳三桂，自不在文人學士之列，在此可以不論。至於一代名姬董白（小宛）和冒辟疆的故事，亦當另列專章，暫且勿提。這裏要談的是和江左三大家有關的三位秦淮名妓。



秦淮河畔，凝滿了歷朝名妓的金粉和歌聲。

這三對伴侶是：錢謙益與柳如是，吳傳業與卞玉京，龔鼎孶與顧媚。

不論才貌與品德，柳如是是公推此中翹楚的，她的詩詞，從遺留到今天的看來，就壓倒羣芳，爲他人所望塵莫及。雖然詩或許經過錢謙益潤色，但詞之一道，錢謙益是十足門外漢，可以說完全是她自己的作品。尤其是慫恿錢謙益反淸復明，不惜“毀奩紓難”，及最後還以身殉錢氏，早年在風塵中流轉的墜溷弱質，後來竟有這樣的作爲，可稱難能可貴。關於她，會另列專章來敘述。

其次是龔鼎孳與顧媚，媚字眉生，居室叫“媚樓”，世所稱“橫波夫人”是也。這個人跌宕風流，豪爽任俠，雖然只是龔鼎孳的側室，因爲龔是當時廣大教主，素負愛士之名，一般奔走於尚書之門的士子，對橫波夫人伏地稱觴，以師母相稱，顧媚也居之泰然。這個人出生秦淮，其風流放誕，恐怕也無人可以比擬。相傳有一個故事：明末著名的理學家和孤忠大節的黃道周，平生講學尚氣節，以宋儒“目中有妓、心中無妓”自詡。有一次友人們要試一試他道學的眞僞，趁他酒醉酣臥之際，就請顧媚“白身”與他同臥一榻。“白身”即是全裸的意思。夜半黃道周酒醒看到這般情形，既不驚慌失措，也不作任何舉動，只是翻一個身，依舊酣睡如故。第二天顧媚把這情況告知大家說：“漳浦眞神人也。”後來黃道周以唐王大學士督師江西殉節，而顧媚卻下嫁給做了大順和大淸兩朝貳臣的龔鼎孳。

善於投降的龔鼎孽，在那講究從一而終的臣節時代，縱然高官厚祿，日子畢竟不大好過，他只好逢人解嘲，說甲申那年李自成和多爾袞進入北京時，他本來是要攀鼎湖之龍髯以殉君國的，但“其如賤內苦挽不許何”！這個“賤內”便是指顧媚而言。是不是顧媚曾有過此言，抑是龔鼎孳把她作爲擋箭牌，那便不得而知了。柳如是則與顧媚恰恰相反，乙酉南都之破，柳如是和錢謙益相約一起赴水殉國，錢卻躊躇而不能決，結果只好投降多鐸。

顧媚也很能詩，小詩楚楚可觀，但流傳不多，只記得在歸龔鼎孳之夕所吟的二十字：

省識無家苦，而今始有家。燈媒知妾喜，
特著兩頭花。

這樣的詩，出諸流轉風塵者之口，的確是有眞摰感情的作品。

最後談到吳偉業和卞玉京這一對。柳如是雖以悲劇收場，和錢謙益總算成就姻緣；顧媚也算從良得所，沒有什麼不如意的事。只有吳、卞這一對情侶，卻是纏綿悱惻，說不盡的幽怨，訴不盡的愁懷，只有這一對情侶並不曾得到結合，卻造就出吳偉業許多比李商隱明朗得多的《無題》詩。

吳偉業爲人比較拘謹小心，不像錢謙益和龔鼎孳能夠放縱佻達，其妻子郁夫人不是一個潑辣善妬的婦人，他敢於藉口子嗣而廣置姬妾，但獨獨不敢把一個秦淮名妓置諸於後房，這是很難令人理解的。

玉京名賽，晚年入道，便號玉京道人。在秦淮時和吳偉業相識多年，初見時遂欲以身相許，吳偉業報以假癡假呆，僞作不解，悵然別去。錢謙益爲吳氏摯友，欲爲兩人作撮合，在拂水山莊設盛宴招玉京，已至其家，忽託病不出，又成泡影。這也不知是什麼原故，或許是明代功令，嚴禁官吏在治下納民婦爲妾。吳偉業和錢、龔等不一樣，他們是京官，不受功令束縛；而吳偉業卻是南國子監的司業，官署正在南京，納秦淮妓女爲妾，或許有干功令吧。

吳偉業畏縮不前，玉京只好琵琶別抱，委身於一鄭姓醫士。這樣卻造就了吳偉業幾首好詩，《琴河感

舊・並序》云：“余本恨人，傷心往事。江頭燕子，舊壘都非；山上蘼蕪，故人安在。久絕鉛華之夢，況當搖落之辰。相遇則惟看楊柳，我亦何堪；爲別已屢見櫻桃，君還未嫁。聽琵琶而不響，隔團扇以猶憐，能無杜秋之感，江州之泣也。”詩云：

白門楊柳好藏鴉，誰道扁舟蕩槳斜。金屋雲深吾谷樹，玉杯春暖尚湖花。，見來學避低團扇，近處疑嗔響鈿車。卻悔石城吹笛夜，青驄容易別盧家。

油壁迎來是舊遊，尊前不出背花愁。緣知薄倖逢應恨，恰便多情喚卻羞。故向閒人偷玉筯，浪傳好語到銀鈎。五陵年少催歸去，隔斷紅墻十二樓。

休將消息恨層城，猶有羅敷未嫁情。車過捲簾勞悵望，夢來攜袖費逢迎。青山憔悴卿憐我，紅粉飄零我憶卿。記得橫塘秋夜好，玉釵恩重是前生。

長向東風問畫蘭，玉人微嘆倚闌干。乍抛錦瑟描難就，小疊瓊箋墨未乾。弱葉懶舒添午倦，嫩芽嬌染怯春寒。書成粉箑憑誰寄，多恐蕭郎不忍看。

過了若干年後，玉京下鄭醫之堂，持課誦戒律，自稱玉京道人而終，葬無錫惠山祇陀庵錦樹林，吳偉業晚年有《過錦樹林玉京道人墓》七言長句弔之。據余懷《板橋雜記》，玉京亦能詩，但未見流傳。

柳如是的詩才與志氣

淸詩春季詩人中，百分之九十九是男性，婦女而有驚人的詩才足以領袖羣芳者，只有柳如是和徐燦兩人；而俠骨柔腸、志操節烈，則尤以柳如是爲不可及。

陳寅恪先生對柳如是傾倒備至，他在失明之後，竟然爲她寫下近百萬字的《柳如是別傳》。

先得抄錄兩首散原老人的哲嗣兼傳人有關柳如是的詩：

東山葱嶺意悠悠，誰訪甘陵第一流。送客筵前花中酒，迎春湖上柳同舟。縱回楊愛千金笑，終賸歸莊《萬古愁》。灰劫昆明紅豆在，相思廿載待今酬。

《詠紅豆》

早歲偷窺禁錮編，白頭重讀倍凄然。夕陽芳草要離塚，東海南山下潠田。誰使英雄休入彀，轉悲遺逸得加年。枯蘭衰柳終無負，莫詠柴桑擬古篇。

《題〈牧齋初學集〉》

陳寅恪先生《詠紅豆》詩中第三聯中的“楊愛”便是柳如是的本來姓名。對句《萬古愁》則是歸莊的著名的《萬古愁曲子》。此句的本事是歸莊曾送錢謙益一副壽聯：

“居東海之濱；如南山之壽。”詩人阮葵生（吾山）《茶餘客話》，謂歸莊此聯，無恥喪心，必蒙叟自爲。殊未考歸莊和錢謙益的交情，雖心迹異途而交情未泯，聯語取義庾信《哀江南賦》“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食周粟。”“秦庭”、“周粟”，暗寓惋惜之深旨，與錢謙益之降清欲以修史自贖等情事極相切合，非如阮葵生所指以爲兩人情事南轅北轍，致不可有此祝嘏之語。這是一種誤解。

柳如是之下嫁錢謙益，首先是錢氏的聲望赫奕，官至侍郎，且爲文壇盟主，次則錢氏輸誠相愛，綢繆備至，再則錢氏的正室毫無妬意，但兩人年齡究竟差了一大截，這也不是能求全之事，況且柳如是流轉風塵，閱人多矣，能從此從良，不爲非策。

明末的高級妓女，以詩賦及琴棋書畫，爲賣笑的本錢，幼年即須習此，一般的當然不能和男子媲美，但亦有聰慧突出如柳如是者，則十五六之年，其詩賦已楚楚可觀。柳如是在稚年即作有《男洛神賦》，王士禛曾說她“其殆自矜八斗，欲作女中陳思耶”？因爲她嫁了鼎鼎大名的詩人錢謙益，人遂疑柳如是的作品都經錢謙益的潤色或代作，殊不知錢謙益雖以詩名，卻不善填詞，《牧齋初學集》中只保留着少得可憐的詞；而河東君卻善於填詞，錢謙益的幾首詞倒還經過她的潤色哩。

江左三大家都是經過亡國之變的，龔鼎孽更投降過大順政權，國破殉節是士大夫傳統的美德，語不由衷的也要做作一番，龔鼎孳遘甲申三月之變不死，事后對人家昌言：我本要殉難，其如小妾不許何！這個小妾便是

秦淮名妓“橫波夫人”顧媚，把責任推到女人頭上，原是男人的慣技。柳如是則和顧媚相反，乙酉五月南都之破，如是約錢謙益一起殉節，錢謙益卻逡巡不能決。可見柳如是確不同于一般青樓女子。



清代的女詩人中，柳如是堪稱表表者。



柳如是畫跡。

錢謙益不死而降清，柳如是並不因此而死了心，她運用和錢謙益親昵的關係，一直勸說錢氏反清復明。錢謙益聽了閨闥進言，加以清廷不加重用，便對清廷持首鼠兩端的態度，若干年中，錢謙益的兩個弟子瞿式耜在西南，鄭成功在金門、臺灣，以及浙東的殘明勢力張煌言等都有信使往還。在拂水山莊中，柳如是是參與機密的。

其中最驚人的一次豪舉是：浙東的殘明勢力姚志卓奉命組織反清行動，曾親到常熟與錢謙益籌劃，柳如是

脫卸首飾供給姚志卓裝備五百名軍士的經費，錢謙益《投筆集·小舟惜別》云：

> 北斗垣墻闇赤暉，誰佔朱鳥一星微。破除服珥裝羅漢，減損鹽虀餉佽飛。娘子繡旗營壘倒，將軍鐵矟鼓音違。鬚眉男子皆臣子，秦越何人視瘠肥。

錢謙益自注云：“姚神武（魯王封姚志卓爲仁武伯）有先裝五百羅漢之議，內子盡橐以資之，始成一軍。”“娘子”句注云：“張定西（名振）謂阮姑娘：‘吾當派汝捉刀侍柳夫人。’阮喜而受命。舟山之役，中流矢而殞，惜哉！”“將軍”句則謂姚志卓戰死於崇明城下。阮姑娘當是女子，捉刀入侍，可見柳如是不但在經濟上策劃資助反清力量，而且要親自參與戰鬥。柳如是的文武雙全，恐怕要凌駕梁紅玉之上，只是朱明敗局已定，未能完成她的志願。

柳如是所結交的均一時蘇、松兩郡名士，和陳子龍交情尤著，還有宋轅文、李待問，都曾同居一時，但都不能相結合，最後不得不歸於錢謙益。當然錢謙益答應她的條件，不以小星相待，而且正式到松江迎娶，在舟中行結婚之禮，謙益皤然白髮，冠帶合巹。但是這種違背禮教的行動，惹怒了松江士紳、羣起聲討，致滿船載所擲瓦礫狼狽逃回常熟，這也是錢、柳結合的一段有趣插曲。

錢謙益死後，其嫡派嗣子孫懦弱無能，備受族人欺凌，柳如是終於自盡以報錢謙益知己之遇，以一風塵女

子而有這樣的節操，眞是難能可貴。

抄柳如是詩一首，以見一斑：

年光詩思競鮮新，忽漫韶華逗晚春。止爲花開停十日，已憐腰緩足三旬。枝枝媚柳含香粉，面面夭桃拂軟塵。回首東皇飛轡促，安歌吾欲撰良辰。

宋派三詩人

詩到了北宋初葉，唐人白居易、李商隱的詩，還被王禹偁、楊億等所宗尚；西昆諸公，均未出唐人之藩籬。到了慶歷年間，歐陽修、蘇軾、王安石、黃庭堅崛起，尤其是黃庭堅，始有宋人面目的詩。黃庭堅薈萃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制之變，搜討古書，穿穴異聞，作爲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成爲宋詩的開山。後來的追隨者衍爲“江西詩派”，寫成什麼宗派圖，奉杜甫爲“名譽”宗師，主要以黃庭堅爲鼻祖，宋詩因以形成，流衍數百年，與唐詩並稱。

宋詩雖然自成派系，究竟還是學唐而來，因爲好詩都被唐人做盡了，若不別闢蹊境，不圖變化，只知模擬唐人，則如明代前後七子之學唐，雖聲色格調，有時或能相似，然神氣弗存，終是贗品而少本色。

宋詩當然不逮唐詩，但是僞唐詩卻遠不及眞宋詩；明代前後七子之遭人詬病，正因爲他們只是邯鄲學步、優孟衣冠。直到淸詩的春季，詩人雖仍是學唐，卻大異七子之故轍，這是難能可貴之處。

在淸詩春季的百花園中，所有著名詩人，無不以宗唐爲標榜，貶落宋詩，因之以宋詩自立門戶者，實在鳳毛麟角。尤其是一些詩論家及稍後的四庫館臣，更是對宋詩不屑一顧，這當然也是應有的現象。

但是，在清詩春季中，卻有三位傑出的詩人，毫不諱言自己是宋派詩人，而且大張旗鼓地爲宋詩樹碑立傳。因爲他們確是貨眞價實，宗唐的一些詩論家，倒也不敢妄加菲薄。

這三位春季宋派詩人，按年代的先後，是宋犖（牧仲）、查愼行（初白）、厲鶚（樊榭）。

三位宋派詩人中，論成就應該是查愼行的《敬業堂詩集》爲最高，其次厲鶚也堪伯仲；而宋犖的《西陂類稿》，不逮查、厲遠甚，卻因他是大中丞且仕至尙書，查、厲可不逮他遠甚，所以也把他附查、厲之驥尾了。查愼行和厲鶚是淸詩春季中的重要詩人，自當另列專章，這裏只是有關宋犖的一些論述。

宋犖在康熙朝仕途的順達，在淸初漢臣中是極爲罕見的，其原因可能在於康熙帝的念舊。原來宋犖的父親宋權，以明朝大吏，率先投降多爾袞，順治朝對他始終恩禮不衰。康熙帝嗣位以後，宋犖即以大臣子弟入備宿衛，即和康熙成爲同學年少的伙伴。有一件淸初很重要的故事：康熙嗣位的時候，只有八歲，由四大臣（當然都是滿人）輔政，其中最跋扈飛揚的是鰲拜。這位中國歷史上堪與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相媲美的康熙皇帝，在少年時代便已不凡，定下了除去鰲拜的秘密計劃，即是利用他的一批小伙伴，練習武藝，類似摔跤、相撲一類的把戲，趁鰲拜不防之時，一下子把他擒拿殺掉，然後親自執政，開有淸二百多年的盛局。

宋犖在那時便是這批“童子軍”的一員，康熙當然不會忘記他，因而加以重用。所以宋犖一直仕途亨通，



黃庭堅爲清代宋派詩人所宗奉。

從未挫折，康熙對他的優禮，也爲其他臣下所未有。傳說在宋犖任江南巡撫時，正值康熙南巡，於辦理接駕差使時，康熙特別關照他的御廚，把一味御用的豆腐烹調方法傳授給宋犖的廚子，說這個烹調方法可給老臣下輩子受用云云。

宋犖自我標榜宋詩，當然要替宋代詩人做些工作，他曾注蘇軾詩，並爲之校讎補綴。但並不高明，而且沿明人之舊習，率多臆改竄亂，實在未能差強人意，連同樣以宋詩標榜的查愼行也不能不認爲遺憾。所以查愼行竟花了數十年的功力，另行補注蘇詩五十卷，補同路人之過，成爲東坡的功臣。

宋犖和江左三大家的龔鼎孳相似，以爵位取得高名，他的好友王士禛是當時詩壇盟主，得漁洋山人一字之褒，便榮於登龍門，在晚年時候，王士禛有一絕句寄宋犖云：

> 尚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當時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黄州。

這是一首互相標榜並爲宋犖造成地位膾炙人口的七絕。王士禛曾任揚州司理（這是清初沿明末制度，在府下置推官一職，專理司法，又稱司李，清康熙中廢，歸府主受兼理司法時的稱謂），而宋犖初仕則在湖北黃州通判。他在未仕時，曾繪東坡居士像，以己侍其側，後筮仕竟得黃州通守，這是他瓣香宋詩的起點。

當時名士邵長蘅選宋、王兩人詩爲《王宋二家集》，兩人都是一品大員的尙書，時人頗以邵長蘅獻媚大吏爲

言。王士禛的論敵趙執信更拿到一個好題目，對他大肆攻訐。有人說，王士禛龍門高峻，對去己太甚的宋犖未必肯降心相就，上面這首七絕，王士禛集中未載，傳是宋犖以千金爲壽乞得的，這是不是事實，便無法證實了。

但以宋派詩人而論，宋犖詩雖不如查、厲遠甚，但也楚楚可觀，如《即事六首》其五云：

雨過山光翠且重，一輪新月掛長松。吏人散盡家僮睡，坐聽寒溪古寺鐘。

這也可見到他的宋人風致。

煙波釣徒查愼行

專制時代，帝皇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對任何人都毫不客氣，直呼其名，倘使偶然一呼其字或號，那便認爲是莫大的榮耀，稱爲“異數”。何況還不只是稱其字號，竟用其人最出名的詩句來稱呼，那更是千古盛傳的佳話，爲歷史上所罕見。

千載上下，就有這樣兩位詩人，一位是唐代詩人韓翃，韓翃的著名七絕：“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同時朝列中還有一位同姓名的韓翃，皇帝要召見韓翃，爲了區別起見，指定要宣召“春城無處不飛花”的韓翃，當時傳爲佳話。千載之後，清代康熙年間，又發生一件無獨有偶的玉堂佳話。當時查愼行在翰林作文學侍從，有首康熙或是皇太子允礽賜他釣魚的詩，曾有“笠簷蓑袂平生夢，臣本煙波一釣徒”的名句。那時查愼行的姪子查升（聲山）也在翰林，爲了要區別兩個查翰林起見，康熙關照內侍，指名要傳宣“煙波釣徒查翰林”。在古代，這種榮遇是千古難逢的，查愼行身價頓時百倍，他的詩名，簡直要取代朱彝尊而與王士禛並稱“南查北王”了。

查愼行出生於順治七年（1650），算是個食毛踐土的清朝臣民，不在遺民之列，所以他的生平較爲平凡，

他既不能如陳子龍、顧炎武、夏完淳那樣厠身於火熱的抗清鬥爭，也不會像錢謙益、吳偉業等雖出仕清廷而仍有緬懷故國的低徊情緒。他的少年和晚年都在政治壓迫中度過，而沒有反抗的念頭。兩次所受政治壓迫都是文字獄：少年時是南潯莊氏的明史之獄，他的族人查繼佐死裏逃生，不知所終，這是要夷九族的大逆罪，豈有不懼恐之理？但總算仗着“大力將軍”吳六奇的庇護，查繼佐倖免一死，他的族人查慎行當然也沒有受到牽連。

晚年的一次政治壓迫還是文字獄，那已經到了雍正初年了。爲了胞弟查嗣庭的文字獄，他以長兄疏於授教，責無旁貸，也被捲了進去，古稀老翁還要解京受牢獄之災。雖然獨獨對他寬大處理，這場驚嚇終於使他少活幾年，提早離開人世。

少、晚之間，中間還經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長生殿》風波，也總算只受了一點薄譴，無妨於他之東山再起。他最得意的時候，便是代康熙做捉刀詩人這幾年，便是寫那首賜釣魚的七絕和康熙仿韓翃的宣召時候，誰不要討好整天隨從皇帝身旁代天立言的詩人！

他的詩中正和平，他的處世也是謹慎小心，這是他後來得以善終的保證。其實他少年時候也是意氣飛揚、不可一世的。二十歲左右，便已跟着同鄉楊雍建到尚未平靖的貴州躍馬橫戈。這種戎幕生活，大大的開闊了眼界；到了充當捉刀詩人時，又扈從康熙親征漠北，這又是一般詩人所不能親歷的地方，生長江南而能遍歷天下山水之奇，這正如太史公所稱道的要使文章有奇氣，非

《度仙霞關題天雨庵壁》

虎嘯猿啼萬壑哀，
北風吹雨過山來。
人從井底盤旋上，
天向關門豁達開。
地險昔曾資劇賊，
時平誰敢說雄才。
煎茶好領閒僧意，
知是芒鞋到幾回。

——查愼行

閱歷天下名山大川不可。

查愼行並不是什麼奇才，他只是勤於學習，他的《敬業堂詩集》，竟有四十八卷之多。陸遊的《劍南詩稿》之外，言數量之多，是屈指可數的了。他簡直以詩爲日課，沒有一天不做一首詩，所以只能說他是詩人之詩了。當時南北兩大詩宗，朱彝尊是他的表兄，不必說了，王士禛對他也稱譽備至，士愼說："以巨體論，劍南奇創之才，夏重（愼行字）或遜其雄；夏重綿至之思，劍南亦未之過，當與古人爭勝毫釐。若五七言古體，劍南不甚留意，而夏重麗藻絡繹，宮商抗墜，往往有陳後山、元遺山風。後山淩厲峭直，力追絕險；遺山矜麗頓挫，雅極波瀾。吾未敢謂夏重所詣，便駕前賢，然使起放翁、後山、遺山諸公於今日，夏重操螯孤以陪

敦槃，亦未肯自安魯、鄭之賦也。”王士禛對人如此頌揚，這是不多見的。

此外，《四庫全書》總編輯紀昀本是宗唐貶宋的詩評家，卻也一反常態，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爲他大唱讚歌，說查愼行之詩“得宋人之長而不染其敝，數十年來，因當爲愼行屈一指也”。實則查愼行之爲宋派詩人，在北宋宗蘇軾，在南宋宗陸遊，就不能用“江湖”、“九靈”那些宋派末流去衡量他了。

但眞眞是查愼行的知己且爲他奠下崇高地位的，卻是淸詩夏季詩人兼詩論家趙翼。趙翼所著的《歐北詩話》，是淸詩夏季的詩論中的權威之作，它一共有九卷論古今詩人的專章，除了唐、宋六位大家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蘇軾、陸遊之外，金代的元好問和明代的高啓只能併起來作爲一卷，淸詩的春季詩人，只有吳偉業和查愼行各佔一卷，而王士禛、朱彝尊這樣大家則名落孫山，不曾列入。

趙翼和查愼行不是並存於世的人，一個方去世一個才出世，是以不會有什麼黨附之見。趙翼評論春季詩人的優劣時說：“淸初詩人，施愚山以儒雅自命，稍嫌腐氣，宋荔裳全學晚唐，無深厚之力，吳漢槎有高調，無餘味，王漁洋專以神韻爲主，醞藉含蓄，實是千古絕調。然專以神韻勝，但可作絕句，朱竹垞則不專以詩傳，究非風雅正宗。”然後說：“惟查初白才氣開展，工力純熟，鄙意欲以繼諸賢之後。”這是獨排衆議的評論，爲當時一般人所未能接受，但是他別具慧眼，堅持推崇查愼行的立場，闡述他傾倒查詩的理由：“不知詩

《登蕪湖浮圖》

落帽家山記幾巡，
弟兄南北各傷神。
茱萸明日重陽酒，
五處登高各一人。

——查愼行

有眞本領，未可以榮古虛今之見，輕爲訾議也……，角逐名場，奔走衣食，閱歷益久，鍛煉益深，氣足則調自振，意深則味有餘，得心應手，幾於無一字不穩愜。其他摹寫景物，脫口渾成，猶其餘技也……要其功力之深，則香山、放翁後一人而已。”

查愼行在自己的詩論著作《初白庵詩評十二種》中說明對詩的主要觀點：“詩之厚，在氣不在直；詩之靈，在空不在巧；詩之淡，在脫不在易，須辨毫髮於疑似之間。”“氣”、“空”、“脫”三個字，便是他作詩與論詩的“關鍵”，完全可以窺見他宋派詩人的面目。

煙草詩人厲鶚

士農工商，列爲四民，商人的地位最低，所以詩人和商賈向無緣份。但清詩的春季詩人中，傅山賣藥且佐顧炎武開設票號，可說是亦詩亦商，是個例外。賣藥猶屬雅道，而開設錢肆，則未免銅臭，不過傅山是心存濟人濟世和籌措反清復明軍餉，自應當作別論。另外一位詩人，他做的是煙草買賣，在那個時候，可說是別開生面。

這位清代的詩人兼煙商，便是厲鶚。厲鶚（1692—1752），字太鴻，號樊榭，浙江錢塘人。因爲家境貧困，便從小跟着胞兄做煙草買賣，一方面拼命讀書。煙草的傳入和種植，大概始於明末萬曆年間，距離厲鶚經營此業不過百年，吸煙的人遠不及現在那麼普遍，但種植的地方已很多，從西北的蘭州到東南的福建，都盛產名煙，浙江的桐鄉也有佳品，厲鶚所經營的大概便是桐鄉煙草。傳說康熙帝最惡此物，雖然並不曾下旨禁止，卻時常告誡臣下不要染此惡習。

最與煙草有緣的文人，總要推綽號“紀大煙焗”的《四庫全書》總編輯、清詩的夏季詩人紀昀了。他的煙斗可裝上煙草二兩之多，可以整天不離口，從圓明園趁騾車到京城，不需要加煙。有一天不慎把煙斗丟失了，家人大爲着慌，他卻鎮定如恒，告訴僕人到天橋舊貨攤



纪昀嗜烟如
命，竟弄至脚
底生煙。

找尋；果然一找便着。因爲人家撿到那麼大的煙斗，無法使用，只好以賤值賣給地攤。這是紀昀出名的故事。

另一故事爲紀昀雖在直廬，也煙斗不離口，有一次忽然乾隆召見，見皇帝當然不能吸煙，匆匆地把煙斗在靴頁中一插，便去覲見，不料餘燼未息，死灰復燃，燒得他愁眉苦臉痛苦難忍；爲了儀態，又不便撲滅，眞是尷尬萬狀。乾隆見他這種窘態，問他何故，答云：“臣靴頁走水。”“走水”者失火也，一時傳爲笑談。紀昀的趣事，知道的人很多，而厲鶚做煙草生意，則一般人不甚知道了。

厲鶚是宋派詩人。淸詩春季的宋派詩人，除了宋犖是河南商丘人外，杭州府屬便佔了兩位，便是他和查愼行。查愼行雖爲宋詩，但還不如厲鶚之專，他全副精力和著述，都花在兩宋，天水一代的朝章國故，無不精熟通曉，所著《宋詩紀事》卷帙浩繁，網羅宋人詩作和故事，與南宋計有功的《唐詩紀事》堪稱雙璧。所著《樊榭山房詩集》，無體不工，在浙西詩派中別樹一幟，在當時的浙派詩人中，可和朱彝尊、查愼行鼎足而三。

厲鶚只中過舉人，以後多次會試及被薦舉博學鴻詞大科，都不曾入彀。他似乎對科第得失並不在意。有一次北上赴試，在天津遇到了幾位好友，志同道合，詩酒流連，竟然連試期已過都未察覺，只好翩然鎩羽南歸。

他的好友是揚州馬日璐、馬日琯昆仲，兩馬是揚州的巨富，築有小玲瓏山館，藏有宋元佳槧，延攬四方名士，嘯詠其中。厲鶚尤被奉爲上客，每被邀至揚州，盤桓幾忘歲月。在天津交查爲仁，有別業曰水西莊，貯書

萬卷，也雅好接京名士，厲鶚流連津沽，大概便在查爲仁的水西莊忘了試期，兩人合作撰的《絕妙好詞箋》，傳誦一時。

厲鶚因爲未出仕，除了有時到揚州作馬氏昆仲座上客之外，居住杭州的時間很久，這就使他在浙派詩人中享有卓越的地位，但是宋詩幽渺孤僻，學我者病，甚至學我者死，所以從學者雖多，卻沒有出色的詩人出其門下，反落得一個餖飣撏撦的貶評，這也是宋派詩在清詩春夏中沒有地位的緣故。

北宋時代大文豪蘇軾，他除了在政治、文學、書畫方面有出色成就之外，還有一樁生活方面的膾炙人口的故事，有關他的侍妾朝雲。這位王朝雲雖然生活在女子被種種壓迫的古代社會中，但她與蘇軾的確是眞誠相愛，不避種種艱難，跟隨着蘇軾南謫海南荒蠻瘴霧的戍地，後來不幸短命夭亡，蘇軾寫下很多情感動人的詩篇來悼念她，爲後人所稱道。在悼亡詩中，只有晉的潘岳和唐的元稹差堪與之媲美，但潘、元兩人的人品，就不能和蘇軾相提並論。

自從蘇軾以後，寫這種詩篇的人，六七百年來，公推厲鶚和月上的故事最著於人口。（現代作家郁達夫對厲鶚和月上是非常傾倒的，在他的早期以歷史人物爲主角的小說，有過兩篇名作，一篇是以清詩夏季詩人黃仲則爲主角的《采石磯》，另一篇便是以厲鶚和月上作題材的《碧浪湖的秋夜》。前者廣爲人知，後者則日就湮沒，其實也是郁達夫小說中一篇代表之作。）

月上姓朱，是湖州烏程人，十七歲歸厲鶚，二十四

歲夭亡，和厲鶚相處了七年。厲鶚說她“鍼管之外，喜近筆硯，影搨書格，略有楷法。從余授唐人絕句二百餘首，背誦皆上口，頗識其意。每當幽憂無俚，命姬人緩聲循諷，未嘗不如吹竹彈絲之悅耳也。”但是罡風吹折，泊然而化，年僅二十有四。“悲逝者之不作，傷老境之無悰”，厲鶚寫了六首七律哀惋的律詩來悼亡，這是傳誦人口的名作，茲錄下二首，以作結束：

無端風信到梅邊，誰道蛾眉不復全。雙槳來時人似玉，一奩空去月如煙。第三自比青溪妹，最小相逢白石仙。十二碧欄重倚遍，那堪腸斷數華年。

舊隱南湖淥水旁，雙棲穩處轉思量。收燈門巷忺微雨，汲井簾櫳泥早涼。故扇也應塵漠漠，遺鈿何在月蒼蒼。當時見慣驚鴻影，纔隔重泉便渺茫。

厲鶚和月上雙棲之地在杭郊西溪，其地多蘆荻，晚秋時節，偏多野趣，百餘年後，尚有荒庵一處，中供馮具區木主，而附以厲鶚和月上，好事者更新其廟貌，仍處三木主於其中。

宣城南施

淸詩的春季中，詩人被加以流派稱號的，最知名的當然是“江左三大家”，其次是“南朱北王”，也有人用浙江海寧籍的查愼行來代替嘉興籍的朱彝尊，稱爲“北王南查”；再次一等的便是所謂“南施北宋”了。南施是指著籍江南宣城的施閏章（愚山）（1624—1689），北宋則是指隸籍山東萊陽的宋琬（荔裳）（1614—1673）。

中國南北之分，古已有之，在晉、宋分割局勢下，南自南，北自北，倒也問題不大。自蒙古人入主中原，以西北方民族統治全國，把全民分爲四等，南人斯爲最下。朱明是以南人北定中原的，倒能畛域不分。到了淸人以東北民族入關，又恢復蒙元的南北之見，不過究竟已邁進了一大步，只是口頭上蔑視南人爲“蠻子”，制度上倒是不分畛域的。

不過滿漢之爭和南北之見是淸代開國至亡國始終存在的，南黨與北黨之爭，貫串康熙六十一年的朝政。到了淸代末季，軍機大臣六個名額中，南北無形中各據三位，不容混淆。這也影響到詩的領域來，詩人的南北，也不無這種成見存在。

所謂南北，似乎是以長江爲界限，因爲明代的江南省，淸代因之，直到康熙中葉才劃分爲江蘇、安徽兩

省，而蘇、皖兩省都有領域在大江以北。因此，大概以江淮區域的徐州爲南北界限比較合理一些，所以現今隸屬華東區的山東，在那時便屬於北方了。

施閏章是今安徽省宣城人，詩仙李白“一生低首謝宣城”，可見這個以生產宣紙聞名於世的名城確是詩之王國，施閏章生長在這塊土地，當然生來與詩有緣。

他不但是一位傑出的詩人，還是一個非凡的循吏，自從中了進士之後，在江西等地做了幾任地方官，給大亂之後的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更令人敬仰的是他還是一個明察秋毫的推理專家，看過蒲松齡著名小說《聊齋誌異》的人，一定驚歎平反一起山東冤獄的好官，那便是《誌異》的名篇《胭脂》中的山東學使施閏章。蒲松齡這部《誌異》大都是談狐說鬼的作品，但在《胭脂》中卻破例全用推理的方法來平反這件冤獄。施閏章是蒲松齡的老師，自然爲老師出力描寫，具繪聲繪形之妙。

施閏章在順治年間便中了進士，做了廿多年內外官吏，到康熙十八年召開博學鴻詞大科時，又被薦舉參加考試，取中在一等，從粗官改授翰林院侍講，這使他的詩名更爲哄動一時。

明代覆亡時，他不過二十歲，未曾出仕，所以談不到是遺老遺少，對淸朝倒是食毛踐土，是一個順民順臣。到了他蜚聲詩壇時，那種慷慨激昂、凄涼激楚之音，已經逐漸讓位給歌頌昇平、風華典雅的盛世雅奏，全祖望最愛施閏章的詩，說他“至性深情，化才藻於無有，而孤行一往，無風調之可尋，所謂酸鹹之外，別有領會”。施閏章詩中雖然不再緬懷故國，但對當時人民

罹戰亂之苦，時刻寄與無限的憐憫與同情，所以他的詩是最富有人民性的。除了像《湖西行》、《火坑嘆》、《臨江憫旱》等關心民生的詩篇外，他的五言詩，不但追蹤盛唐，王士禛還說他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如《送梅子翔》云：

> 朔風一夕起，庭樹葉皆飛。孤宦百憂集，故人千里歸。岳雲寒不散，江雁去還稀。遲暮兼離別，愁君雪滿衣。

簡直置之古詩十九首中，也毫無遜色。

施閏章的詩，還在於學力，溫柔敦厚，則其性情所寄，非可強致。《長生殿》作者也是詩人的洪昇（昉思）嘗問作詩之道於施閏章，洪昇是王士禛的入室弟子，在當時爲詩壇盟主，施閏章拿自己和王士禛作了一個比較說："令師（王士禛）言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又如五城十二樓，縹渺俱在天際。我詩則譬築室者，瓴甓木石，一一俱就平地築起。"這是對王士禛神韻詩論的曲折批評，洪昇當然領會他微旨所在，只好答以禪語曰："此禪宗頓、漸義也。"這是不置可否的答話。

施閏章的詩雖溫柔委婉，然亦有雄壯激烈，有千軍萬馬奔騰之勢，賢者多能，固不可拘以一格。如《錢塘觀潮》云：

> 海色雨中開，濤飛江上臺。聲驅千騎疾，氣卷萬山來。絕岸愁傾覆，輕舟故溯洄。鴟夷

有遺恨，終古使人哀。

“氣卷萬山來”，五字未爲人道，眞足千古。

施閏章做了幾十年的官，終是兩袖清風，不名一文，至文士遺業，家屬不能爲之刊槧行世。後來，他的孫子施瑮在湖廣總督府，請於府主畢沅（秋帆），才捐資爲閏章刊刻遺集，得以行世。

所謂捐資者，這位由狀元出身仕至大吏的畢沅，實是一個貪官污吏，但他旣負愛才之名，又肯把一部分贓款用之於救濟寒士，足以杜塞言者之口，所以很少有人把“貪官污吏”四字加之於這位《續資治通鑒》編者的頭上。贈黃仲則白銀五百兩和刻印施閏章遺集，正是他高明的手法。

萊陽北宋

自漢、魏以降，對詩人文士加以集體稱號的，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賢”、“唐宋八大家”、“前、後七子”以及“江左三大家”之類。或以地域的關係，或以作品風格的相似，人們把幾個作家聯在一起，作爲一個派系來看待。文學史家和評論家便據此來敘述或批評某一個作家的作品。

不過，最使人奇怪的是把江南的施閏章和山東的宋琬聯在一起，稱爲“南施北宋”。他們兩人地既分南北，作品的風格又迥不相似，雖然生在同一個時代，也相互認識，但沒有共同的創作思想和目標；朋友的關係也不是很親密，把他倆聯在一起，總覺得有些勉強。

宋琬（1614—1673），字玉叔，號荔裳，山東萊陽人。他年齡比施閏章要長十歲。要說南施是一個溫柔敦厚合乎詩教的詩人，則北宋適與之相反，他是一個噍殺鬱屈的苦人。他的一生，充滿了苦惱和抑情，從少到老，總是受到逼害，大而至國仇家難，小而至仕宦京友，到處碰到痛苦和屈辱的不如意之事，好像四面八方都在窺伺着他，冷不防就會大禍臨頭似的。久而久之，他的精神受到創傷，恐懼和憤慨時刻縈纏在他的胸臆。

造成宋琬這種心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初是他所遭遇的國仇家難。明代自萬曆末年起，新崛起於東北方

的後金便成爲邊患，多次侵入擄掠焚殺，有兩次越過京畿，深入腹地山東膠州。還有降清的叛將孔有德等也多次蹂躪登、萊。

宋氏是萊陽的大族，清軍圍城時候，闔族登城幫助官吏守禦，城破之時，男子當然犧牲，闔門老少也均遭殺戮。宋琬的父兄，包括他的族人著名文士宋玫（九青）一齊殉難。其時宋琬幸而到浙江探望親戚，得倖免於難。

接下來便是甲申三月之變，像這樣的國仇家難，天崩地裂，壓迫得宋琬透不過氣來。在江南那時幸而結識了王崇簡和王熙父子，在一起讀書，成爲深交。宋琬的生活較好，時予王氏父子幫助。後來王氏父子在清朝發了迹，王熙且官至大學士，宋琬也得到他們的助力。所以宋琬和其他明遺民不一樣，忘記了闔門遭難的深仇大恨，於清朝第二次開科，即順治四年（加科），便中了進士，這大概和王崇簡的慫恿有關。做了官，卻又宦途多磨，被人誣告與山東于七事件有牽連，這是大逆的罪名，被繫在獄三年，後來也因王氏父子的援手，得以無恙，且能復爲四川按察使。

在川臬任內到京入覲，家眷留在成都，適逢吳三桂反清起事，川滇鄰近，聞警竟然一嚇而死。這是他飽經憂患，經不起驚嚇之故，存年尚不到六十歲。

宋琬以詩名，他還是個文學上的多面手，詞也是擅場，《二鄉亭詞》和《安雅堂詩》號稱雙絕。他的詩如前面所說，充滿噍殺之音，差不多全是感傷憂患之作，很少歡樂的氣氛。只要看他的詩題，都含有“悲”、“哀”等字樣，但也不乏豪放跌宕的剛勁之作。名句如“九曲

流從星宿海，五陵煙鎖帝王都”，“少華西來朝白帝，太行東望起黃河”，極爲王士禛所激賞。

他於詩詞之外，還工南北曲，今傳有《祭皋陶》雜劇，用想像的手法，替東漢末季遭黨錮的淸流翻案，捧出一個古代刑官皋陶來扶正壓邪。這劇的用意還是在爲自己鳴不平，希望有一個皋陶這樣的刑官。當然，這種作品不能使他躋身於戲劇家之林，遠不能與他詩詞的造詣相比。

這裏錄《安雅堂詩集》中較少噍殺之音的詩三首作結：

塞鴻våking未到燕城，載酒登樓雨乍晴。山色淺深隨夕照，江流日夜變秋聲。上方鐘磬疏林滿，十里笙歌畫舫明。空負黃花羞短髮，寒衣三澣客心驚。

《九日同姜如農王西樵
程穆倩諸君登慧光閣》

銀花爛漫委筠筐，錦帶吳鈎總擅長。千載專諸留俠骨，至今匕箸尚飛霜。

《刀魚》

秋水蘆花一片明，難同鷹隼共功名。檣邊飽飯垂頭睡，也似英雄髀肉生。

《舟中見獵犬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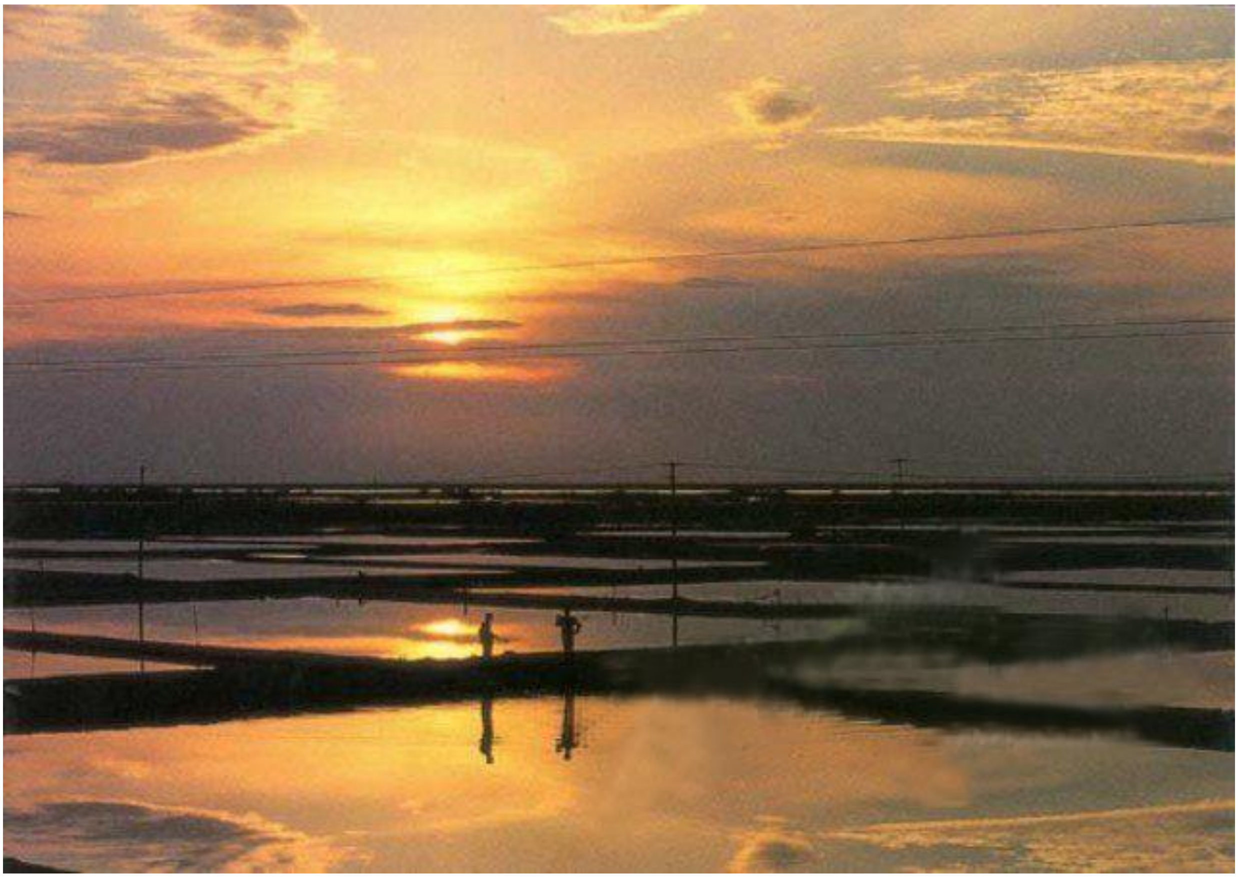
《安雅堂集》是宋琬的集名，但明代一代詩人之尾閭的陳子龍的詩集也叫《安雅堂集》，不過陳子龍的詩集後來刊刻時用了另外一個名稱，所以其名不彰，而一般人對宋琬的集名倒是很熟悉的。論詩和論人，陳子龍要比宋琬高出許多。

鹽筴出詩人

詩人，在長時期的古代社會中，大多爲上層家庭出身的讀書士子所獨佔。不論是家境貧寒，或吟詠對象取材於農民及田園生活，必然與社會高層人士有所聯繫，借以爲晉身之階。歷來所謂“隱士”，所謂“山人”，無非是“可憐一只雲中鶴，飛來飛去宰相衙”而已。歷代如此，清代當然並不例外。

但是在清詩的春季，卻有一位例外的詩人，便是吳嘉紀（1618—1684），此人僻處蘇北海濱，其地風氣閉塞，文風不振，他日日和煮鹽爲生的窮竈戶爲伍，旣無聲氣可通，又足不出蘇北泰州東淘一步，過的是極端貧困的生活，卻能日以吟詩爲事，唱出能夠反映這個時代眞實生活的詩篇，成爲一代的強音。他的一生雖大部分時間默默無聞，不爲世人所知，但到了晚年，由於一二著名詩界權威的賞識和延譽，竟得以出人頭地，成爲清詩的春季花圃中一枝獨秀花朵。他的名字在《淸史稿》中有傳，不可不謂淸詩中一個罕有的特例了。

吳嘉紀所以成名，得力於兩方面，首先是他所處的環境是爲任何詩人所未有的，這便是他長期生活在蘇北泰州的東淘，這個地方是兩淮鹽區的主要鹽場，居民都是靠煮鹽爲生的窮竈戶，他們畢生受盡官吏和鹽商的層



吳嘉紀的詩多寫於蘇北的鹽田上

層剝削，除了尚不會像一般文家所說的“食淡”之外，簡直是窮到體無衣、飢無食、居無屋的地步；可是靠鹽爲職掌和貿遷的官及鹽商，卻是那時社會的顯宦巨商。在淮揚一帶靠鹽致富的官商，其驕奢淫佚的生活，和竈戶的窮苦艱窘正成了一個顯明的對比。中國歷代的詩人文士，爲揚州的繁華唱出了無數的讚歌，卻從沒有一個對鹽的生產地和生產者有過什麼描繪。有之，則自吳嘉紀始。

吳嘉紀不但在貧困艱難的鹽區生活中生長，而且他所遭逢的時代，正是明、清易代之際。蘇北揚州屬縣一帶不但窮苦，而且還是兵家必爭之地。清兵入關之後，史可法以督師身份駐紮揚州，所屬州縣都分配給他所部的驕兵悍將，所謂“四鎮”。爲了爭奪揚州，四個總兵還來了一次火併。泰州東淘正處在這個漩渦中；而清兵由豫親王多鐸率領的大軍又正在這裏和明兵接衝，不論是明兵和清兵，其爲禍患於百姓都是並無二致的。吳嘉紀在《揚州十日》的紀事詩說道：

> 城中山白死生骨，城外水赤死人血。殺人一百四十萬，新城舊城內有幾人活！
>
> 我昔兵過獨還家，畦上髑髏多似瓜。鴨毛滿蹊舊狗死，籬菊自放霜中花。

在這樣貧窮與兵災雙重壓迫之下，吳嘉紀憑着他親身的見聞和遭遇寫出現實的詩篇，爲他的同鄉伙伴呼喊悲慘的境遇，這是在清詩的春季中任何一位卓越詩人的詩集中所不能見到的，如《贈張蔚先生》一詩云：

> 早夜煎鹽鹵井中，形容黧黑髮鬖鬖。百年絕少生人樂，萬族無如竈戶窮。

不但有人爲的禍患，而且天時的災祲也時常給飢寒的鹽民帶來不能抗拒的災難：

> 悲哉東海煮鹽人，爾輩家家足苦辛。頻年多雨鹽難煮，寒宿草中飢食土。壯者流離去故鄉。灰場蒿滿池無鹵。詔徠初蒙長官恩，稍有遺民歸舊樊。海波忽促餘生去，幾千萬人歸九原。極目黯淡煙火絕，啾啾妖鳥叫黃昏。

像這樣的詩，在衆多的淸代詩人中是僅見的。有人說他是“詩史”，甚確，但決不同於描繪軍國大事、帝王將相的詩史，他是眞眞爲社會最低層的老百姓而歌唱，使人們讀了透不過氣來，然而卻是那個時代的最強音。

能夠賞識吳嘉紀於鹽筴之中並多方爲之延譽的，是淸詩春季中的詩壇盟主王士禛和周亮工，沒有這兩位知名人士爲之提攜獎掖，吳嘉紀這個名字恐怕到後世也不會有人知道。

流放詩人吳兆騫

流刑是中國古已有之的刑名一種，俗稱充軍。唐、宋時期，南方還未開發，是瘴煙蠻荒之區，所以流刑都是充軍南方。到了清朝，東北、西北都入版圖，便改了相反的方向。南方苦熱苦瘴；北方則苦寒，冰天雪地，味道實在不好受。流刑也有輕重，最重的是發往極邊，“給披甲人爲奴”。披甲人大概是邊防軍士，給他們做奴隸，情況可想而知。流放的地點主要是在東北三省和西北新疆。在遼寧的是尙陽堡，在吉林的是寧古塔。那時新疆省還沒有建置，其地叫作回部，戍地是伊犁。寧古塔和尙陽堡，便是所謂“極邊”了。

犯流刑的也要看犯者的身份和地位，《水滸傳》中的林冲和武松屬於下層階級，由薛超、董霸之流押着，還要帶着枷銬上路，當然苦不堪言。但倘有錢或者是官吏，情況便大不相同，尤其是高級官吏。高級官員受處分，最怕是降職。一個堂堂的封疆大吏，革職不怕，遣戍也不怕，即使斬監候也還有救藥。若是降職，從一二品的總督巡撫，一下子成爲道、府班子，若要升遷到原來地位，需要爬多少年！更難堪的是平時的屬吏，現在反要脚韡手版，稱大人、卑職。遣戍充軍爲什麼不可怕，天怒一霽，立刻召回，還不是官復原職。因此遣戍路上的地方官，決不敢有所得罪，生怕一旦賜還召回，又是

大員。所以一路赴戍，還是四人大轎，只是人的頂子摘去了，轎子上面的一顆頂子也同樣摘去，一路迤邐行去，其實和平常沒有什麼兩樣。

清末參與新政的廣東南海人張蔭桓，雖從佐雜小吏出身，卻是天生異才，詩文比翰林、舉人還要高明，也可加入清詩冬季詩人的行列。戊戌變法流產，他的處分是流放伊犁。誰知他自恃慈禧太後對他還有好感，竟從戊戌（1898）起行，坐着沒頂大轎走了二年，到了庚子（1900）八月還逗留在甘肅蘭州，給頑固守舊派參了一本，就在蘭州就地正法。要是他早到伊犁，一條命就不會丟掉，辛丑議和，肯定會大有作爲，這是弄巧反拙的一個故事。

還有一個清詩的秋季重要詩人，便是鼎鼎大名的林則徐，他爲了燒鴉片得罪了英國，又得罪了穆彰阿，也是遣戍伊犁。行到鄭州，他的好友王鼎正以大學士在那裏治河。王鼎深知林則徐治河的本領，自知不及遠甚，便奏留在河工效力。經過林則徐的努力，黃河不久即告安瀾合龍。王鼎在奏報勞績時，當然以林則徐列名，以爲雖不能開復原官，遣戍總可以將功贖罪的。不料道光皇帝實在顢頇糊塗，竟然不理會王鼎的奏請，仍着林則徐負戈伊犁。王鼎覺得實在對不起朋友，竟然爲此自殺身死，遺疏嚴劾穆彰阿，也被人掉了包，無從上達，這是清中葉的一件大案。但一到太平天國起義；朝中無人，只得又把林則徐從伊犁召回，官復原職，還加欽差大臣去鎮壓洪、楊。只是林則徐未曾視師即星墮軍中，把蓋世功名留給曾國藩了。

再有一個中法甲申之戰在馬尾喪師的張佩綸，遣戍黑龍江，他是光緒中清流黨四諫之一，後來成爲李鴻章的女婿，現代著名女作家張愛玲的祖父。他在黑龍江戍所的日子實在舒適，黑龍江將軍對他噓寒送暖，贈煤餽物。不久便悄悄的回京，只可惜做了李鴻章的女婿，要避嫌不敢舉賢不避親，所以始終閒居家中。直到辛丑議和，才賞一個翰林院編修，襄助丈人和外國公使周旋。

以上所說的是高級官吏的流放，若是一般罪人，那就適與相反，苦況難言了。不過只要是騷人墨客，也決不同於林冲、武松那些粗胚，冰天雪地之中，也不乏締結詩社，詩酒倡和的雅舉，而且對那些不毛之地傳佈文化，確也起過不少的作用。

在淸詩春季被流放到東北的詩人中，最著名的便是以《秋笳集》名世的吳江人吳兆騫。吳兆騫（1631—1684），字漢槎，自幼即有文名，中順治十四年順天鄉試舉人，這一科是淸代文字獄第一起大獄，主考左必蕃、趙晉出賣關節被人舉發，兩主考判處死刑，所中舉人一律在殿廷覆試。覆試的待遇是科舉史上沒有前例的，由兩個兵士手持大刀挾持一個舉子應試。大才磐磐的吳兆騫竟然嚇破了膽，把筆不能成一字，交了白卷，便成爲罪有應得，遣戍寧古塔。兆騫的友人沒有一個不爲之冤屈，但因爲交白卷是事實，無法爲之解救，這樣一去塞北便是二十年。

順治丁酉科場大獄，是淸廷首次對漢族文士立威，在京的和遠在江南的文士有狐死兔悲、物喪其類之感，紛紛爲之營救解網，其中不乏政府重要官吏，但因爲都是



吳兆騫被流放於如此的冰天雪地，
滋味肯定不好受。

漢人，並無實權，只有創作詩詞，以相慰藉並發洩自己的牢騷而已。其中最傳誦一時的，是吳偉業的《悲歌行贈吳季子》，用想像的手法描寫寧古塔的雪地冰窖，所謂白山黑水，在吳偉業筆下是“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這樣的慘境。

更有名的是吳兆騫最好的朋友顧貞觀兩闋《金縷曲》：

> 季子平安否？便歸來萬事無恙，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歸日急繙行戍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

當時當權的滿臣中，只有納蘭·明珠有辦法營救吳兆騫，顧貞觀的《彈指詞》是和明珠之子性德《飲水詞》齊名的，性德讀了《金縷曲》泣曰：“河梁生別之詩，山陽死友之傳，得此而三。此事三千六百日中，我當以身任之。”性德願意負擔十年中吳兆騫家裏的生活，但貞觀認爲人生有幾個“十年”，他竟然爲了朋友，長跪在明珠前面，逼使明珠不能不出力使吳兆騫生入玉關。及兆騫賜還，可惜老詩人吳偉業早已去世了，王士禛感慨道：“太息梅村今宿草，不將老眼待君還。”吳兆騫經過千辛萬苦，生入玉門不多時便去世了。

吳兆騫的詩，在唐人近李頎、高適、岑參，在明人近七子，《秋笳》一集在淸詩的春季中別樹一幟，這是其遭遇所造成的。茲錄其在戍中懷友一律：

歲晚霜清木葉愁，病餘蓬徑愧淹留。紫台一別悲蘇李，青草頻年哭應劉。歸夢關涉長伏枕，客心天地各驚秋。明朝誰是登高侶？零落黃壚豈再遊。

和吳兆騫同郡同科同戍同還的清詩春季詩人，還有孫暘。孫暘，字赤崖，他的詩名雖不逮吳兆騫，卻因爲他的兄弟孫承恩是順治十五年戊戌科的狀元，僅後於孫暘遣戍的一年，傳說是順治對孫暘的處分內疚於心，因而對孫氏有所補償之意，可孫承恩並不稀罕儻來的富貴，中了狀元之後就閉門不出，這就令當時詩人有許多“南枝向暖北枝寒”的詩章可以吟詠了。

滿族詩人

滿族崛起黑水白山之間，從遊牧到建成帝國，爲時不久，強弓鐵騎，固其所長，文化卻非常落後，到了天命、天聰時期，才有圖海其人創造文字，這便是入關後所謂“清書”或“國書”。書籍著述，當然更談不上，據說爲作戰行軍所必備的軍書，也只依靠從漢文翻譯過去的《三國演義》小說，只靠諸葛亮指揮戰役而不知孫吳、司馬爲何物。

但是剛走出沙漠森林不久的民族，血液是新鮮的，不像古老民族的僵化。滿族正和日耳曼民族一樣，很快就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來壯大豐富自己，所以在入關不久之後，在文化方面，尤其在詩詞方面，較之漢民族毫無遜色。

清廷在入關前後，除了廝殺之外，政治經濟，一無所長，先依靠了一個范文程，後又收降了一個洪承疇，兩個都是漢人，洪承疇事迹知道的人多了，范文程是杖策軍門，從中原南方去見努爾哈赤的。范文程是留侯（張良）式的人物，對文化卻似乎並沒有什麼貢獻。

滿族的文化趕上漢族，都是靠自己的善於學習，不到半個世紀，即已楚楚可觀。到了康熙年間，出了一位大詩人兼大詞人納蘭．性德，性德的詞，縱不能稱清代第一，總也數一數二的了。到了清詩的夏季，又出了一

位名震寰宇的大詩人、大小說家曹雪芹，有人說他是漢人是不對的，曹雪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滿族作家，有人說曹雪芹的遺詩不過片言隻字、斷楮零箋，怎能說他是詩人。這又錯了，一部《紅樓夢》中有多少詩詞，既然《紅樓夢》作者是曹雪芹，他那些代人立言的詩詞能說不是曹雪芹的作品嗎？

再下去滿族的詩人愈來愈多，到了淸詩的冬季，盛昱和寶廷兩位滿族詩人在同光體詩壇上，也是數一數二的了。

不但一般滿族士人如此，更令人驚奇的是沖齡登上大寶的小皇帝順治帝，也竟是一位詩人。在淸詩的春季百花園中管領羣芳，效一句過去臣下討好的話，眞是“天縱聖明，睿知邁古”了。順治不像他的兒子康熙和曾孫乾隆那樣，編成汗牛充棟的詩集，倒是自己親自動筆的。據翁同龢的《翁文恭日記》，北京西山天太山慈善寺，俗呼爲魔王廟，有順治題壁詩，詩是七古，很長，只能錄開始一段：

> 天下叢林飯似山，鉢盂到處任君餐。黃金白玉非爲貴，唯有袈裟披最難。朕乃山河大地主，憂國憂民事轉繁。百年三萬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閒。來時糊塗去時迷，來去昏迷總不知。不如不來亦不去，亦無歡喜亦無悲。未曾生我誰是我，生我之時我是誰?

這種亦文亦白“語錄”式和“偈”式的詩，恰像是這位開國皇帝的親筆，而他的兒子和曾孫可以覆瓿的詩，明



單以《紅樓夢》的詩詞而論，曹雪芹已不愧稱
爲清代的大詩人。

眼人一看便知道有“機要秘書”爲之捉刀，那些捉刀人都是淸詩春夏兩季的重要詩人，將在其他章節中敘述。

乾隆是文事武功並重的十全老人，他比祖父康熙當然有機會多唸了一些書，又能寫一手字，爲人所熟知的是他的詩和字都另有一格，姑稱之爲“乾隆體”吧，實在讀了令人發笑，但爲之代筆捉刀的詩人書家則必須按着他的作風去代他吟詩寫字，這也不是很容易當的差使。他當皇子的時候，已經編成一部卷帙可觀的《樂善堂集》了，這裏面的想都是他自己的大作。

人家說乾隆是海寧陳閣老（世倌）的兒子，實在是一個漢族血統的皇帝，這是漢人自我慰藉的想法而已；事實上乾隆很替同族人爭地位，舉一例足以說明。他的詩友兼捉刀人江南老詩翁沈德潛選了一部《國朝詩別裁集》，是淸詩的春夏兩季詩人作品的選集，起入關（1644）迄乾隆二十五年（1760）。沈德潛原已選過唐、宋兩朝詩別裁集，可說是夏季詩人中詩評和詩論的權威。到了乾隆四十一年（1776），皇帝對這位詩友忽然板了面孔（其原故在另文自有交代），指摘沈德潛不該把錢謙益、屈大均、吳炎等人選入而置滿族詩人於卷末，嚇得他連忙於該書再版時重行釐訂更正，於是滿族詩人允禧、弘曣、德普、恒仁、塞爾赫等作品便從卷末移置到卷首上來了。君相能造命，當然更能造詩人的地位，信有之！

平心而論，這幾位詩人的詩，固然不能和錢謙益、屈大均相比，但的確也並不壞，如愼郡王允禧的《月夜台上聽友人彈琴》：

高台夜色深，月下聞清琴。能使座中客，俱生塵外心。石泉瀉寒碧，霜竹折孤音。曲罷長天靜，忘言一整襟。

這詩堪與唐人常建五律媲美，難爲這位宗室王子！這些滿清貴族詩人，總有些貴介氣，輕易不肯署名，凡是做詩寫畫，總是具名什麼“紅蘭主人”、“紫瓊主人”之類，使人不敢比肩仰視。

但曹雪芹畢竟是滿族中屬於低層人物，連果腹都要“擧家食粥酒常賒”，而詩則是無愧於清詩的夏季大詩人之稱，誰有本領能夠替十二金釵及寶二爺捉刀寫出各不相同風格的詩呢！

捉刀詩人高士奇

在談滿族詩人時，曾說到了清朝開國皇帝順治，節錄了他的西山魔王廟的題壁詩，並且肯定此詩確是出於他的親作。順治並沒有什麼卷帙浩繁的詩集留給《四庫》，這是因爲草創之主尚無“稽左右文”的閒暇。

到了康熙和乾隆時代，天下已定，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止戈爲武，當然要擺出右文的架子，做皇帝的便要身先爲天下創。翻開《四庫全書》目錄，康熙和乾隆詩文集的卷數，準會嚇人一大跳，其卷帙之浩繁，實令一個窮年寒窗的終身著述的文人，也望塵莫及。難道做皇帝的果眞是天生睿智，三頭六臂，於日理萬機之餘，還有三宮六院，怎有功夫從事那麼多的著述？

現代不論中外，凡是中級以上的官吏，總有一名機要秘書，代他撰擬一切講稿、文件；但古代的君王，那可不行，尤其是詩文，决不能像制誥詔諭，可以由臣下代擬，因爲詩文究竟是屬於私人的著述，不能讓別人知道是他人的代筆。然而皇帝的詩文是由他人捉刀的，畢竟是公開的秘密；不過這個秘密，捉刀者、被捉刀者以及讀者三方面，都心照不宣，不能說破，尤其是捉刀者，更要謹愼小心，切不能有絲毫洩漏，否則就會大禍臨頭。

康熙八歲登基，即使以後再有近十年在書房讀書的機會，恐怕也不會高明到那裏去。這位皇帝雄才大略，酷喜學問，不過他愛好的是實用之學，尤其是數學，對詩文未必能多下功夫。在故宮文物中所存他的書法，近於小學生的孩兒體。然則到今天尙存那麼多的詩文集和在鎭江、杭州的石刻宸翰，豈是他的親筆？

乾隆的情況要比他的祖父好一些，因爲他做“阿哥”的日子很長，足有讀書習字的機會。不過他的詩和字都別創一格，只好稱之爲“乾隆體”罷。字是肥碩多肉，好像楊玉環的身子，詩則之乎哉耶都可入詩，寒山，拾得和王梵志的詩，加上富有四海的帝王氣，便可爲“乾隆體”的詩下注脚。在他汗牛充棟的御製詩中，據說《樂善堂集》是他在做“阿哥”時便已編寫的，想來還是他的親筆，因此還有可讀的篇章。

到了十九世紀末葉二十世紀初，由於西方文明的侵入，求實精神有了萌芽，帝皇詩文書畫的神秘性略有些明朗化。跟乾隆一樣被稱爲“老佛爺”的慈禧皇太后，她居然聘請一位雲南女史繆素筠在宮中代她揮灑“宸翰”，宮監稱爲“繆先生”，這已成爲公開的秘密，三方面都可以無所顧忌地公開談論，這不可不謂進了一大步。

康熙、乾隆兩朝一百二十一年間，究竟有多少捉刀詩人，從沒有人敢筆之於書，因之也無法知道和統計，只能從蛛絲馬跡中可以鈎稽到三位捉刀詩人，因爲他們都是淸詩春夏季中重要的詩人，所以迹象不無可尋之處；其他捉刀人，則一如曹阿瞞侍立的人一樣，莫知其

《送孫愷似孝廉》

沁園詞客舊知名，
曾在楊花渡口行。
佳句已傳箕子國，
歸心又向闔閭城。
白蘋風細扁舟穩，
青桂香濃小苑清。
吾亦有廬江上好，
秋來鱸鱠不勝情。

——高士奇

爲誰何了。

第一個是康熙朝的高士奇（1692—1752），浙江平湖人，號江村。凡是僱用捉刀人，必須出於左右親信的薦舉，高士奇和查愼行都出於納蘭・明珠的進薦，納蘭・明珠是滿族的能人，大詞人納蘭・性德的父親。高士奇當初只是個落魄書生，連明珠太傅的門階都踏不上，只好做做宰相家人七品官安儀周的門客，但有本領的人總有機會脫穎而出，在一次偶然的機遇中給明珠賞識了，大加寵幸，而且不久還推舉給皇帝，作他詩文書畫的捉刀人。這樣高士奇一跤跌到青云裏，不由科第途徑而得到翰林院官職，死後還得到後來左宗棠百戰功勳才取到的文恪美謚。

高士奇很有才學，但人很不安分，有了這樣的優



江蘇鎮江金山寺。康熙曾在此御筆親題
“江天一覽” 四個大字。

差，自可在外出賣風雨雷霆，營利結黨，廣收貨賄。當時明珠是北黨領袖，他又和徐乾學勾結，成爲南黨主角。對舊府主明珠旣勾結又鬥爭，鬧得烏煙瘴氣，不可開交。京師那時有謠諺云：“四方異寶歸東海，萬國奇珍貢澹人。”東海是徐的郡望而高士奇字澹人，一個窮書生不數年便富埒王侯。

高士奇眞有一套，他扈從康熙巡幸江南時，登鎭江金山寺眺覽大江，帆檣林立，氣象萬千，康熙不免要附庸風雅，灑翰立碑以留紀念，但急切中想不出要寫什麼。高士奇辨貌觀色，趨前僞作磨墨狀，於手掌中寫“江天一覽”四個字，康熙一見大喜，下筆一揮而就。這塊刻着康熙御筆“江天一覽”四個大字的豐碑，至今還屹立在金山寺前長江岸側，其實詞和字都出於高士奇的捉刀。

另外，西湖十景如“平湖秋月”、“柳浪聞鶯”等處，都蓋有金碧輝煌的御碑亭，也樹立着康熙的擘窠大字的石刻，碑陰還刻着刻碑官吏的名銜，三行名銜中最後一行便是高士奇。當然和金山寺那碑一樣，都出於高士奇的捉刀。

康熙不失爲英明之主，高士奇的胡作非爲，難逃他的睿鑒，只好忍痛割愛，命他出京修書，以示保全。高士奇宦囊已豐，便僑寓西湖，建起一座精致的房宅，這便是至今猶存的“高莊”。

捉刀詩人續談

康熙失去了高士奇，當然需人補闕，他有了高士奇的前車之鑒，以後延用的，必須要謹愼縝密、處處小心的人，既不能洩密，又不能借此招搖。這樣的人才，還要命他的內大臣明珠找尋薦擧。

明珠府邸有一位教他小兒子揆敘（大兒子性德已經去世）唸書的西席老夫子，就是浙江海寧人查愼行。他既是淸詩春季的一位重要詩人，又是宋派詩人的班頭。此人爲了飲酒觀劇，無端惹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被驅逐出京，隱匿了一個時期，才改掉原名和籍貫，重到京師。從嗣瑮改爲愼行，便是有懲於過去之放達，以後要愼言愼行之意。他的確已深自改過，明珠認爲可靠，便薦給康熙。一試之後，覺得滿意，從此便成爲康熙第二個可考姓名的詩文捉刀人。屢試不第的擧子，一下子便掇二甲高科進入了翰林院。

翰林院的編修、檢討等官，金馬玉堂，位雖淸華，俸給卻微薄，無法給養家室，所以叫作“窮翰林”；又因爲地處淸華，也叫作“淸翰林”。當窮而又淸的翰林，唯一的希望是放學差。學差分兩種，一種是三年一任的學政，俗稱學臺，這個差使還落不到編、檢頭上，像江、浙等大省，往往由二品大員掛兵部侍郎銜的人才可放。所以編、檢只有希望放各省的主考、副主考。據說凡是

潔身自好愛惜羽毛的主考，放一次差，下半生的生計便可無憂，連求田間舍的資金都有了下落。編、檢放學差須經過考試，考在高等的便可有望，但也不一定根據考試，有時“簡在帝心”，隨時硃筆可以劃出。（筆者有一位當翰林院編修的祖輩，幼時常聽他講得放一任陝西鄉試副主考的故事：那時光緒皇帝親政，兩宮垂簾，大事均取決於母后，小事則可由兒皇帝作主。那年陝西正主考放的是“管廷鶚”，副主考呈由光緒圈定，皇帝拿了長長一篇名單好一陣子，結果硃筆圈出的竟是筆者的祖輩，因爲他的運氣好好在名字取得好，大名叫作“楊家驥”，光緒認爲和正主考是天生巧對，工整無與倫比。）

查愼行因爲片刻不離皇帝左右，決不能長時期離開北京，所以始終挨不到學差，雖然賞賜頻繁，恩禮有加，實在爲數微薄，只夠補貼澆裹，所以始終是個窮翰林。到了放歸田裏之日，以垂白之年，還得奔走四方，到處打打抽豐，實在是做了一樁既榮耀又窮困的苦事。

當時全國十八省，江蘇、安徽合爲江南大闈，陝西、甘肅亦合一闈，每逢鄉試之年，有三十多位主考待放。它是按路程遠近分批發放的，一開年首先放貴州一省，因爲八月鄉試，路上便要走五六個月陸程，而順天、山東則要遲至七月才放。差使的優劣，不問省份之大小富瘠，而是路程要愈遠愈好。好就好在一個遠字，一路迤邐行來，遇尖打尖，逢驛宿驛，按照功令，凡是住宿的被衾帳席以及杯箸盆碗，用過之後，都應歸主考所有。這些龐雜郎當的東西，當然不便席卷而去，慣例

是結價折付現金。所以五六個月近二百天的行程，每天的折價便很可觀；何況每到一處，必以扇面楹聯贈送當地官吏紳士，所得的贐儀又大有可觀，這便名爲“抽豐”，又稱“秋風”，言如秋風之掃落葉。

查愼行這位捉刀人，雖然小心謹慎，當差之外，不敢與問外事，但是康熙年間，諸皇子各立門戶，培植黨羽，準備爭奪大寶。以查愼行日在帝側的地位，自然是爭相發展的對象，像他的胞弟查嗣庭，早已被皇八子如允禟、允䄉輩所羅致，成爲入幕之賓。淸代唯一的皇太子允礽，對愼行又時加靑睞。幸而查愼行對此把握得很好，到處應酬卻又沒有滑到某一方太遠，所以也沒開罪後來奪得寶座的皇四子胤禛（雍正），這不得不歸功於早年的蹉跌及以後的定力。所以胤禛即位之後，查嗣庭不免於刑戮，闔族遣戍。愼行雖亦遭牽連，卻得保全一條老命，連充軍都赦免了。

充當乾隆捉刀人要比康熙時困難得多，原因是乾隆本人也能舞文弄墨，不像代康熙捉刀只要任自己作風做去便可。乾隆的詩和書法都別有“乾隆體”的風格，捉刀人必須學會“乾隆體”才好替他捉刀，這非下一番苦功揣摩不可。

乾隆皇帝的捉刀人可考的，是淸詩夏季的一位極重要詩人蘇州沈德潛（1673—1769）。沈德潛，號歸愚，他不但是詩人，而且還是詩論家、詩選家，他的詩論宣揚溫柔敦厚的詩教，不爲偏激之論，正配合着乾隆的盛世，因之大得乾隆的激賞。在晚年一登進士之第，便和皇帝結成詩的魚水之歡，皇帝竟然稱他爲江南大名



乾隆的御詩原來很多由沈德潛代筆的

士、朕之詩友、大詩翁，籠絡無所不至，目的是有這樣一位大詩人爲他捉刀，使十全老人的文學一全更加完全。

沈德潛活到九十七歲，放歸之日，待遇優渥，皇帝好像老朋友似的依依送別，死後恩恤有加，賜謚立碣。但是沈德潛畢竟老悖糊塗，他的子弟學生也是荒謬絕倫，在編印沈德潛的詩集時，竟然把他的捉刀詩文全都編了進去。這一下可洩漏天機，使皇帝露了餡，心中萬丈怒火，卻又不便正面發作，以免欲蓋彌彰，只得忍受下來。過了一個時候捉到一個錯處，立刻臉皮一翻，不認這位“詩友”的賬，下詔歷數其過失，予以刨墓撲碑的處分，方出此一口惡氣。

斷送功名到白頭

清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發生了一件國喪期內演《長生殿》傳奇的案件，當時在北京參與觀劇的名士，亦即屬於清詩的春季詩人，多遭到褫革的處分，有的從此一蹶不振，有的過了一陣東山再起，是文士的一場浩劫。其時有人以詩嘲之曰：“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嘲弄的對象是指誰，恐怕對任何一個遭褫革的人都可以；但最爲恰當的，自然是《長生殿》傳奇的作者洪昇。

自古詩人多窮，韓愈、蘇軾等都是命遭磨蝎；身名俱泰，克享遐壽的不是沒有，爲數畢竟不多。窮而薄命，自然更爲可憫，然而詩卷長留天地間，爭世間數年的富貴與歲數究竟沒多大意義。唐代有一位薄命詩人李賀，久爲千古薄命詩人的代表，千載而下，清代詩人黃仲則也膾炙人口，博得多少後人的憐惜與同情。然而薄命還比苦命略勝一籌，李賀還有母夫人的母愛，黃仲則尚有畢沅的一擲千金，而苦命的則無往而不運蹇，連死亡都不克善終，那眞是苦命之至，這便是洪昇的遭遇。

洪昇（1645—1704），號稗畦，浙江錢塘人，出身於富貴清華的家庭，他的太丈人黃機且爲清朝的大學士。一生下來，便逢到清兵南下，過的是亂離逃難的生活，以後迄無寧歲。

到了廿多歲，因有人挑撥離間，致使家庭發生裂痕，不得不獨立生活，進入了貧困的境遇。但憑着他的天資與好學，聲名卻蒸蒸日上。在京師之日，所與京遊，都是一時名流。但是始終不利於科場，到了中年，還是一個國子監監生。他不但是個詩人，更令人傾倒的是妙諳詞曲，是清代著名戲劇家之一，所譜《長生殿》傳奇，是可演可唱的名劇。“一時朱門綺席，酒社歌樓，非此曲不奏，纏頭爲之增價。”便是說梨園子弟爲了演奏《長生殿》，得到好處不少。伶人們想報答他，於康熙二十八年八月醵資招請都中名士觀演此劇爲洪昇壽。時日不利，値康熙的孝懿皇后佟氏國卹未滿期，被給事中黃六鴻疏劾洪昇等人於國卹張樂爲大不敬。但康熙帝對此案並不想興大獄，只是把洪昇革去國學生籍，驅逐回南以示薄懲。這樣，便使一代才人蹭蹬終身，永無進身的日了，即所謂“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

《長生殿》一案雖未成爲大獄，因爲得罪的都是知名的文士，所以在當時是一件大事，其起因究竟爲何，傳說紛紜，大致有三種原因：第一是康熙朝南北黨之傾軋，得罪都是南黨中人；其二是參與觀劇諸人中，以趙執信官位較高，他恃才傲物，開罪了一個由知縣行取入京爲給事中的黃六鴻。黃六鴻去謁趙執信時以土儀（土產）和著作爲贄，而趙氏答以“土儀拜登，大著奉璧”。這個黃六鴻也算科目入身，他的著作竟叫《福惠全書》，即是“做官秘訣”，其遭趙執信璧還，確是自取其辱。黃六鴻受此奇辱，有了機會，便進行報復。在趙執信固

然咎由自取，洪昇則不免有池魚之嘆，這也是命苦。

至於第三，則別有奇想，說洪昇的《長生殿》是借古諷今，雖搬演唐明皇和楊玉環的故事，卻影射清代開國皇帝順治和董鄂氏的生死情緣，因而康熙帝和滿洲大臣均深惡此劇，借故驅逐禁演。此說最爲荒誕不經，洪昇出生之日，明朝已經覆亡，而他的家族和妻黨，都是應舉做官，傾心新朝，並無故國之思。洪昇本人也一意向上爬，決無膽量諷刺時政，顯然出於附會。但同時詩人張奕光的《迴文集》有《書洪昉思先生〈長生殿〉傳奇後》一絕云：“《長恨》有歌悲國破，返魂無術少仙游。傷心最是《鈴淋雨》，讀罷常呼大白浮。”然此詩爲迴文體，倒讀之則爲“浮白大呼常罷讀，《雨淋鈴》是最心傷。遊仙少術無魂返，破國悲歌有恨長。”這就很明顯指出《長生殿》是隱寓破國亡家之恨。究竟如何，後人難以判斷。

洪昇的知己友人李孚青曾有《偶憶洪昉思己巳被斥事即題其集後》絕句足以概括《長生殿》一案的情況。

一

奉敕填詞歲月多，飄零何處睹黃河。六朝樂府平生熟，不記元嘉讀曲歌。

二

《長生殿》比《醉蓬萊》，桂子飄香是禍胎。即日杭城得歸去，保安十載事堪哀。

三

捶楚功名已放休，依然捫虱見王侯。網羅

纔脫蛟龍窟，豈憶西湖是濁流。

這位苦命詩人雖然也活到花甲之年，卻蹈李謫仙的故蹤，於中秋夜飲西湖大醉，失足墮水死，這是李孚青第三首詩末句的注脚。一說於六月初一乘船經烏鎮酒醉失足墜水而死，因楊貴妃生日是六月初一，所以時人有“太眞生共可憐宵”之句。

洪昇是王士禛的高足弟子，王士禛對他也是另眼看待，他的《稗畦集》詩是淸詩春季詩人中的高唱，如五律《寒食》云：

七度逢寒食，何曾掃墓田。他鄉長兒女，故國隔山川。明月飛烏鵲，空山叫杜鵑。高堂添白髮，朝夕淚如泉。

七絕《釣臺》云：

逃卻高名遠俗塵，披裘澤畔獨垂綸。千秋一個劉文叔，記得微時有故人。

詩雖寫得好，總不免帶些苦味。

世變滄桑拙政園

蘇州的園林，甲於中國，而拙政園又甲於蘇州。蘇州其他名園，歷史都不算悠久，差可與之媲美的留園，是盛宣懷父親盛康的別業，創建不過百餘年，而拙政園則有史可稽的已達五百年之久，其盛衰興廢，使人有閱盡滄桑之感。

拙政園在蘇州婁門內，在明代爲大宏寺，巡按王獻臣罷官居吳，侵其基以爲園，用潘岳“拙者之爲政”句以爲名，他的子孫一場豪賭，輕易地一擲輸給他人，得主爲徐姓。清初錢謙益和陳之遴先後得之。其後爲駐防將軍府邸，都並沒有什麼將作變動。

到了吳三桂以平西王開藩云南，爲了表示輸心清廷，將一個兒子留在京師，一個女兒和女婿住在蘇州。女婿叫王永寧，仗看三桂的地位勢焰薰天，炙手可熱。他把拙政園徹底修建一新。建築材料和規格，很多“逾制”，楠木廳中的柱礎，皆刻昇龍。撤藩事起，都遭籍沒輦送京師。自此之後，一直作爲官署，一度改成八旗會館。太平天國佔領蘇州時，據說曾作爲李秀成的忠王府。抗日戰爭時期，汪僞把江蘇省會遷到蘇州，這裏又成爲僞省政府所在地。近年始修葺一新，供旅遊者玩賞。

談拙政園故事，並不在那貴戚名豪、高官顯宦，而



拙政園景甲蘇州

是此園曾爲淸詩的兩位大詩人擁有過，而兩位詩人所攜的眷屬，又都是淸詩春季中的主要女詩人，一個是秦淮魁首，一個是仕女班頭，名園紅粉，相得益彰，爲拙政園生色不少。

錢謙益攜柳如是僦居此園，爲時不久，且謙益資力，也只有在園之一隅，構曲房數椽以媚河東君，在這裏可以置之不論；而陳之遴是以淸廷大學士身份，當然遠非錢謙益可及。但是可惜的是這位海寧相國，雖擁有這所名園，卻從未一日自享林泉之樂，兩次政治波瀾，落得遠戍遼東，第二次便客死戍所，只能化鶴歸來。

不過他的妻子徐燦卻在拙政園住過一陣子。徐燦，字明深，號湘蘋，杭州人，陳之遴的繼室。陳之遴的詩名在淸詩的春季中不逮其夫人遠甚。在整個淸詩詩壇上，徐燦的詩可說是壓倒羣芳，柳如是雖差堪比肩，但因有錢謙益這位大詩人爲她潤色，就不能和徐燦相提並論了。

吳偉業歌行中，有一首《詠拙政園山茶花》七古，是吳集中的高唱，堪與他的《圓圓曲》並傳。這首詩寫的是山茶花，但詠物起興，實際上是詠陳之遴及其一家的遭遇，其中還包括對自己的影響。讀之感慨傷懷，悲涼嘆息，不能自已。吳偉業和陳之遴的關係，非常密切，既是政治上的汲引者，又結爲兒女姻親，他的女兒嫁給陳之遴的兒子陳直方。陳之遴在政治狂瀾中沒頂，吳偉業失去了奧援，女婿隨父遣戍，女兒的終身無依，種種失意匯集於寫詩之時，而回顧昔日繁華，猶如一夢之中，感慨何極！

原來陳之遴和陳名夏同以明季的高官降清，仍得留任政地，不久即捲入滿漢南北之爭。陳名夏是江南溧陽人，狀元出身，和之遴時稱兩陳。這些降臣，很不識相，以南人兼漢人的身份，事事要向滿人和北人爭地位、爭權利，豈不是自討苦吃。陳名夏竟落得身首異處，陳之遴則戍死遼東。

吳偉業隱居了十年之後，靜極思動，趁兩陳在政地，扭扭捏捏應召赴京，但一到京師便碰到兩陳靠山已倒，奧援無人，原來的希望落空，只得到一個國子監祭酒的冷官閒曹。朝中無人莫做官，過了一年，只好襆被回南。

《詠拙政園山茶花》於歷敘拙政園盛況後，說到陳之遴滯留政地，不能平泉獨樂，而政治狂飇忽起：

> 灌花老人向前說，園中昨夜零霜雪。黃沙淅淅動人愁，碧樹垂垂爲誰發。可憐塞上燕支山，染花不就花枝殷。江城作花顏色好，杜鵑啼血何斑斑。花開連理古來少，並蒂同心不相保。名花珍異惜如珠，滿地飄殘胡不掃？楊柳絲絲二月天，玉門關外無芳草。縱費東君着意吹，忍經摧折春光老。

這裏包括了陳之遴、徐燦、陳直方，他的女兒，再加上他自己。結語云：

> 看花不語淚沾衣，惆悵花間燕子飛。折取一枝還供佛，征人消息幾時歸？

寫詩時陳之遴和他的女兒都還在世，此爲女兒及女孫祈禱，希望直方能早日回來，不知道這一切以後更成爲泡影。

徐燦隨同陳之遴的母親闔家遣戍，陳母得先南還，徐燦有《送方太夫人西還》一律云：

> 舊遊京國久相親，三載同淹紫塞塵。玉佩忽攜春色至，蘭燈重映歲華新。多經坎坷增交誼，遂判雲龍斷夙因。料得魚軒回首處，沙場猶有未歸人。

愁雲慘霧中，仍不失和平氣象，此徐燦之所以爲淸詩春季中女詩人壓卷之作。

冒襄與董小宛

冒襄（巢民）爲明季四公子之一。冒這個姓氏很稀少，在元明之前是沒有此姓的。他們本是奇渥溫氏，蒙古人；入明之後，便改了冒姓。冒襄的父親冒起宗，明季做過外吏，歸如皋築水繪園，饒泉石之勝，成爲一時名士雅集的勝地。

冒襄、侯方域、陳貞慧、方以智合稱明季四公子，這四人都是名父之子，甲申南渡，又皆聚集在南京，桃葉渡頭，秦淮燈火，挾妓飲酒，崇尚氣節，《留都防亂公揭》之攻訐阮大鋮，四人均與其役。大鋮切齒痛恨這批名士，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陳貞慧不幸置之牢獄，冒襄逃而倖免。南都覆亡之後，歸隱如皋，堅臥不出，屢被薦“山林隱逸”及“博學鴻詞”，均不爲之動。其他三位也相約不仕清朝。但云亭山人孔尚任的《桃花扇》傳奇要把侯朝宗留一條不干凈的尾巴，致使小扇墜李香君成爲一齣悲劇的結局，卻令人難以明白。其實侯朝宗在清朝不得已出去應河南鄉試，只中了一個副榜，連舉人都沒有中式，以後也不曾做官，算他是失節的貳臣，總說不大過去，云亭山人大概也過分了一些吧！何況侯朝宗曾勸過他的好友吳偉業不要出仕，吳偉業在北上再出時有《懷古兼弔侯生》一詩，結聯云：“死生總負侯嬴諾，欲滴椒漿淚滿襟。”吳偉業當時並無異詞，何云亭山人之喋喋爲！

四公子中學問最廣博的是方以智，做了和尚又反初服，拳拳故國至於終身；侯方域的古文，在桐城成爲宗派之前，是首屈一指的大家，雖然科場論命不論文，也不致兩中副車，當亦是迫於形勢不得不聊以塞責而已。

四公子還有和明季士習相同之點，即是大家都在秦淮有一個紅粉知己，《桃花扇》的故事無論矣，陳貞慧也有一個年華老去的李貞麗，是李香君的假母；冒襄的一位便是董小宛。

董小宛，名白，早年著籍秦淮，歸冒襄爲側室，早死，冒襄著有《影梅庵憶語》，語意悱惻，爲一時所傳誦。據《憶語》所說，董小宛是在盛年夭亡了。但何以猶有與開國皇帝一段虛構的情史？此乃《憶語》中文字有些隱隱約約，模棱兩可，使後人猜測董小宛未必眞的夭死，冒襄以死者相憶，實迫於無可奈何而故弄玄虛。此說倒也有幾分道理。

首先是甲申、乙酉之際，淸兵南下，南明小朝廷劃江而守，史可法以使相之任督師揚州，部下四個騎兵悍將的總兵分據淮揚一帶爲防地，苛徵暴斂，姦淫擄掠，無所不至。如皋是揚州的屬縣，正處在漩渦之中，這位水繪園主人和他的眷屬的艱苦生活就可想而知。

冒襄的好友吳偉業在集中有《題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七絕八首，其七、八兩首云：

亂梳雲髻下妝樓，盡室倉皇過渡頭。鈿合金釵渾拋卻，高家兵馬在揚州。

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



《多鐸入京圖》

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

這兩詩問題都出在第四句。“高家兵馬”指高傑的隊伍，這個跟李自成起兵的無賴，爲了爭揚州的地盤和劉良佐、劉澤淸、黃得功等三總兵大動干戈，鬧得史可法束手無策，不可開交，老百姓爲躲避其兇焰，逃過姦淫擄掠的災難，顛沛流離的痛苦，是可以想像的。董小宛是否能逃過這次浩劫，想來是頗難倖免的。

即使能僥倖免罹於難，到了翌年乙酉，“荒唐王爺”豫親王多鐸率大批淸兵南下，他的軍紀是可想而知的，而“子女玉帛”又是淸軍慣常的戰利品，膾炙人口的多鐸與江南名孀劉三秀的故事，也決不止一樁。

這裏不是把順治和多鐸兩叔姪掉一個位置，而是說多鐸的部將跟他們主帥同樣荒唐的也實在不少，這便是吳詩第八首第四句的由來。既然說到“墓門”何必再提“侯門”？冒起宗和冒襄雖然做過中下級官吏，但還不能稱爲“侯門”，故侯門可能是指新朝的貝子、貝勒或牛錄之類的新貴邸第。不過，這只是一種猜測。因爲當時和冒巢民有深交的文士，如陳維崧、吳綺集中均有詩文載明小宛墓地所在，都說葬影梅庵之側。玆更錄淸代詩人韓菼挽冒襄詩一首，以證明小宛未曾夭亡說的無稽：

載得佳人字莫愁，染香亭子木蘭舟。藕絲待久方近匹，紈扇無緣得聚頭。花鳥湘中餘粉墨，人琴座上亦山丘。白楊未種俱消歇，何處春風燕子樓。

陳維崧與水繪園

明清功令不同於宋代，嚴官吏士夫狎妓之風，所以京師之大，只有下等娼寮，沒有供官吏士大夫遊樂的高級妓院；但是掩耳盜鈴，狎男妓卻並不禁止，所以那時的詩詞和小說都有長篇累牘關於男妓的故事。所謂男妓，並不是現在西方出現供女子玩弄的男人，因爲那時中國的女子還沒有那麼開放。他們有各式各樣的稱號，如“相公”、“像姑”、“小旦”、“變童”，甚至最難聽的“兔子”，都是供官吏士大夫玩弄的男妓，狎男妓並不有玷官箴。

狎男妓之風可以一直上溯到明代。那時秦淮河房都是女閭，而南京天高皇帝遠，管不了許多，只不過官吏還是不敢涉足其間。冒襄的水繪園中，自然也有不少這種人物，其中色藝雙絕的一個名叫雲郎，而爲他顛倒發魘的人則是冒襄的世姪陳維崧。

陳維崧（1625—1682），字其年，江南宜興人，是冒襄患難之交明季四公子之一陳貞慧的兒子，此人多才多藝，是淸詩春季的重要詩人，吳偉業譽之爲“江左鳳凰”。於詩之外，他更擅駢體文及詞，兩者數多質精，時人莫與倫比。晚年膺薦應博學鴻詞大科，以諸生授翰林院檢討，與朱彝尊齊名，并合刻詞集《朱陳村詞》。

陳維崧以世姪的身份，長時期作客水繪園，因爲他



江蘇如皐的水繪園曾是名士雅集的勝地

的才華與文名，主人對他禮遇周到，冒襄的太夫人亦以諸孫視之，因此與冒氏所蓄的歌童雲郎也時常有機會見面。維崧對他繾綣備至，冒氏也不以爲忤；還遣雲郎奉侍維崧硯席，使得這位短身修髯的詩人，不知爲雲郎寫了多少發魔的詩詞，也不知爲雲郎題過多少幅畫。當時客水繪園的有名畫師都爲雲郎作畫，例如《雲郎捧硯圖》、《雲郎出浴圖》，都由陳維崧爲之題詠，圖文并茂，相得益彰，在當時傳爲“佳話”。

據說有一次冒太夫人要試一試維崧的詩才，忽然撤回雲郎的奉侍硯席，維崧簡直神魂無主，寢食不安，要求放回雲郎，冒太夫人有條件的同意他的請求，須於頃刻之間賦《梅花詩》一百韻長詩。維崧欣然援筆立就，重圓他與雲郎的好夢。後來雲郎年長要結婚，陳維崧爲

之賦長調相贈，在當時是有名的詞句，然而畢竟太肉麻了，故不抄錄於此。倒是有一首《別紫雲》的七絕，也就是贈別雲郎的，寫得迴腸蕩氣，饒有唐音：

二度牽衣送我行，《并州》才唱淚縱橫。
生憎一片江南月，不是離筵不肯明。

陳維崧文名，駢驪文和詞在詩之上，只有沈德潛以爲“陳檢討四六及詞，宇內稱許，而詩品古今體皆極擅場，尤在四六與詞之上”。這是於驪黃之外的詩評家對陳維崧的權威評論，應該確具眞賞。這裏再錄陳維崧兩首好詩：

周侯池畔樹蒼蒼，遺碣岩嶢屹此鄉。哀誄南朝顏特進，碑銘東漢蔡中郎。千秋定論歸青史，一夜悲風起白楊。此日躊躇腸欲斷，漳南高家亦昏黃。

《捧讀石齋黃公所撰
先少保神道碑賦此追感》

當時綵毫撼江關，數子聲名天地間。詎料文章遭貝錦，偏教冰雪煉朱顏。廿年苦語三更盡，萬里流人二月還。不信蛾眉眞見贖，感恩我亦淚潺湲。

《喜漢槎入關和健庵先生原韻》

萊陽兩姜

淸詩的春季詩人中，有很多崇尚氣節、矢志恢復的人，他們鐵骨錚錚，寧死不屈，是中華民族的菁英，百世之下，讀其遺詩，猶覺虎虎有生氣。如黃道周、楊廷麟、瞿式耜、陳子龍，他們捐軀殉國，當然不應該稱之爲淸代詩人。還有些草間偷活，蹈首陽之高節，比殷之頑民，雖然在春季詩人中不能稱爲第一流，但詩以人傳，不可不予以一席地。

萊陽（屬山東）兩姜，便是其中兩位代表人物。長名埰，字如農；弟名垓，字如須，時稱兩姜先生。萊陽是明季遭淸兵侵略最慘重的地方，姦淫擄掠，子女玉帛，三番四次遭其酷毒，兩姜有不少親戚友好，罹其鋒鏑，如詩人宋琬一族，幾乎闔族遭難。兩姜幸而未逢其會，先後在崇禎朝成進士，做了京官。

姜垓在朝列見到國子監《進士題名碑》，以天啓朝遭魏忠賢逼害致死的忠烈魏大中姓名，與閹黨崔呈秀、阮大鋮同列，奏請挖去崔、阮兩人姓名，大得盛名。這事在今天看來，頗値得爭議：《進士題名碑》是一種文獻，不論崔、阮如何壞，進士總還是進士，不能因是閹黨而塗改文獻，致後人無可稽考。在淸末也還有這種擧動，如康有爲是光緒朝進士，卻在《進士題名碑》上查不到他的姓名，原來也和崔、阮一樣，因爲康、梁大逆

而挖去了。當時風氣如此，實無可如何。

姜埰則是以給事中彈謚本兵勸陳啓新，直聲震天下，但不久又因言事得罪了剛愎自用的崇禎帝，這個皇帝眞有喜怒莫測的“天威”，必欲置姜埰於死地，經羣臣百方營救，方改爲廷杖謫戍宣州。“廷杖”是明代摧殘臣民士氣的最大弊政，堂堂大臣，一逢人主之怒，便可褫去衣袴在殿廷受杖，不但血肉橫飛，而且還有杖下致死的。淸朝倒沒有繼承前代這種酷刑，而代之以“傳旨申斥”，那當然要比廷杖好受多了。不過申斥的是太監，倘使受申斥者沒有賄賂打點，則可以使長跪多時，什麼下流骯髒的話都罵得出來，若是得到好處，則“混帳王八蛋”一聲，便命“起去”。饒是這樣，有些氣節的士大夫還是吃不消的。

姜埰的廷杖，更博得天下讀書人的愛戴，所到之處，都受人歡迎賦詩贈送，吳偉業《東萊行》云：

> 君家兄弟俱承恩，感時流涕長安門。侍中叩閣數強諫，上書對仗彈平津。天顏不懌要人怨，衛尉捉頭捽下殿。中旨傳呼赤棒來，血裹朝衫路人看。

便是描寫姜埰進諫忤旨和受廷杖情況的，吳偉業和兩姜交誼之篤，亦於此可見；但大節出處，姜埰並不和吳偉業等一樣，他的《敬亭集》中有《廣陵遇嘉禾友感賦》一律云：

> 朝罷西華並馬還，龔曹昔日此鵷班。人留

> 天寶風塵後，客在雷塘雨雪間。連歲喪亡哀白馬，幾年離別慘朱顏。婁東學士三詞伯，身世傷心庾子山。

嘉禾友人即是詩中的曹溶，龔則指龔鼎孳，婁東學士指吳偉業，三個詩人在那時已投降清朝，雖好友而旨趣異途，但詩中以庾信方之，有惋惜而無譏斥，堪稱溫柔敦厚之作。

姜埰於國變後始刻意爲詩，風格一本杜甫，他自說“學詩只學杜工部”，這當然和天寶亂離有關。他於甲申明亡後本來可以不赴宣州戍所，但是他還是赴戍，竟在宣州活了三十年之久，在宣時自號敬亭山人、宣州老兵，“相看兩不厭，唯有敬亭山”，是宣州的勝境，老兵則負戈宣州，應自稱戍卒。他爲什麼一定要赴戍宣州，因爲謫戍宣州是明代皇帝的命令，他必須服從詔旨，不管這個皇帝早已縊死煤山，他還是拳拳故國故君之思，表示對清朝的赦令決不遵從，像這樣貞節強毅的人，在歷史上是罕見的。所以他死後，友人弟子私謚爲“貞毅先生”。

像姜埰的這種節操，使人想起二十世紀初還有相類的一位清詩的冬季詩人，此人便是中國最早的文字改革家和提倡簡體字的王照。王照，字小航，直隸人，進士出身，在禮部當主事，適逢戊戌變法，他也贊成，要上書言事。按當時制度，六部主事沒有上書的資格，必須通過部堂官代奏。禮部尚書是守舊的後黨懷塔布，自然決不代奏，他居然直達光緒手中。光緒那時剛要大振乾

綱，正好借此開刀，因王照的奏劾，一下子便罷免了禮部的六位堂官。這一舉動是戊戌變法新黨、舊黨即帝黨、后黨交鋒最激烈的一幕，王照因此出了大名；在變法流產之後，卻也得了一個長期監禁的處分。

監禁了二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像王照這樣身份，不但被釋放出來，而且聯軍還要請他出來做事。他斷然予以拒絕，隱居不出。辛丑和約告成，刑部首先交還清廷行使職權，他便自動跑到刑部獄中，要求仍行監禁。刑部司獄官員告訴他可以不必再行入獄，王照卻說：“我是奉朝廷明旨監禁的，釋放我的是聯軍統帥瓦德西，他沒有釋放我的權力，我也不接受他的恩惠。”這樣，竟然又在獄中蹲了好幾年，直到辛亥革命，才正式釋放出獄。

王照和姜埰，可說是無獨有偶的兩個鐵錚錚漢子。

虞山兩馮

江南是中國最富庶的區域，蘇、松兩郡，財賦半天下，隨着經濟的發達，必然促使人才輩出，文化繁盛。常熟是蘇州的一縣，明、清以來，一直是人文薈萃之區。尤其是明清之際，錢謙益以文壇盟主地位，久居鄉里，詩酒文會，更增加常熟在江南的地位。

明代的文士在京城做官的，時常要受到最高統治者和太監的逼害，雖負伉直敢言之名，所受的苦難屈辱也很多，如廷杖、廠獄即是一例。但居鄉則不然，天高皇帝遠，管不了許多，地方官吏以不開罪文士的縉紳士子爲保位的第一要義，所以士習囂張，和淸代大不相同。文士中潔身尚義的固然不少，但魚龍混雜、行爲不檢的也在在有之。那時居天下財賦之半的田賦，實際上大部分是轉嫁農民身上，士紳仗勢逃避徭役歲賦，逍遙自在。此風直到康熙初“奏銷案”起，才使他們迫於形勢，乖乖就範。當時有“探花不值半分錢”之謠，強制士習由囂張趨於安份。終淸之世，再沒有發生如明季那般的情形。

淸詩的春季詩人中，有兩位馮姓的弟兄，雖然不曾掇巍科、做大官，卻是在常熟響噹噹的兩名秀才，馮舒（1593—1649）字己蒼，馮班（1602—1671）字定遠，弟兄都以文學知名海隅，甲申之歲，兩人均已入中年，

仍以明季士子的故習在異族統治下討生活。不知道鼎革的官吏，只須阿附滿大人，並不要討好縉紳士子，滅門縣令的威風，重現於清初的江南。文壇怪傑金聖嘆被殺於吳縣令任維初，比他要早十多年的馮舒則被殺於常熟縣令瞿四達，這是他倆恃才傲物得罪了縣令所招致的。

馮舒之死，其實也是清代最早的文字獄，其起因是瞿四達宰常熟時苛徵暴斂，貪贓枉法，常熟士紳合詞呈控，瞿四達認爲馮舒是幕後指使的人，一切呈控文字均出其手，便藉口馮舒所作詩文悖逆，置之獄中，予以杖斃。這個事件並沒有像後來“哭廟案”那麼興大獄株連多人，馮舒又不曾像金聖嘆那樣明正典刑，所以知者不多，實則兩人的冤獄是極相類似的。

滿人入關之初，漢族士人欺他們不諳文義，所以撰寫詩文，初不知忌諱。馮氏兄弟既以詩名，又慷慨自負，腸直口快，遇事敢爲，不知顧忌爲何物，只要看馮舒著作的集名，如《浮海集》、《避人集》、《幽違集》之類，便可想像其內容，瞿四達用那些集中的詩文來殺他，並非難事。如《丙戌歲朝二首》，即順治三年（1646）的即事云：

一

投老餘生又到春，蕭蕭短髮尚爲人。世情已覺趨時便，天道難言與善親。夢裏山川存故國，劫餘門巷失比鄰。野人憶著前年事，灑淚臨風問大鈞。

二

喔喔荒鷄到枕邊，魂清無夢未安眠。起看歷本驚新號，忽覩衣冠換昨年。華岳空聞山鬼信，緹羣誰上蹇人天。年來天意渾難會，剩有殘生只惘然。

又如《雪夜歸林中即事》七古長篇結尾云：

……憶昨前年七月半，殺人不異屠犧牲。只今白骨竟何在，無乃冰雪相支撐。血流徧地未可洗，白雪得無今亦赬。吾聞北人耐寒冷，旃裘慣與冰霜爭。天公意或驕此虜，故借深雪添猙獰。吁嗟此意良未曉，管窺自笑眞硜硜。眼前有飯且飽喫，來朝看取赤日東方生。

馮班比哥哥年紀要小十歲，他在清代生活了很長時期，比較老壽，學問及詩的成就也更成熟，他崇拜中、晚唐詩，反對宋詩。錢謙益稱他“沉酣六代，出入溫、李、小杜，以《玉臺新詠》教人。今觀其詩字字鍾鍊，無一淺率語，置之中、晚人集中，幾無可辨，功候深純，一時無兩，蓋矯七子、鍾、譚之窮，而不墮宋人之直率者也。”

最傾倒於馮班的是清詩春季詩人趙執信，這位自高位置、目無餘子，連當時鼎鼎大名的詩壇盟主王士禛都要譏評的趙秋谷，卻平生低首於馮班，拳拳服膺，馮班在清詩春季中之地位可想而知了。茲錄其懷錢謙益《過拂水山莊》一絕：

三徑荒涼草色迷，一聲鄰笛日平西。人間多少傷心處，縱是莊周也不齊。

又《兵後經郡齊門故人廢園有感》七律云：

雀亂鴉啼燕不回，曲池兵後劫成灰。雲離巫峽知無定，地失桃源莫再來。蔓草江淹何限恨，青楓宋玉有餘哀。故人泉下如相念，白首全生賴不材。

兩馮是詩人、詩論家，又是詩評家，弟兄兩人和其他淸詩春夏季詩人匯合評論元代方回的《瀛奎律髓》，是淸代詩評家示範之作，不獨對唐、宋詩有獨到的見解，而且評語趣味橫生，是絕妙的評解文章。

談狐說鬼的詩人

蒲松齡的詩名早已被他的傑作《聊齋誌異》壓得無影無蹤了，人們只曉得他和曹雪芹兩人是淸代著名的小說家，殊不知他倆分別是淸詩的春、夏兩季知名的詩人。曹雪芹可惜不曾給後人留下詩集，他的詩詞作品是借黛玉、寶釵、寶玉、香菱等人之口以傳世；蒲松齡則不然，他於《聊齋誌異》之外，還有一大部《聊齋詩集》可供人欣賞。

要談蒲松齡的詩，先得談他和當時詩壇盟主王士禛的關係。兩人生同時代鄉里，王士禛比他長七歲，是濟南新城人，蒲松齡是臨淄，相去不遠。他們的結識恐怕是由於蒲松齡於康熙十一年（1672）起到同邑畢際有家，長期做西席夫子之時，而王士禛是畢氏的親戚，在他訪問畢氏時見到這位老夫子，並讀到了《聊齋誌異》。那時王士禛已是卿貳大員，架子很大。蒲松齡年輕又只是個生員，但是驚才絕艷的《聊齋誌異》不能不使漁洋山人欽佩不已，折節下交還與之詩文酬酢。可見得王士禛也是個愛才若渴而不是專門擺架子的人。

其時《誌異》已大體成書，但尙未殺靑，王士禛離開畢氏時，還囑蒲松齡每寫成一篇便要送他先睹爲快，除了爲之頂批、旁批、總批之外，間還爲之改正文字，並寫信提出修改意見，足見一代詩宗對蒲松齡之傾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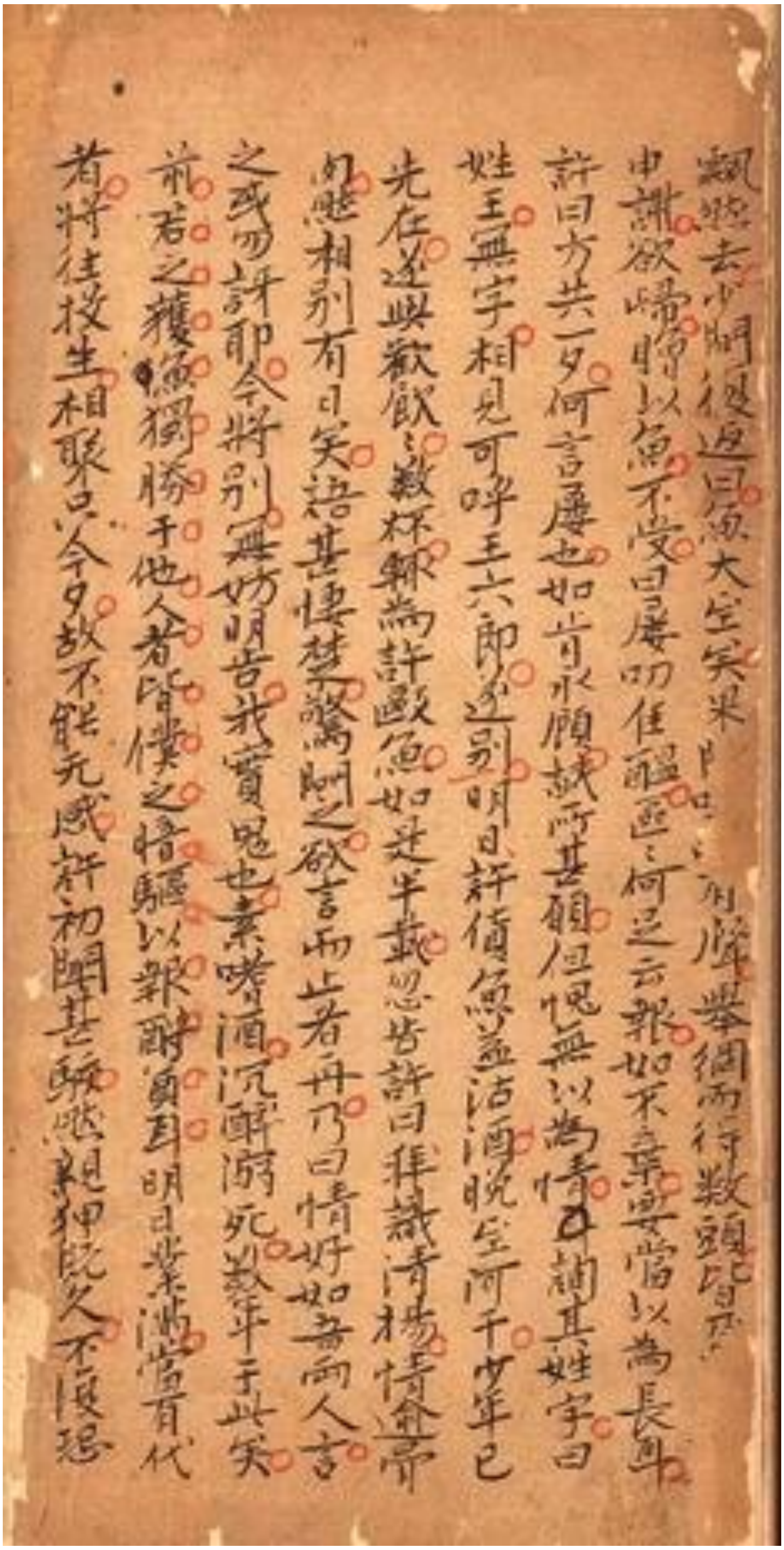
從《聊齋》可知蒲松齡說鬼故事的本領高強

多年來有一種傳說，說王士禛願以三千金易蒲松齡《誌異》全稿，這恐怕不足爲信。在當時有了那麼高地位的王士禛，是決不肯以小說家自居來降低身份的，何況他的詩自足千秋呢！

《聊齋誌異》中有許多關於科場的創作，有人說他是反對科舉制度，其實那時的士人，唯一出路便是中舉中進士，蒲松齡對科舉何嘗不熱衷，只是運氣不好，屢試不第，使他滿腹牢騷，所以假手鬼狐來發洩他滿腔的怨恨；要是他中高科掇巍第，中國小說史上必然會少了這些好文章。而且應鄉試、會試是可以自己去的，只要你具備一定的資格便可，但博學鴻詞這種特科，卻須由京內外大吏薦舉。康熙十八年的鴻博大科，山東省宿儒名士被薦舉的只有十四人，蒲松齡未必名預其列，有些蒲氏生平研究者說他薦而未取，恐怕未確。原因是康熙十七年詔令中外臣工薦舉鴻博時，蒲松齡寫了一篇《擬上徵天下博學鴻詞親考揀用以備顧問羣臣謝表》，一篇還不夠，同年又恭擬了同題的第二篇，正當李因篤、嚴繩孫、傅山等人拼死拼活要擺脫這種牢籠時，蒲松齡卻代羣臣草擬謝表，這和他反抗淸廷、反對科舉是何等顯明的矛盾！

他以一個不第的秀才，蟄居僻鄉，卻要關注朝廷大事，《聊齋文集》卷十一幾乎全是“擬表”，這些表皇帝當然不會看到，蒲松齡只是聊以自娛而已，然則他的思想究竟屬於《誌異》呢？還是屬於《文集》中的擬表？是大可耐人思索的事。

這些擬表，不必徵引內容，只要舉幾個題目就足夠


飄然去少間復返曰魚大至矣果聞唼呷有聲舉網而得數頭皆盈尺喜極
申謝欲歸贈以魚不受曰屢叨佳醞區區何足云報如不棄要當以為長耦
許曰方共一夕何言屢也如肯永顧誠所甚願但愧無以為情詢其姓字曰
姓王無字相見可呼王六郎遂別明日許貨魚益沽酒晚至河干少年已
先在遂與歡飲飲數杯輒為許驅魚如是半載忽告許曰拜識清揚情逾骨
肉然相別有日矣語甚悽楚驚問之欲言而止者再乃曰情好如吾兩人言
之或勿訝耶今將別無妨明告我實鬼也素嗜酒沉醉溺死數年于此矣
前君之獲魚獨勝于他人者皆僕之暗驅以報酹奠耳明日業滿當有代
者將往投生相聚只今夕故不能無感許初聞甚駭然親狎既久不復恐

蒲松齡寫《聊齋》的手稿

人們知道蒲松齡之爲人了：《擬上諭儒臣纂修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實錄〉告成羣臣進表》、《擬上允輔臣請選日開館編輯〈睿算平定三逆方略〉羣臣謝表》、《擬上特簡施琅爲福建水師提督臺灣蕩平羣臣賀表》。被顧炎武斥爲“虜主”的愛新覺羅，蒲松齡反要爲他們修實錄；連錢謙益也還暗中與之往來的明朝一點點火星，他還要歌頌特簡一個叛徒去蕩平，哪裏有絲毫反淸思想可言。當然，這裏並沒有譴責之意，只是實事求是還他本來面目而已。

蒲松齡不但創作的小說可以千載不朽，他的詩也是在淸詩春季的百花園中佔一席之地，尤其與他相處很久的孫蕙，也是淸詩春季中的有名詩人，更有唱和之樂。

王士禛有題《誌異》七絕一首，是膾炙人口的名作：

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

蒲松齡的和作卻不大爲人所知，玆錄如下，以結此篇：

誌異書成共笑之，布袍蕭索鬢如絲。十年頗得黃州意，冷雨寒燈夜話時。

蘇軾謫官黃州時，強人說鬼；蒲松齡則備煙草茗酒請路人談狐說鬼，充實他著述的資料。宋、淸兩位詩人，總都是假鬼狐來發洩一肚子牢騷爲人間鳴不平吧。

清詩異葩金聖嘆

清詩的春季百花園中，百花齊放，鬥艷爭妍，其中有天香國色的牡丹，有濃李夭桃，也不乏野草閒花。更有奇卉異葩，挺生其間，把春天點綴得熱鬧異常，像鹽筴詩人吳嘉紀，談狐說鬼的蒲松齡，他們於詩雖非正宗，但也不能說是野狐禪。在順治末季，江南還有一位突出的人物，便是金聖嘆。

此人以小說評論家的盛譽，淹沒了他的詩名，其實他於詩，尤其是杜詩，工力甚深。

傳說金聖嘆本姓張，名采，蘇州人，諸生。後來復姓金，名人瑞，字聖嘆。這個字便很狂妄，連孔子都要對他興嘆，自視之高可知。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業績，是小說批評，他繼李贄（卓吾）而起，聲名超卓吾老子而過之。他大膽之處便是敢把中國的正宗文學與一般人所不屑一顧的小說拌和在一起，等量齊觀。《莊子》、《離騷》、《史記》、《杜詩》居然與《水滸》、《西廂記》並列爲才子書，但現在人們仍在傳誦的是他批注的《水滸》，能看到《莊》、《騷》、《史》、《杜》的人，卻似乎不多。又因《水滸》經他評論後影響更大，過去坊本中也有託名金聖嘆批評的《三國演義》。

金聖嘆既然評批了六部才子書，他當然成了評批家的多面手，他既爲小說評批家，又是詩論家和文論家及

史評家，堪稱爲中國文學評論史上一個全才，但是一個人總有一個基本觀點，無法因所評對象不同而改變其基本觀念。從詩家看來，金聖嘆是用評小說的眼光來評詩；從小說家看來，卻又認爲他是用評詩的尺度來評論小說。他分解杜的律詩，即用文家起承轉合之法，以兩句爲一聯，四句爲一截，則不免奇僻牽強、穿鑿附會之弊，於一氣呵成的詩，硬生生予以肢解腰斬。有人說，金聖嘆後來之被誅，是腰斬評詩之自食其報云。金聖嘆之被誅，是斬首而不是腰斬，他的罪名自還不到腰斬的地步，所以他的評詩和被刑應該沒有什麼因果報應的關係存在。

金聖嘆之被刑，由於順治十八年五月“哭廟”一案，明季士習囂張，往往視地方官吏如無物，時吳縣令任維初苛斂錢賦，爲百姓所痛憤，久欲驅之而甘心。是年淸世祖駕崩，哀詔至蘇，江南巡撫朱國治在文廟設幕哭臨，衆吏聚集，諸生倪用賓等十八人借此機會進揭帖逐任，繼至者千餘人，朱國治偏袒任維新，遂以蘇郡諸生聚衆滋事，震驚先帝之靈罪大惡極入告，淸廷遣滿大臣逮肇事者至寧，嚴訊，不分首從，一律處決，這是繼順治十六年的丁巳科場案後又一殘害文士的文字獄。從丁巳開始，淸朝已殺滑了手，以後的文字獄範圍株連還要更加廣泛深入。

金聖嘆其實並未參與其事，據說有個看相人說他日內必得奇禍，要他事事小心，所以他深居簡出，並未參與倪用賓一伙，只因他平時得罪官府的事太多，便也把他列名其間，眞所謂“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竟

然坐了大辟的罪名。相傳他在獄中寄家中書曰：“殺頭，至痛也；籍沒，至慘也，而聖嘆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又有臨刑寄妻子書：“字付大兒看，醃菜與黃豆同喫，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傳，我無遺憾矣。”人家以爲金聖嘆死猶滑稽侮人，然而寫這種書信可能想避免連累妻兒，實在是可憐之至的。

上述兩封書信，只是一些傳說，聖嘆所遺的《沉吟樓詩》有臨難時作三首，那是眞實可靠的：

鼠肝蟲臂久蕭疏，只惜胸前幾本書。雖喜唐詩略分解，莊騷馬杜待何如?

《絕命詞》

與汝爲親妙在疏，如形隨影只於書。今朝疏到無疏地，無著天親果宴如。

《與兒子》

東西南北海天疏，萬里來尋聖嘆書。聖嘆只留書種在，累君青眼看何如。

《臨別又口號遍謝彌天大人知我者》

金聖嘆和蒲松齡一樣，雖生在明朝，卻並沒有反抗清朝統治的思想和行動，哭廟案的牽連，是池魚之災。相反他對清朝最高統治者感激涕零，頗有肝腦涂地、圖報無門之慨。《沉吟樓詩》有順治十七年所作的七律八首，只要看到詩題便知道內容了。題云：《順治庚子正月，邵子蘭雪從都門歸，口述皇上見某批〈才子書〉，諭詞臣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時文眼看他等語。家兄長文具爲某道，某感而淚下，因北向叩首敬賦》，其第一首

中兩聯云：

> 忽承帝里來知己，傳道臣名達聖人。
> 合殿近臣聞最切，九天溫語朗如神。

可惜的是頭固然白叩，皇帝也決不會看到這些詩，但是過不了一年，順治皇帝鼎湖龍去，他卻在無意中做了攀髯之臣，這恐怕比上面所述的腰斬要近乎詩讖吧！

嶺南義士屈大均

廣東在“天下十八省”時代，便與衆不同，別具一格，在經濟、風俗、文化等等上面，它是最開放的，同時也是最封閉落後的。它既是文化的沙摸，而近代最知名的改革家和革命家卻又多是廣東人士。黃遵憲、梁啓超之於詩文，開現代詩文革命之先河，但同時廣東仍有死守古詩古文程法不變的人。

廣州詩人也自成一個繫統，總是活動在本省一隅，很少與外間有所往還，只有淸詩春季詩人屈大均是個例外。屈大均是“嶺南三大家”之一，其他二人爲梁佩蘭和陳恭尹。屈與陳兩人都是抗淸不仕的遺民，而梁則不然，把三人綑在一起，據說是避免淸吏的羅織，但淸統治者還是對屈大均恨得牙癢癢，逼得他變服爲僧，避地四方。他原名紹隆，字翁山，釋名今種。但不久又返初服，而且娶了一個外省的妻子，是一起纏綿悲歡的婚姻。

屈大均反淸復明是非常堅決徹底的，從永歷覆滅時起，聯絡鄭成功、吳三桂反淸，又監孔有德的女婿孫延齡軍，及至返戈無術，乃堅持高節以至於死，可稱爲嶺南第一的節義之士，不獨以詩鳴。

屈大均削髮於杭州，入雷峯爲僧，假僧服遊說聯絡各種反淸力量。失敗後西遊秦隴，遇合顧炎武、朱彝尊



屈大均志切反清復明，可惜形勢比人
人強，只有徒呼奈何。

等人。

嶺南詩人詩名不逾庾嶺，大均的作品卻早已布滿東南。朱彝尊是最早賞識大均詩的人，大均有《屢得朋友書札感賦》詩云：

名因錫鬯（朱彝尊）起詞場，未出梅關名已香。遂使三閭長有後，美人芳草滿番陽。

其自注云：“予得名自朱錫鬯始，未出嶺時，錫鬯已將予詩編傳吳下矣。”一到西北，顧炎武得之如逢故人，即贈以七律云：

弱冠詩名動九州，紉蘭餐菊舊風流。何期絕塞千山外，幸有清樽十日留。獨漉泥深蒼華沒，五羊天遠白雲秋。誰憐函谷東來後，班馬蕭蕭一敝裘。

顧炎武對人少許可，似這樣推許大均，在別人是少有的。詩中還提到陳恭尹（陳著有《獨漉堂集》），都是志同道合、聲氣相求的朋友。顧炎武是嚴正不阿、不苟言笑的人，他的詩文都是非常嚴肅的文字，但卻有一首詼諧打趣的小詩：

六代詞人竟若何？風流似比建安多。湯休舊日空門侶，情至能爲《白紵歌》。

這便是戲贈屈大均的。湯休是劉宋時詩僧惠休，本姓湯，出家又還俗，詩名侶鮑參軍。大均是西北之行時返初服的，不但和尚棄了袈裟，而且還締結了美姻良緣，

攜眷返粵，享了一些時的家庭唱隨之樂。這樁姻事也和這位大詩人的詩才有關，據王士禛《池北偶談》云：“南海屈介子遊秦隴，與秦中名士王無異弘撰、李天生因篤輩爲友，作《華嶽》詩百韻。固原守將某見而慕其才，以甥妻之。翁山愛玩少室，賦詩云：‘同棲紅翠三花樹，對寫丹青五嶽圖。’自固原攜妻至代州上谷，再遊京師歸粵。”但據大均自撰《繼室王孺人行略》，王士禛所述情事稍有疏誤。女名華姜，榆林人，明都督王壯猷抗淸殉節，孤女由侯姓撫養成人。侯夫人有弟任代州參將，友李因篤，由李作伐締姻。這段美好姻緣可惜不能白頭偕老，華姜不久即下世，大均不免淚灑相思地。據屈向邦《粵東詩話》：“華姜育於諸姑侯氏家，長而端麗幽嫻，文事武功，皆所素習，聞天生言，曰：‘是隱君子也，無媿吾先將軍矣（指華姜父工壯猷）’。遂嬪焉。”這樣文武雙全而又家世節烈的佳人，可惜的是年壽不永，且其著述不傳，否則或未讓柳如是、徐燦專美一時。

大均西北之行，雄心甚壯，蓄志頗堅，爲了山陝之間僻處一隅，多奇行之士，而淸廷防閒較疏，不如東南海濱之嚴密，所以有志遺民，多匿處以圖恢復。大均入陝聯絡，與顧炎武、李因篤、朱彝尊、傅山等先後聚集太原，定計分進，爲俟時恢復之圖。可惜大局已定，無可奈何，事雖無成，志卻可哀。大均有《送寧人先生詩》云：

雁門北接長山路，爾去登臨勝概多。天外

> 三關橫朔漠，雲中入水會渾河。飄零且覓藏書洞，慷慨休聽出塞歌。我欲巾箱圖五嶽，相從先向曲陽過。

顧炎武報以五律詩云：

> 一雁孤飛日，關河萬里秋。雲橫秦塞白，水入代都流。烽火傳西極，琴樽聚北州。登高欣有賦，今見屈千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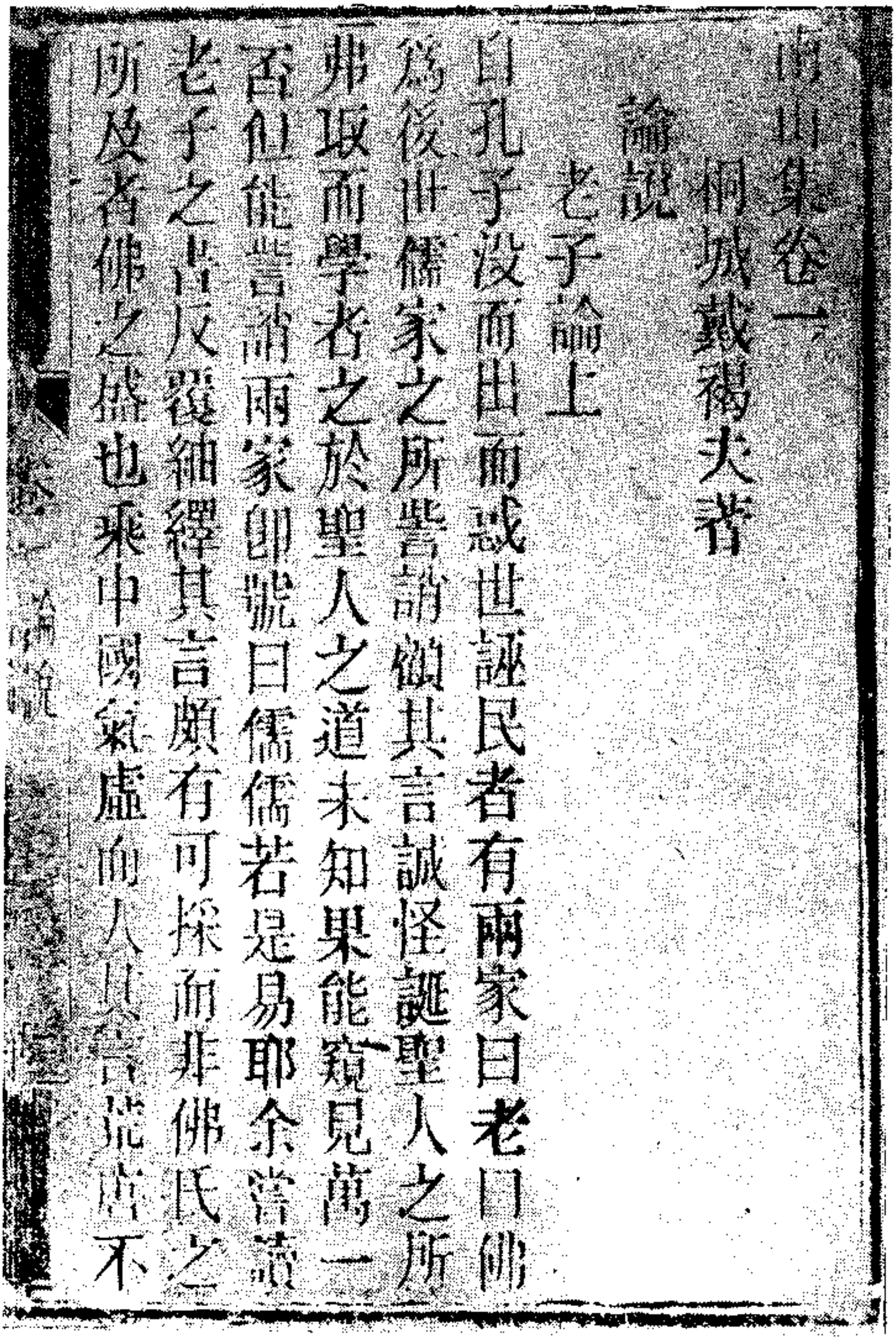
兩人之同仇敵愾，一氣相求，在清詩春季形形色色的衆多詩人中，百代之後，猶生景仰之心，這豈是掇章摘句、嘔心瀝血僅從事辭藻如江左三大家者所能比擬！

《南山》詩獄

中國的文網史、或稱筆禍史上，文士罹難最多、株連最廣的，康熙年間的《南山集》一案，也可算其中之一。

戴名世（1653—1721），字田有，號南山，又號憂庵，安徽桐城人。清代主要的古文作家桐城派，即開始誕生於此時此地，但是人們只知道桐城派的主要人物是方苞、劉大櫆、姚鼐三位桐城人，卻很少有人知道戴名世和桐城派的關係。原因是《南山集》文字獄發生後，一切戴氏的詩文均遭禁錮，沉淪百年，才得重見天日，但已殘缺不全，尤其是詩，難窺其全貌。其實戴名世不但文爲清代大家，於詩也是清詩春季的重要詩人。

戴名世之成爲文字獄的犧牲品，與清初一些遺民以文字取禍有很大的不同。他出生於順治十年，在清廷看來，他已是清朝食毛踐土之臣民了。雖然他在少時應科舉不得意，頗負狂名，但並未挫折他進取之心。到了五十三歲，方中了舉人，五十七歲又中了進士，會試是第一名會元，殿試一甲二名榜眼，榜下授職翰林院編修。雖然年已望六，也算是文人得意之秋了。像這樣遭遇的人，按情理是不會對當時統治者有什麼不滿的。他在《南山集》中所謂悖逆詩文，恐怕是他發迹前的作品，沒有經過刪削，全都編入《南山集》中去而刊印，這是


南山集卷一
桐城戴褐夫著
論說
老子論上
自孔子沒而出而惑世誣民者有兩家曰老曰佛
爲後世儒家之所訾詆觝其言誠怪誕聖人之所
弗取而學者之於聖人之道未知果能窺見萬一
否但能訾詆兩家卽號曰儒儒若是易耶余嘗讀
老子之書反覆紬繹其言頗有可採而非佛氏之
所及者佛之說也乘中國氣虛而入其言荒唐不
南山集卷一　論說　一

戴名世因一本《南山集》而招禍

取禍的原因。

戴名世《南山集》中最被視爲狂悖的詩是《古史詩鍼》的一組詠史組詩，他在《自序》中說：“史者，有所爲而作也，傳愚民之統而怪誕興，趨當時之勢而阿諛作，守一家之囿而是非倒，寄隱衷之怨而曲直蒙。必也破統、離勢、毀囿、銷怨，而後史朕乃萌。”《自序》最後記着“時永歷某年也”這樣的紀年。身在康熙皇帝統治之下而寫上遠在西南偏促一隅的永歷年號，光這一點已是可以身陷大戮的。

《古史詩鍼》這組詩多至一百一十首，據光緒中葉昌熾的《緣督廬日記》說：“康熙中罹禍時，其家以遺文置竹筒中，懸之梁上，二百年無人知者，庚申之亂，族裔棋得之，始傳播。題‘桐城宋潛虛著’，實託名也。”《古史詩鍼》大概也是孑遺僅存的作品。茲選錄有關明淸之際史事的七絕四首：

松山戰敗尚爲雄，十六壇前一祭空。比節文山差漢史，忠勤爲虜負初衷。

《承疇降虜》

應是天祥一化身，維揚大節泣人神。降書七斥山河壯，懾服胡王羞漢臣。

《維揚大節》

天下興亡一匹夫，四方奔走抗強胡。填平東海深沉願，化作芬芳萬卷書。

《天下己任》

大木獨撐天一方，朱明歲月賴延長。鄭家

氣節漢家寶，島國孤忠耿未忘。

《鄭氏抗節》

這些詩明顯的指斥胡虜，表彰忠烈，清廷對此當然非興大獄不可。

戴名世詩名被文名所掩，實則他不但長於詩，且有卓絕的詩論散見在他文字中，如《吳他山詩序》云："余遊四方，往往聞農夫細民倡情冶詩之所歌謠，雖其辭爲方言鄙語，而亦時有義意之存，其體不出比、興、賦三者，乃知詩者出於心之自然者也。世之士自號爲能詩，而何其有義意者之少也。……反不若農夫細民倡情冶思之出於自然而猶有可觀者矣。"能夠推崇民歌謠諺而加於士大夫作品之上，這種思想和見識遠遠非當時一般詩人的見解所能企及。

戴名世的《南山集》文字獄，株連甚廣，是康熙中安徽地區文士一大劫，尤其是桐城派創始人方苞，爲此喫了不少苦頭。起因是方苞曾爲《南山集》作序，觀覽現存方苞的序文，倒並沒有什麼觸犯時忌的文字，只是參劾舉發《南山集》的是趙申喬，此人是康熙朝著名的酷吏，外負清廉剛直之名，實則周納羅織的本領是非常可怕的，經過他的鍛鍊，就幹出許多莫須有的罪狀。方苞的族中從叔祖方孝標，在西南曾投降吳三桂，著了一部《滇黔紀聞》的書，是爲僞周政權張目對清朝不利的著述，方孝標雖已死，仍被開棺戮屍，子孫均問斬的罪名。方苞不過是方孝標的族孫，有此一段關係，再加上爲《南山集》作序而未曾舉發，也一起問斬，只是從寬

免治而隸入旗籍。所謂入旗，原不一定是壞事，入關之初，漢大臣之降淸者，往往亦命隸入旗籍，惟以罪人而入旗，則在有淸一代，似只有方苞是由特旨而見於明詔的，那便不是像淸初馮銓以大學士隸旗籍，而是入旗爲奴的罪罰，其地位便與作爲旗主的滿人有主奴的關係了。淸代八旗的奴隸並不妨礙仕進，但官做得再大也得對家主執奴隸之禮，而且還要供給一切需索，乾、嘉時蒙古旗人松筠官至大學士，碰到家主家有喜慶，還得回家替家主執役，不因官高而有變更，方苞是罪人入旗，當然是更爲難受。幸而雍正即位後，即命他及族人一齊出旗，總算免此苛虐。雍正雖號稱嚴刻，但在法律上亦不無寬大的善政，如廢止慘無人道的腰斬、解放浙西的九姓墮民，和命方苞及其族人出旗，都不失爲賢明之舉。

桐城派古文的三巨頭中，劉大櫆和姚鼐都是知名的夏季詩人，只有方苞是出名不會做詩的，據說他本來也想學詩，但他寫來的詩只以文爲詩，毫無詩的氣息，查愼行規勸他注力於文，不必在詩上面枉拋心力。方苞也知難而退，從此不再在詩上用功夫。

方苞雖不是淸詩的春季詩人，但他的文名太大了，因談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獄機會，附帶把這位桐城派古文的創始人提一筆。

王士禛的神韻詩說

詩人固窮，但也有例外，王士禛（1633—1711）一生便是運氣總好，身名俱泰，官至一品，壽近八十，詩壇奉爲盟主，生徒遍於天下。

他的仕途也是出人意外的，雖然中了順治十五年二甲三十名進士，卻沒有選入庶常館，榜下授揚州推官，這叫作“粗官”，和金馬玉堂的翰林院編、檢，分隔雲泥，要升遷到卿貳大員，不知要爬多少年頭。推官又稱司理或司李，是一郡的司法官，清初尙沿明制，設置此職，但不久便廢除，由知府兼理司法。本來那時有一種說法，叫作“冷官熱做”、“粗官細做”之類，王士禛在揚州的時候，正是“粗官細做”，把一個“風塵俗吏”做得如玉堂神仙，後來雖官至尙書，其名聲倒遠不如“王揚州”的響亮，其時年不過二十四、五歲。他在贈宋犖（牧仲）的詩道：“誰識當日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他自己也不會忘記在揚州做粗官時的盛況。

做了粗官，行取入京，也不過部曹，忽然召對稱旨，康熙諭吏部說：“王士禛詩文兼優，以翰林用。”這是有清一代少有的授官，從此便一帆風順，官至極品。

官至尙書，死後可予謚可不予謚，即所謂“易名之典”，中國從古代起一直是非常重視的，他死後並未得

謚，直到乾隆三十年，由於紀昀的進言，特旨予謚“文簡”。不是翰林出身的人，按例不得謚“文”字，他卻又佔了便宜。

還有，他的名字也很費周章，原來的名字叫“士禛”，他的胞兄叫“士祿”，是“示”字排行，恰巧和雍正帝的胤禛同名，雍正一即了位，便得避諱，稱爲“王士正”，從此凡是雍正朝開始直到乾隆三十九年的書，他便成爲“王士正”。乾隆也眞歡喜管閒事，認爲“士正”與“士禛”相去太遠，明詔改爲“士禎”。所以他的名字一共有“士禛”、“士正”、“士禎”三個。但是辛亥革命之後，總不該再聽從乾隆的詔旨了吧，可是有許多書籍，還是稱爲“士禎”，令人費解，筆者以爲恢復原狀，便應該稱他爲“王士禛”。

此人名高位尊，雖然有愛士之名，卻架子很大，所謂“龍門高峻”，要登門拜謁，往往被餉閉門羹。所以要見到這位大人物，並不是易事。但是也有條捷徑，便是他非常愛書，京師慈仁寺廟會，書攤林立，每屆廟集，漁洋山人必到寺搜訪故籍，到那處去找他，必可碰到，這也是書生積習，不是官高便可改變得了的。

王士禛不但是詩壇盟主，而且還是詩論家，他的詩論也是衆多淸代詩論家中最突出的，叫作“神韻說”。

所謂“神韻說”，王士禛從來沒有一篇專章來闡述他的理論學說，也和別人一樣，只是散見於他的繁多著作中，時時提到“神韻”而已。所以“神韻”兩個字，正如它的本義一般，實在令人難以捉摸，勉強要爲它下一條定義，實在是件難事。雖然後人紛紜多端，還是沒

有一個正確的定義。

他自己既沒有系統的闡述，而“神韻”兩字又不是他的首創，遠溯六朝，早已有了“神韻”之說，歷代繪畫，尤多“神韻”的境界，這在詩與畫是完全相通的。

中國最早的詩論家司空圖的“韻外之致”，鍾嶸的“滋味”以及嚴羽的“入神”，都是“神韻”的先河，而那些說法，也都虛無縹渺，如“羚羊掛角、香象渡河，無跡可尋”，嚴滄浪雖然用這些字來釋明詩的極致，但羚羊掛角、香象渡河，何以便無跡可尋，一般人實在也無法理解和明白地聆受他立論的境界。

司空圖的“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味在酸鹹之外”；嚴羽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這便是神韻詩說的基本根源，他對詩歌的要求是不能平鋪直敘，要具有含蓄深蘊的美學觀點。所謂“詩無達詁”，不能追根到底，跟文章一樣講究起承轉合、水落石出，只是如神龍見首不見尾，時露一鱗一爪已足。

神韻另一個特點是清新淡遠，不要大紅大綠，是水墨山水而不是小李將軍的金碧樓台。所以他於唐人推崇王維和孟浩然，特撰《唐賢三昧集》來闡述其主張，當然，他還要上溯到淸淡寧遠的田園詩人陶淵明；而李、杜、韓、白等大家則表示並不心折。

由於王士禛的名尊位高，他的神韻詩說主宰了當時詩壇很長一個時間，沒有人可以與他抗衡，不過只有一位他的山東同鄉又是姻戚後輩的趙執信，居然與他分庭抗禮，著了一部《談龍錄》來說明與神韻詩說不同的觀

點。趙執信也是一位清詩春季的著名詩人，他不怕這位同鄉前輩和老姻長，也正因王士禛的詩論正有授人以可乘之機，所以《談龍錄》也決不是無的放矢，成爲一時文人發洩自己觀點的良好示範。

所謂神韻詩說，以王士禛自己的作品論，可以《再過露筋祠》七絕爲代表：

> 翠羽明璫尚儼然，湖雲祠樹碧於煙。行人繫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蓮。

此眞所謂“羚羊掛角，香象渡河，無跡可尋”者也。然而也不能不確認其功力之單薄，缺乏黃鍾大呂的盛世元音，袁枚《學元遺山論詩絕句》云：

> 清才未合長依傍，雅調如何可詆諆。我奉漁洋如貌執，不相菲薄不相師。

又同題云：

> 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詩。

這是對神韻詩說一針見血的批評。

《秋柳》詩

一

秋來何處最消魂，殘照西風白下門。他日差池春燕影，衹今憔悴曉煙痕。愁生陌上黃驄曲，夢遠江南烏夜村。莫聽臨風三弄笛，玉關哀怨總難論。

二

娟娟涼露欲爲霜，萬縷千條拂玉塘。浦裏青荷中婦鏡，江干黃竹女兒箱。空憐板渚隋堤水，不見瑯琊大道王。若過洛陽風景地，含情重問永豐坊。

三

東風作絮糝春衣，太息蕭條景物非。扶荔宮中花事盡，靈和殿裏昔人稀。相逢南雁皆愁侶，好語西烏莫夜飛。往日風流問枚叔，梁園回首素心違。

四

桃根桃葉鎮相憐，眺盡平蕪欲化煙。秋色向人猶旖旎，春閨曾與假纏綿。新愁帝子悲今日，舊事公孫憶往年。記否青門珠絡鼓，松枝相映夕陽邊。

用一個總題寫出若干首詩的，用現代語稱謂之“組詩”，組詩大抵都用近體詩寫成。唐代以來，最有名的組詩，當推杜甫的七律《秋興》八首，這是古今詩人無與倫比的作品，命題既寬，涉及面深而且廣，後之詩人步其原韻而和之者，不知凡幾，甚至有人專門用《秋興》的原韻編寫成一個集子，記得錢謙益就有過這樣一集。

清詩春季詩人中的盟主王士禛以《秋柳》爲題，寫過上引的四首七律組詩，其影響之廣，和者之衆，在清代也是首屈一指的。

王士禛的《秋柳》，好像是詠柳之作，實則並非如此，它跟《秋興》除了點綴一些柳的景物外，實在並沒有什麼不同，所以命題也是很寬，涉及面也是既深且廣，並不限於詠柳的範圍。

王士禛是山東新城（今桓台縣）人，《秋柳》作於順治十四年丁酉（1657），地點在濟南，他的年齡只有二十三歲，時間是八月，正是山東全省士子聚集省垣參加鄉試的時候。士愼幸而是山東人，若是直隸人或是監生而應順天鄉試的話，恐怕他要遭逢極大的災難，那便是丁酉北直鄉闈的文字大獄，有許多著名詩人如吳兆騫、孫暘都遠戍極邊。不過他寫《秋柳》的時候，北闈大獄尚未發生，他自然無法先知，有些解析《秋柳》的文章，要把此獄也牽進詩中去，顯然是誤會的。

鄉試在八月舉行，士子們總要先期到達省垣，以便結交朋友，揣摩風氣，所以文酒之會，無日無之，是非常鬧熱的。江南鄉試的秦淮河，早已膾炙人口，而濟南的大明湖，也和秦淮一樣，都具樓船燈火之勝。王士禛

以白袷年少，周旋於裙屐之際，命筆賦詩，一鳴驚人，《秋柳》這組詩，頓時遍傳大江南北，遠離山東的江浙，也紛寄和章，可謂極一時之盛。《秋柳》不但詩佳，詩前還有一篇小序，更寫得優美出色，與詩同樣被人諷誦流傳。序云：

> 昔江南王子，感落葉以興悲；金城司馬，攀長條而隕涕。僕本恨人，性多感慨。寄情楊柳，同《小雅》之僕夫；假託悲秋，望湘皋之遠者。偶成四什，以示同人，爲我和之。丁酉秋日，北渚亭書。

序中充滿着華景瞬逝、遲暮倏臨的感懷，如晉朝桓溫重見到所手植的柳樹皆已十圍，慨然隕涕，說出“木猶如此，人何以堪”的傷感語。但王士禛不能和桓大司馬相比，他還是一個尚未涉世的少年，何以也說出如此喪氣的話來？大概這是中國文人的通病，所謂無病呻吟，古來詩人都是如此，所以也無足爲怪。若是夏季詩人黃仲則寫下這篇小序，一定會被人看作薄命的象徵或讖語，但王士禛福命之厚，壽算之長，在淸代詩人中是很少有的，所以從沒有人評論過他的少作如此悲惋。

“詩無達詁”是句很有道理的名言，後人的欣賞和分析，是否眞能與原作者的用意相符合，還是成問題的。三百年前早就有了不少賞析家，對《秋柳》這樣名作衆說紛紜。如李兆元《漁洋山人〈秋柳〉詩舊箋》，便斷定《秋柳》爲弔明亡之作，第一首是講明太祖在南京奠都開國的，以後三首則是弔福王在南京亡國的。王

士禛的及門鄭鴻提出更有力的證據，說是“爲公弔明亡之作”，“某首指某人，某句指某事，先生口講指畫，縷析條分，言之鑿鑿。”似乎是王士禛自己在給《秋柳》作箋注似的。其實雖然言之鑿鑿，卻是穿鑿附會，向壁杜撰而已。

他們的賞析本領似乎還不及滿族的皇帝和樞廷大臣，當文字獄初起，有人掎摭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的詩和吳綺的詞中有“狂悖”字眼奏舉，主要的便是《秋柳》一詩爲弔明亡之作，但廷議並不聽從他的討好意圖。專制時代，像這樣的賞析文字，是可以殺人滅族的。倒是管世銘說句公允的話，說是“秦人屈復注王漁洋《秋柳》詩，‘白下’、‘洛陽’、‘帝子’、‘公孫’等字，妄擬爲憑弔勝朝，最爲穿鑿”。

實則王士禛賦《秋柳》時年事尚輕，他的神韻詩說還未成熟，但已略露端倪，後人的賞析，簡直是瞎子摸象，根本上把神韻詩說當作李商隱的《無題》詩了。王士禛不比宋琬，懷着破家亡國之恨，他由明入清，一直門第鼎盛，濟南不比登、萊，兵革之災較輕，偏要把他拉入遺民的行列，似乎大可不必。

正確的賞析《秋柳》詩的也不少，如宋琬《說鈴》云：“王十一在大明湖北渚亭感秋柳賦詩四章。嚴給事沆稱此詩風調凄清，如朔鴻關笛，易引羈愁，讀之良然。”也有對此名作表示明顯的不足，如黃培芳的《香石詩話》：“阮亭《秋柳》之作，以風神取勝，膾炙一時，然訾之者亦不少。其實細按，不免有稍空處。”朱庭珍《筱園詩話》則以爲“王阮亭《秋柳》，負一時盛

名，以爲絕作。其實不過字句修飾研華，風調好聽而已。神骨不峻，格意不高，皆非集中出色之作，不可奉以爲式”。

《秋柳》四章，可稱爲王士禛神韻詩說少作的代表，無怪乎和神韻持異說的肌理詩說創造者翁方綱評《漁洋菁華錄》，把四首逐首批評得一無是處；而另一持異說的格調詩說創造者沈德潛選《國朝詩別裁集》竟然把《秋柳詩》摒棄不錄，指爲“不切題”。

無論如何，從神韻詩說和現代美學觀點來欣賞《秋柳》這組詩，在藝術表現上具有強烈的感染力，詩句充滿感情上流轉快速的美感，應該是淸詩春季百花園中一朵鮮花。

袁枚的性靈詩說

淸詩的春、夏兩季的四個重要詩論中，最於當世和後來有較好影響的，是袁枚的性靈詩說。

袁枚（1716—1797），便是袁子才，號隨園，和春季詩壇的王士禛一樣，是夏季騷壇的盟主。袁枚確是才子，他在乾隆元年（1736）二十歲時候便膺薦赴試博學鴻詞大科，雖未被取中，即於三年之後考中己未科二甲五名進士，和年已近古稀的大詩人沈德潛同榜，名次還在沈前二名。以後一老一少的同年，在論詩意見上，便要成爲論敵；而且，老將敗在小將手裏，這是後世的公論。

中進士而尙未結婚的，可以奏請給假歸娶，俗語叫作“奉旨完婚”，這是人間罕逢的玉堂佳話。淸詩的春、夏季詩人中，各有一位大詩人遘此榮遇。吳偉業以會試會元和殿試榜眼的高第曾有此殊榮，不過那是明代崇禎朝的事。吳偉業之後過了一百零八年，又碰到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即位不久有這種佳話點綴，當然惹得皇帝歡喜，滿以爲袁枚必會靑雲直上，尙書、宰輔是意中的事。不料事實恰和希望相反。他在詩論的爭論中佔了勝籌，宦途的通達卻遠不及他的同年沈德潛。照例二甲五名的進士沒有不入詞林的，而袁枚卻因在庶吉士教習中，以不識朝廷稱爲“國書”的滿洲文字而落在末等，

這樣便夢斷金馬玉堂，出而爲粗官俗吏了。進士之出爲知縣，叫作“榜下知縣”，又叫“老虎班”知縣，遇缺即可補官（就像老虎見可噬之物即吃），不必長期聽鼓。他指省江蘇，一到南京，便補缺溧陽和江寧知縣，又碰上兩江總督滿洲才子尹繼善也是少年科第，同善相濟，詩酒唱和無虛日，總算也是風塵俗吏的得意之秋。那時銓例很嚴，縱然有“望山相國”這樣一位上司，也沒有辦法使他升遷一官一秩，連保他署任知州也遭到部駁不准，袁枚自知仕途無望，索性辭去“七品官耳”，就在南京買地建園，終老於秦淮六朝煙水之間。他的原籍是浙江錢塘，祖籍還是浙東慈谿，從此便不再返原籍和祖籍。

由於生在昇平時代，又是少年得志，所交往的都是上層人士，他的詩便無法與春季詩人的流離辛苦、國難家艱、鐵馬金戈的遭際相比，清代第一流詩人的位置他挨不上，而於詩的理論卻可說是一代的權威，不論思想性或藝術性，都臻於二百六十年中高不可攀的頂峯。

“性靈”兩字也非出於袁枚的首創，探本溯源，可上達《國風》，比他早一些年代的同宗袁宏道，便曾大舉提倡性靈之旗來反對王李七子的模擬文風，成爲公安派文學改良的理論支柱。袁枚與中郎在這一方面有一脈相承之處，便用來予以發揚光大，而且他的學間與閱歷，遠勝公安三袁的膚淺空疏，成就便靑出於藍，公安派未可與之同日而語。

性靈說和神韻說有類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性靈說更有具體的內容，他所闡述的詩歌創作方法，具有較

完整的藝術規律，在現代美學的觀點來看，更是如此。

性靈詩說主張詩的創作必須具備三個必要的條件，首先是眞實的感情，次之是從“自我”出發，最後方是才學。三者缺其一，便不能創作出好詩。和他同時的“格調說”和“肌理說”便於三者各有闕失，尤其是缺乏“眞情”和“自我”，光靠才學是寫不出好詩的。

他強調詩人須不失赤子之心；必須有不可解之情，而後可以有不可朽之詩；詩乃由情所生。《詩經》開宗明義便是男女之情而不是思太王、王季，所以情是源頭而詞藻僅是其末流，沒有源頭活水，則下流必成一汪死灘。所以他把才學只放在最後一位。《隨園詩話》中記載很多販夫走卒的詩，最著名的一件是隨園有一擔糞夫說：“着一身花矣！”他聽了狂喜，認爲是不可多得的“天籟”，不是攤書獺祭的讀書人所苦吟得出的。人們不禁會想起《紅樓夢》中的王熙鳳，是個不識字的婦女，在同寶玉黛玉等大詩翁一起聯句時，推她首唱，居然吟出“一夜北風起”這樣的名句，切題而籠罩全局，使續聯者多有生發之餘地。這固然是曹雪芹故弄狡獪，要使得滿腹詩書的寶玉、黛玉等大詩翁自愧不如；恐怕曹雪芹生與袁枚同時，受他性靈詩說的影響，也未可知。

以眞情和“自我”從事創作，便無所謂唐、宋之爭，凡是尊唐崇宋的論戰，其實都是依傍古人門戶，其中獨缺一個“我”字，所以作詩不可無“我”，便是不能泯沒自己的個性，去強湊古人的面目，所謂“詩者，各人之性情耳，與唐、宋無與也”，“詩宜自出機抒，不可寄人籬下”，“以出新意、去陳言爲第一着”，這些主

張與袁宏道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是完全一致的。

袁枚的性靈說，具有銳利不可禦的理論武器，橫掃當時詩壇上的泥古拘學的詩論，他毫不客氣地指出沈德潛的格調說是“蔽於古而不知今”，“詩有工拙，而無古今”，“多一分格調，必損一分性情”；翁方綱的肌理說則不過是“誤把抄書當作詩”而已。

他強調“自我”精神，當然反對詩人們難返的積習“和韻”、“步韻”、“疊韻”等玩意兒，認爲都是與己無關的模擬之作。他自稱平生不和韻。但是在這裏，他的第二性格又暴露出來，《小倉山房詩集》中保存了汗牛充棟的與尹繼善唱和之作，還有“新詩和到是明年”這樣肉痲當有趣之句，難道“望山相國”的和韻便不在他的禁例之內嗎？伍拉納兒子在《批本〈隨園詩話〉》中所譏評的袁枚，在這裏又一次暴露。

一個人不可能沒有缺點，袁枚當然有很多值得人們疵議的地方，因爲他的性靈詩說，他的爲人處世之道，也與他的詩論一脈相通，便是率眞，不肯假道學地僞言僞行。例如他從不諱言好色，這就和假道學的偷偷摸摸地完全不同。在當時他的詩名和論點，名重東南，時人莫不欽仰。夏季詩人張問陶（船山）甚至名其詩集曰《推袁集》，然而一到袁枚逝世，攻之者紛起，張氏趕忙見風落帆，把《推袁集》這個名字取消，轉而對他下石了。

在袁枚生前，只有三位大名鼎鼎的詩人敢對他明評暗譏，例如同爲乾隆江左三大家的趙翼和蔣士銓，趙翼嘗戲撰討袁的檄文，說他如括蒼山的老猿，蔣士銓則假

借戲劇中陳繼儒與王荊石的故事，說他是“可憐一只雲中鶴，飛來飛去宰相衙”，諷喻袁枚和尹繼善的交往。但最耐人咀嚼的卻是另一大詩人黃景仁（仲則），《兩當軒集》有《呈袁簡齋太史》四律，其一云：

　　一代才豪仰大賢，天公位置卻天然。文章草草皆千古，仕宦匆匆只十年。暫借玉堂留姓氏，便依勾漏作神仙。由來名士如名將，誰似汾陽福命全。

“文章草草皆千古”，一針見血地指出袁枚詩文的缺點，這是主張性靈詩說的袁枚以至他的先驅公安派及後世追隨者無法掩飾的缺憾。

沈德潛的格調詩說

清代對當時和後世有影響的詩論，格調說是其中之一。這個詩論的產生，可以說是清代國力達到繁榮的鼎盛期（所謂康乾盛世）必然產生的點綴品。前於格調說的神韻說和同時的性靈說，總嫌虛無縹渺，淸幽疏淡，難副盛世的莊重典雅，必須有一種意象剛正闊大、聲調雍容鏗鏘的詩風，才可以與那時政治局面相配合，所以格調說便應運而生，爲盛世點綴太平。

格調說其實並沒有什麼獨特的創造，只是拾人牙慧，死抱古人骸骨，迎合人主意圖及當時詩人希圖以詩倖進、恃寵沾恩而已。在四種重要詩論中，它是最卑下和不足取的，可稱爲詩國中的鄉愿。

格調說主張尊唐，可是它並不是直接尊唐，而是繼承前代前後七子的衣缽，間接地尊唐。凡是七子和他們的前輩李東陽的牙慧唾餘，都拾來奉爲圭臬。用規格來限制詩的自由發展，用調門來規定音腔的高低，矯揉做作，如女子之纏足和束胸，扼殺自然與天眞，而僞體乃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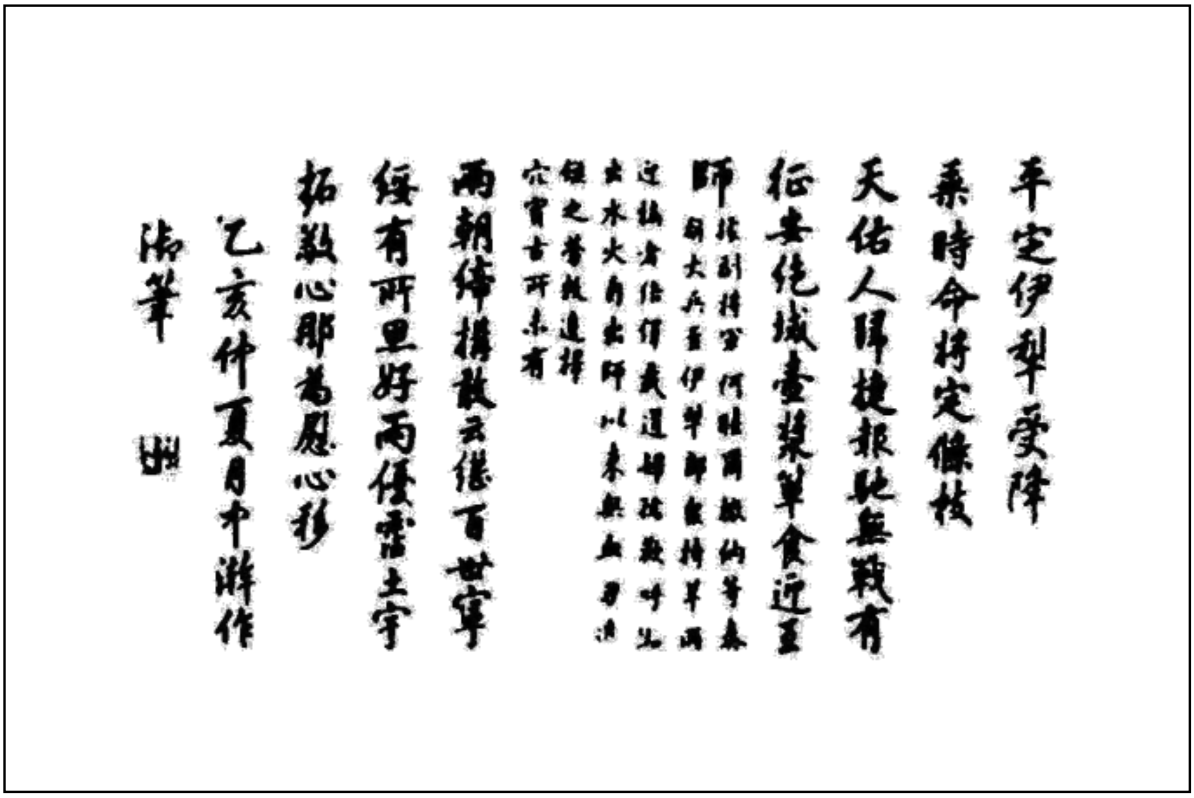
格調詩說的提倡者是沈德潛（1673—1769），字確士，號歸愚，江蘇長洲人。此人到了乾隆四年才中進士，其時年已六十七歲，照例這樣的高齡即使在官也已到了懸車退休之年，他卻受到乾隆的特殊賞識，收爲文

學侍從之臣，居然在短短十年功夫，官至禮部侍郎還加尙書銜。他的不次遷擢，並不是因他有特殊卓異的政績，而是替乾隆做了捉刀詩人。因爲乾隆久聞他的詩名，格調詩說又配合這位皇帝的胃口。鑒於其人年事已高，人又老實，必定謹愼小心、守口如瓶，不致像前朝高士奇那麼到處招搖營私，所以付之以捉刀的重任，有十年之久。即使沈德潛耄耋告老，也還是藕斷絲連，詩筒往還不絕，稱之爲“江南大詩翁”、“朕之老詩友”，其老運之佳，古今歷史上是罕覯的。

乾隆也能夠附弄風雅，哼幾句詩，在做“阿哥”的時候，循規蹈矩，詩倒也還一般，如在“潛邸”時就編定的《樂善堂集》中《題梅村詩集》一首七律，總還不能說出格。但是登了大寶之後，便不想和一般詩人同列，他自行創作一種與衆不同的詩體，姑名之曰“乾隆體”。這種詩體，倒還不曾有人邯鄲學步而一道同風，是歸他一人專有的詩體，所以乾隆一朝的詩風，並未受“乾隆體”的影響。可是做捉刀人的，卻不能不學着皇帝的作風來替他捉刀，這差使當然並不好受，但對詩的格調聲律極有研究的沈德潛卻心運意會，完全能湊合乾隆的意志，加上鄉愿的性格，自然一拍即合，成爲君臣詩的魚水之歡。

“乾隆體”究竟是怎樣的詩呢？不妨舉一首在此，讓大家開開眼界，詩便是送給沈德潛的一首七律：

吳中今古老人科，比似徵明定若何？書畫雖輸詩勝彼，功名已過壽如佗。遊山有興仍清



乾隆御筆——“乾隆體”書法

> 健，處世無爭只善和。明說九旬有三歲，那更
> 年極尚嫌多。

這首御製詩既然是賜贈沈德潛的，自然不能再由沈德潛捉刀，而是十足“乾隆體”的真品。若由他的“老詩友”捉刀，恐怕還不至令人笑掉了牙齒。

至於沈德潛本人的詩，根據他平生最重要的編撰著作《說詩晬語》、《唐詩別裁集》、《國朝詩別裁集》、《古詩源》等書，他在這些編著中徹頭徹尾顯出格調說的主張，無非是尊唐貶宋，雖主一時壇坫，終究被有識之士所唾棄。跟隨他的末流，自然產生一種不良的詩風和影響。他的詩除了歌功頌德、鼓吹升平之外，也不無好詩，並非一無可取。最重要的是他未出仕時久處民間，

深知民生疾苦，如《夏日述感》五律六首，反映乾隆盛世尖銳的社會矛盾和黑暗的社會現實，誠爲沈德潛的代表力作：

其一

旱潦頻仍後，三吳風景殊。民貧輕揖讓，力盡畏征輸。瘠土農皆散，平田麥已蕪。吾生慚俯仰，觸目總艱虞。

其五

身世空搔首，茫茫總不堪。多金高甲第，無食賤丁男。救弊須良策，哀時敢戲談。傳聞鴻雁羽，肅肅去淮南。

但是這位鄉愿詩人終於老悖得糊塗透了頂，他退老之後，竟由自己或他門下弟子之手，於編輯《歸愚詩鈔》時把代乾隆捉刀的詩作爲自己的作品編了進去，並且還進呈“御覽”。這可惱火了這位十全老人的皇帝，但又恨在心裏，不便聲張出來，從此逐步找他的老詩友的錯頭。開始還算客氣，說他家裏藏匿錢謙益的《牧齋初學集》和《牧齋有學集》不予銷燬；繼又指責他選《國朝詩別裁集》首列錢謙益作品，嚴令於再版時改編。終於在沈德潛死後，找到江蘇東臺徐述夔的《一柱樓集》文字獄，以沈德潛曾爲徐述夔作傳爲理由，對他下了毒手，削官奪謚之外，復扑其墓碑，開棺斫屍。詩人生前之榮與死後之慘，成兩個極端。

翁方綱的肌理詩說

所謂詩論，即詩歌的理論，是伴隨着詩而來的，從《詩經》開始，沿着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以迄清代，用各種形式寫下關於詩的文字，都可稱詩論。但正式名爲“詩論”的，卻並無此名，這是後人所加的名詞。它們大多是用“詩話”、“論詩絕句”、“紀事詩”、“本事詩”、“選集”等名稱，至於用“詩式”、“詩品”、“詩藪”、“原詩”、“說詩”等名稱的，則已是和詩論很相近的名稱了。

其中最普遍使用的是“詩話”，古今詩話著作之多，眞足以傲視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所能企及。清朝一代，尤可稱列朝之冠，連後來配享兩廡的理學家和史學家王夫之，也寫過一部《薑齋詩話》，則其他詩人各有或多或少的詩話著作，也不是奇怪的事。

詩話實在是關於詩的閒話，體裁自由，想到便寫一段，可以無所不談，這是最大的優點，所以有系統的全從理論着眼的就不多。例如春季詩人吳偉業就有薄薄的一本《梅村詩話》，那就十足是一部紀事紀人的作品，在那裏無從窺見他的詩歌理論。

較爲自成體系有一定自我主張的淸詩春夏兩季詩論家，只能推舉出四個代表人物，即王士禛的“神韻說”，袁枚的“性靈說”，沈德潛的“格調說”和翁方

《望羅浮》

只有濛濛意，人家與釣磯。
寺門鐘乍起，樵客徑猶非。
四百層泉落，三千丈翠飛。
與誰參畫理？半面盡斜暉。

——翁方綱

綱的“肌理說”。這四位詩人，王士禛是春季詩人，其他三位只好算是夏季詩人，其實這三位都很長壽，生活年代跨過了整個夏季，也便是清代最鼎盛繁榮的所謂“乾嘉盛世”。

翁方綱的成就並不在詩方面，他是知名的考據家、金石家，又兼書法家，詩可說是其餘事，是不能和其他三位方駕的，但是他卻有他一套詩歌的理論。他以爲“爲學必以考證爲準，爲詩必以肌理爲準”的作詩準則，這是乾隆年間漢學考據學風盛行的必然結果。他的所謂“理”，便是方苞、姚鼐所倡導的桐城派古文最注重的“義理”，亦即“熟精《文選》理”、“雅麗理訓誥”之理。他主張以學爲詩，沒有踏踏實實的學問是不足爲詩的，這是完全和王士禛“神韻”、袁枚“性靈”

的詩論處於對立的地位。《淸史稿》本傳說他："所爲詩，自諸經注疏，以及史傳之考訂，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徹洋溢其中，論者謂能以學爲詩。"夫"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固然是一個詩人必備的條件，但讀破的萬卷，必須融合會化於"我"之胸臆，然後以我之語句吐出，這方是眞眞的"以學爲詩"，若僅僅如翁方綱那撦撏前人作品，闌入自己詩句，那便是優孟衣冠，毫無生氣，像明代七子那樣，一直爲人所詬病。翁方綱似乎還死守七子的成法，抱着不放，他根本無視於詩的特殊條件，也不解"詩無達詁"的意義，所以雖和王士禛、袁枚唱反調，當時的影響遠不及王、袁的詩論有着廣大的追隨者和發生重大的影響。

但他的影響卻發生在翁方綱身後半個世紀之後，那時宋詩盛行，無形中奉肌理說爲宗旨，也只是舊體詩的迴光返照，從那時崛起的黃遵憲、丘逢甲等，已舉起詩界革命的旗幟，主張"我手寫我口"了。

翁方綱的肌理詩論，在淸詩春夏的詩論中是屬於保守的、落後的理論，雖具備一定的理論基礎，卻在妨礙詩的發展與進步，而且他崇尙正學，抹煞情懷，凡是抒發情懷的風懷之作，都被他目爲有乖風教，是可以不作、可以不傳的作品。淸代夏季詩人中最富才華的薄命詩人黃仲則是翁方綱的好友，他非常同情仲則的遭遇和傷悼他的早逝，蓄意要爲仲則刊刻文人不朽之業。但是《兩當軒詩集》經過翁方綱的刪削，竟然去掉了一半，而這一半卻是仲則詩中精華所繫。《兩當軒詩集》最早的刊本便是翁氏所刻的《悔存詩鈔》八卷，他選擇的目

《論詩絕句》

天涯有客號詅癡，
誤把抄書當作詩。
抄到鍾嶸詩品日，
該他知道性靈時。

——袁枚

光是“凡涉綺語及飲酒諸詩皆不錄入”，幸而仲則詩後來有了足本行世迄今，而翁刻究未爲人所知，那是幸事；否則，這位絕代風華的薄命詩人不知要被肌理詩論糟蹋到什麼樣子！

翁方綱詩論的論敵袁枚給肌理說一個譏評說：“誤把抄書當作詩。”這是一個謔而近虐的批評。

清詩夏季三大家

清詩的春、夏季各有一個“江左三大家”的集體，春季的是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當然，前兩人是清詩春季的領袖。夏季的袁枚，蔣士銓、趙翼三人也並不示弱，在清詩的夏季中也居卓越的地位。

夏季的江左三大家，又稱“乾隆三大家”，他們單以詩論，似乎不能與錢、吳相擷抗，但他們除詩之外，還有其他專長，則又是春季的江左三大家所不能企及的。

袁枚已詳前篇，蔣士銓是清代可數的戲劇家；趙翼更是多面手，既是詩文家，又是詩論家，更是知名的史學家。

趙翼（1727—1814），字耘松、雲松，號甌北，江蘇常州人，乾隆二十六年一甲三名進士。關于他的科第，對他的一生很有關係。這一科的殿試，乾隆親自閱卷。所謂“殿試”，名義上由皇帝主試，故進士稱爲“天子門生”，實際上簡有多名“讀卷官”，他們便不叫“主考”或“總裁”，表示僅僅幫助主試者的皇帝讀讀卷。由他們決定的名次，以首十卷進呈御覽，皇帝一般當然依照他們所定的名次批准發下。於是狀元、榜眼、探花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同進士出身的一榜進士就此產生。

進呈的十卷中，這一科原定的一甲一名是趙翼，一

甲三名是王杰。乾隆翻閱了兩人的籍貫，科擧規定，鄉試和會試的試卷都是彌封的，而且經過謄錄，在拆封之前，主考和總裁無法知曉取中的人姓名和籍貫。但殿試卻因是皇帝親試，認爲必定大公無私，不會有舞弊情事，所以省卻彌封和謄錄兩道手續。趙翼是江蘇常州人，王杰是陝西人。乾隆以爲開國以來，江蘇的狀元已夠多了，而西北的陝、甘，卻還不曾有過鼎甲，而且其時正在經營西北，不可不提拔一些西北的人才，以資撫綏。這樣，便將王杰的試卷和趙翼對換，王杰成爲淸代唯一的陝西籍狀元，趙翼則屈居爲探花。

狀元與探花，雖只第一與第三之差，但以後仕途之通蹇，大大不同，王杰一帆風順，官至大學士；而趙翼

《閒居讀書》

後人觀古書，每隨己境地。
譬如廣場中，環看高臺戲。
矮人在平地，擧頭仰而企。
危樓有憑檻，劉楨方平視。
做戲非有殊，看戲乃各異。
矮人看戲歸，自謂見仔細。
樓上人聞之，不覺笑噴鼻。

——趙翼

卻成爲風塵俗吏，官僅止於道員。

但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趙翼若做到大學士，也不過在衆多的宰輔中添了一名而已，一定不能像他懸車之後從事著述給後人留下不少傳世之作。所以趙翼能夠成爲清代著名的詩人和學者，還得歸功於乾隆皇帝。

趙翼的詩論雖然不及王士禛、袁枚有一個系統的理論，卻著作繁多，《甌北詩話》是他的主要的著作，他的觀點可以“才”與“氣”兩字作爲概括。

趙翼論詩重才而不重學，他自己就以天才自詡，所以非常推崇唐、宋的李白和蘇軾，在同時的詩論流派中，對沈德潛的格調說和翁方綱的肌理說重學之說是格格不相入的，而和前輩詩人王士禛的神韻說與同時人袁枚的性靈說卻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以他的《甌北詩話》中一共有九卷論古今大詩人的專章，除了李、杜、韓、白、蘇、陸之外，宋以後的大家；只選了金代元好問、明代高啓、清代的吳偉業和查愼行，此外縱負盛名的大家，因爲不符合他的標準，便不予採取。

趙翼尙才尙氣，主張創新而反對模仿，不論是尊唐或崇宋，在他看來均無足取，所謂“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而已。“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尙漢唐”，心中先存在一個模擬的對象，如何還有新鮮的別創格調，甚至李白、杜甫，他認爲“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對於明代前後七子模擬之風直至清代還是餘風尙熾，他當然嗤之以鼻而不屑一顧的。

掌心雷詩人王曇

咱們談論詩人，可不是寫武俠小說，詩人會和掌心雷聯繫起來，豈非怪事。但清詩夏季詩人中，確有一位能作掌心雷的詩人，他便是王曇（仲瞿）。

王曇（1759—1817），浙江嘉興人，他的詩名雖不大爲一般人所知，卻是清詩夏季詩人中一位怪傑，他的《煙霞萬古樓詩集》有許多迴腸蕩氣的奇作，和他同時的黃仲則一樣，是清詩夏季中兩顆一現即逝的彗星。

清詩春季的南方詩人中，有浙派一系，它的領袖是嘉興的朱彝尊和海寧的查愼行，他們是表弟兄倆，在浙派詩人中，他倆平分秋色。若說朱彝尊是尊唐，查愼行則是崇宋，他們各有許多追隨者，形成南方詩人強大的壁壘。王曇是嘉興籍，當然是屬於朱彝尊一系的浙派詩人。

此人曾經中過舉人，屢踏春闈落第，惹得他滿腹牢騷，性本跅弛不羈，於是談兵說劍，盤馬彎弓，慷慨悲歌，不可一世。自負是天下才，能作掌心雷，恐怕也是他自己胡說亂道遊說公卿間搞出來的。

乾隆晚年曾寵任一個貪斂無厭的權奸和珅，趨附於他門下取得卿貳高位的有一個侍郎吳省欽，和王曇有些往來。其時已是嘉慶初年，乾隆以太上皇之尊，遙握重權。經過他多年的揮霍和和珅的聚斂，搞得民不聊生，發生了川、楚等七省教民大起義，這當然是重大的朝政，

太上皇不能不管，可是八十多歲的人究竟是老悖糊塗了，他自負可以用“法術”制敵，鎮日在深宮唸咒打坐，以爲可以制“教匪”的首領於死命。兒皇帝當然唯命是從，可是心裏並不以爲然。

吳省欽揣摩太上皇的心理，思欲投其所好以邀富貴，上了一疏保薦王曇能作掌心雷，以敉平川楚“教匪”。可是奏疏僅達到兒皇帝手中，太上皇並未看到。嘉慶皇帝認爲太荒誕不經，以大臣身份不該如此褻瀆朝廷，立予罷斥驅逐回籍。

另一說以爲吳省欽非常機警，看到兒皇帝即將親握政權，和珅作惡多端，一朝失去保護傘，冰山必倒，自己勢將陪和珅殉葬，想早爲脫身之計。於是上了這樣一道荒唐的奏疏，以期逢天怒而遭薄懲，得以脫身。果然如他的期望，此計得逞。和珅治罪後，有很多黨羽牽連，吳省欽則因爲斥革在前，並未予以追究，成爲漏網之魚。

吳省欽固然討得了便宜，眞眞倒霉的卻是王曇，從此蹭蹬終身，再也不能東山再起，只好壯志空懷，飲恨而老死牖下。他的詩充滿牢騷，原因便是在此。

話說十八世紀是中國歷史和中華民族隆替的一個大關鍵時刻。1722 年之前，康熙在位，他是清代第一位睿智開明的帝皇，雖然漢文化不高，卻篤信西方文明，尤好接近東來教士，身體力行地學習西方歷算之學，他的數學在那時已達到通曉開方、微積分的程度。日本史學家尊之爲“康熙大帝”，可謂毫無愧色。照他的路線走下去，恐怕以後的歷史得重寫。

可是他的兒子雍正和孫子乾隆，都不能繼承他的遺

志，兩代人都摒棄父祖的信仰，轉而去崇奉另一種宗教密宗，這便使國家民族沿着另一方向滑落下去，說起來是頗可痛心的事。乾隆的唸咒打坐和王曇的掌心雷原是同一貨色。

上有好者，下必甚矣，王曇生在那個時代，自然一道同風，也玩起能作掌心雷的把戲來。王曇也因此成就他在夏季詩人中一個怪傑的稱號，且請看他著名的《住穀城之明日謹以斗酒牛膏合琵琶三十二絃侑祭於西楚霸王之墓》七律三首：

一

江東徐子老王郎，來抱琵琶哭大王。如我文章遭鬼擊，嗟渠身手竟夭亡。誰刪本紀翻遷史，誤讀兵書負項梁。留部瓠廬《漢書》在，英雄成敗太淒涼。

二

秦人天下楚人弓，枉把頭顱贈馬童。天意何曾袒劉季，大王失計戀江東。早摧函谷稱西帝，何必鴻門殺沛公。徒縱咸陽三月火，讓他婁敬說關中。

三

黃土心香一匊塵，英雄兒女共沾巾。生能白版爲天子，死剩烏江一美人。壁裏沙蟲親子弟，烹來功狗舊君臣。戚姬脂粉虞姬血，一樣君恩不庇身。

黃景仁的盛世悲歌

清詩的夏季百花園中，羣芳盛放，鬥艷爭妍，齊來點綴升平的盛世。正在脆管繁絃、輕歌曼舞的樂園中，忽然天邊出現一顆拖着長長尾巴的彗星，熠熠的亮光照耀着天空。雖然這顆彗星一瞬間即行消失，卻告訴人間這盛世繁華的脆薄，不久即將有狂風暴雨的襲來，使百花園中的奇花異卉，會一朝零落無顏色。

這顆彗星便是夏季詩人黃仲則。社會對他的排擠，世人對他的白眼，使他嘗盡人間的悲酸苦痛，迫使他在盛世中唱出了悲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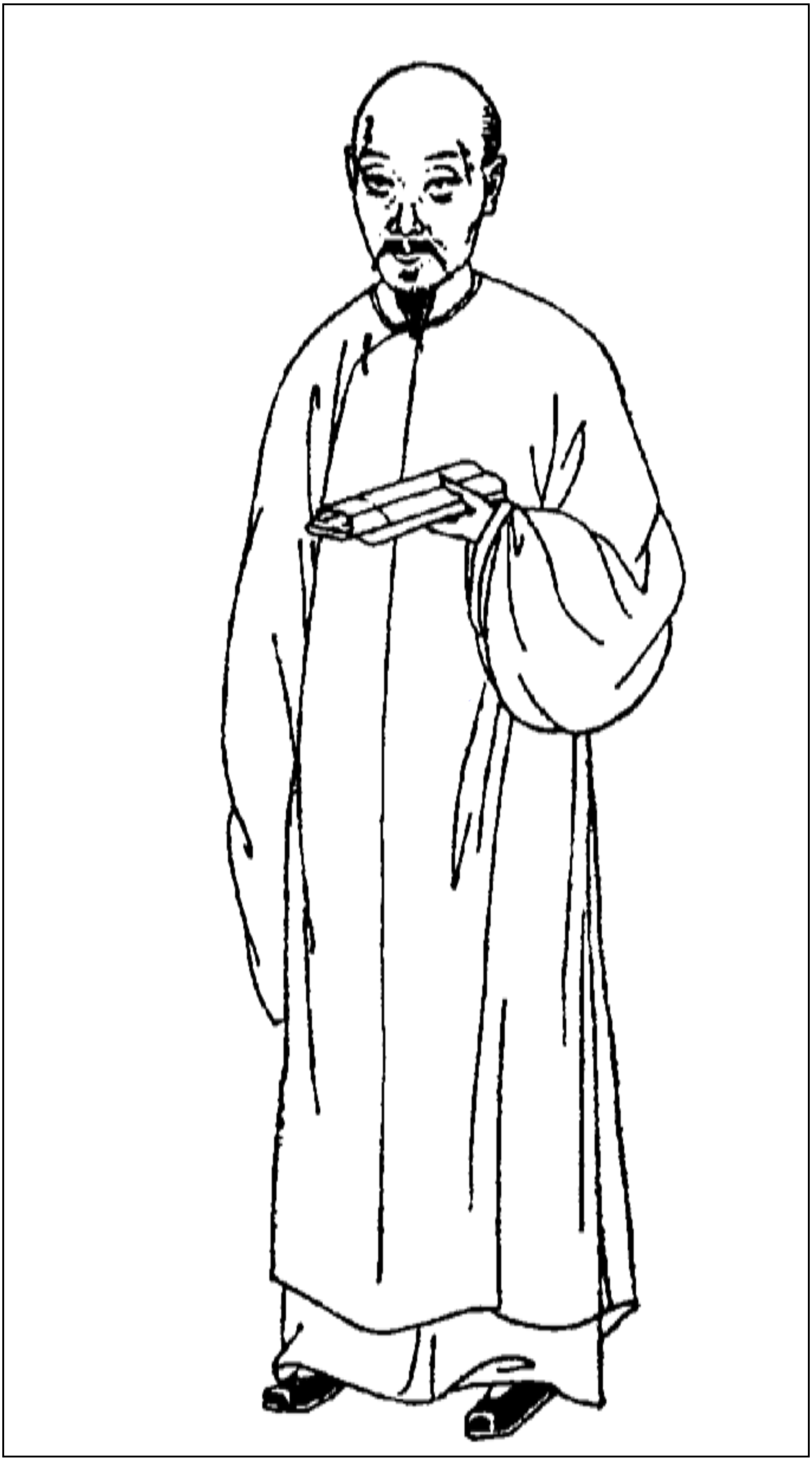
黃景仁（1749—1783），字仲則，江蘇常州人，少孤寒貧窮，依靠寡母撫養成人，雖然天才橫溢，於學無所不窺，卻屢次見擯於有司，始終是個窮秀才，使他不得不奔走四方爲稻粱之謀，也還是到處碰壁，所逢都是逆境。甚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平定金川告成，乾隆東巡還京，黃仲則到天津去獻賦，被錄取在二等，像這樣的召試盛典，所得的恩澤僅僅授爲武英殿書簽官，官卑祿薄，難贍家室。勉強挨過二年，才算按例得到一個主簿的末秩，他加捐了縣丞，而且還得在京中候選。縣丞是縣裏的佐貳官，俗稱“二老爺”，是士大夫所不屑爲的微職，他實際上還是沒有一天補過缺。但是上下千百年間，提到“黃二尹”，誰都知道指的是黃仲

則，這個卑官末秩的別稱竟和“杜工部”、“韓吏部”同樣成了他的專利，官以人傳，倒不一定要高官顯爵才能有此。

仲則不是沒有朋友和賞識他才華的大人物，可是他生性耿直古怪，與人多忤，所以誰也無法提拔和救濟他的貧困。他的朋友都是當世知名的詩人文士，可他和誰都格格不相入，他曾說道：“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那麼剩下的一人是誰？便是他的生死知己朋友洪亮吉（稚存），洪亮吉也同樣的窮，兩人只能相濡以沫，都在困境中打發日子。

賞識他的大老中，有擔任安徽學政的朱筠（竹君）和陝西巡撫畢沅。朱筠延他入學政幕閱文，非常器重他，他卻看不慣同事們的作爲，憤然不別而去。畢沅經洪亮吉的揄揚，看到他的《都門秋思》詩“全家都在風聲裏，九月衣裳未剪裁”。以爲此詩足值千金，姑先寄五百金，速其西來，這也不可不謂詩的知己了。五百金不是小數，但他歸還宿逋殆盡，行至山西運城，便病發在蕭寺中，年僅三十五歲。萬里歸櫬常州，還得靠畢沅的幫助和洪亮吉的照料，詩人遭遇之窮和賦命之薄，千古同慨。畢沅字秋帆，狀元出身，久任封疆，頗有貪墨之名，身後被籍沒家產，但愛才好士，對黃仲則的慷慨解囊，則不是一般俗吏所能做到的，因此後世爭傳畢沅有此豪擧而忘卻其財物之所由來了。

黃仲則處在乾隆盛世，受到委屈的待遇，從而看出這個盛世的背後，竟是一片黑暗，社會經濟正在兩極分化，上層階級搜括聚斂，下面老百姓啼飢號寒，過着不



黃景仁的詩作飽含自身的辛酸



黃景仁佚逸手迹

可終日的日子，他當然不會參加川楚七省的教民大起義，只能在詩中暴露自己看到的周圍實況，也足以使他成爲一個盛世的不平的詩人了。

黃仲則有天才，重性情，不屑爲繁瑣的餖飣之學，他的詩除了暴露盛世的黑暗面之外，還有不少綺懷之作，那些作品，都是敘述他個人的戀愛故事，有着眞摯的感情和眞實的事迹，所以不同那些刻意虛構編造、專以詞藻爲工的香奩體，讀之令人迴腸蕩氣。

《兩當軒集》中保存了不少那樣抒洩情懷的佳作，如《感舊雜詩》之四云：

> 非關惜別爲憐才，幾度紅箋手自裁。湖海有心隨穎士，風情近日逼方回。多時掩幔留香住，依舊窺人有燕來。自古同心終不解，羅浮塚樹至今哀。

又如《綺懷》十六首之第十五云：

> 幾回花下坐吹簫，銀漢紅墻入望遙。如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纏綿思盡抽殘繭，宛轉心傷剝後蕉。三五年時三五月，可憐杯酒不曾消。

像這些詩是道學先生所不能看入眼中的，而且他的行爲做事也有些放誕不經。據說在京師日時常和優伶們混在一起，甚至粉墨搬演，尤爲正人君子所指摘側目，這正和明時楊愼謫居在云南時一般，才人失志，借此發洩牢騷不平之氣，他對當時社會已不存什麼希望了。

他身後的詩，首先被選擇刊印的《悔存詩鈔》，是提倡肌理詩說又工金石考據的大學者翁方綱，他把仲則所遺下和當時可以尋找到的一千多首詩中僅選錄半數，“凡涉綺語及飲酒諸詩皆不錄入”。翁方綱雖是仲則的朋友，但兩人的觀點格格不相入，由翁方綱來操選政，自然堅持他的觀點，這對仲則的作品無異是一種苛待。幸而後來他的孫子黃志述妻子吳氏，爲了保持先人遺作的全貌，節衣縮食，費了十多年的時間，嘗盡苦辛，才刊成《兩當軒全集》流傳至今。

糊塗詩人鄭燮

鄭燮（1693—1765），字克柔，號板橋，尤善書畫，皆自成風格。他存年七十三歲，經歷過康、雍、乾三朝。他膾炙人口的一顆閒章“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正說明了他是跨越清詩春夏兩季的詩人。他不過中了進士，成爲“七品官耳”的縣太爺，聲名才大起來，所以和沈德潛一樣，把他納入夏季詩人的行列中。

鄭燮和黃景仁一樣，在衆多的夏季詩人中，他是一個別具一格的怪傑，不與人同。他不屑和他人一樣，在盛世中歌頌昇平，他來自民間，深識人民的疾苦，而且當了親民之官，更覺得人民之可親，又篤於戚友昆季子姪之愛，使他的詩富於人情味，通俗易曉，娓娓道來，如親朋互訴衷腸，所謂“樂親朋之情話”，確是那個時代不可多得的民間詩人。

他還是一位有名的畫家，他是江蘇興化人，興化屬揚州府轄，在那時的揚州，在全國是首屈一指的繁華之區。世人所稱道的“揚州八怪”便在那時聚集在揚州，他們中其他七人是李鱓、金農、高翔、汪士愼、黃愼、李方膺、羅聘，板橋居八人之首①。他們的作品，儼然與當時正宗的江南畫派相抗衡，到後世他們的聲譽更超越那些正宗派畫家而上之，這和他們的詩一樣。

板橋擅詩、書、畫的“三絕”，所以他的畫格外受

人推崇，舉一而三美備。他雖然訂了賣畫的潤格，而且聲明不給潤金便不要來討他的畫，但也決不以畫和詩來取媚世俗、阿附權要，只要看他在做濰縣知縣時候送給他的頂頭上司山東巡撫一幅墨竹的七絕：

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那位接受板橋詩畫的大官僚看了不知作何感想，想來總不大好受，而板橋的七品官終於做不下去。

他的詩歌來自民間，也爲民間而歌唱，不需徵引原詩，只要看看題目，如《悍吏》、《私刑惡》、《逃荒行》、《孤兒行》、《姑惡》等詩，都是當時社會普遍現象的縮影，那些詩題決不會登上盛世詩人的集子，因此可見板橋畢竟是一位具有天良的“怪人”，不是那些昧着良心的詩人懷着追求富貴利祿去歌頌昇平。此外，他還創作了大量人們所不屑一提的民歌謠諺，給後人留下豐富的俗文學遺產，如出名的道情和竹枝詞。

板橋的詩風雖如此，但他對一些詩風迥異的古代作家其實是下過苦功夫的，例如他曾經手批的朱鶴齡箋注《玉溪生詩集》，密密麻麻寫滿了眉批、夾批、篇批，見解既精辟，字跡又娟好。看題跋知是板橋於四十多歲公車北上在途中披閱的。李商隱詩的作風可說和板橋的詩風絲毫不相干，但他確是對之下過一番功夫，可見“轉益多師是吾師”，他是在研究唐、宋諸大家的詩之後才創造自己作風的，決不屑人云亦云。

板橋自序其詩，以爲和鄰省的吳嘉紀相似，吳嘉紀



「揚州八怪」之首——鄭燮



鄭燮的《蘭竹圖》軸

是清初著名的鹽筴詩人，專寫徐、海一帶鹽民生活痛苦的民間詩人，板橋說自己似吳嘉紀，說“陋軒詩最善說窮苦，惜其山水不多，接交不廣，華貴一無所有，所謂一家言，未可爲天下才也。板橋詩如《七歌》，如《孤兒行》，如《姑惡》，如《逃荒行》、《還家行》，試取以與陋軒同讀，或亦不甚相讓；其他水山、禽魚、城郭、宮室、人物之茂美，亦頗有自鑄偉詞者。而又有長短句及家書，皆世所膾炙，待百年而論定，正不知鹿死誰手”。他要和吳嘉紀比一高下，的確，吳的名姓已不大爲人所知，而板橋的大名，不但國內婦孺咸知，即使東瀛人士，亦奉板橋詩畫爲瑰寶。

板橋的詩寫實，抒胸臆，不主張模擬仿效，自然詩風與性靈派爲近，但他和性靈詩說的創造者袁枚卻從未謀面。或訛傳袁枚去世，板橋爲之頓首痛哭，可見兩人同聲相求，他們的詩風有着同一淵源。

---

① 一說有閔貞、高鳳翰，無李方膺、高翔。

後　記

寫這本小書而用這個書名，其理由大致已見於本書第一篇《代序》，但還有些不盡的餘話要說。

《淸詩的春夏》這書名，自不及“淸詩的春秋”之響亮，但“春秋”兩字，除了表明一年四季的時節之外，還有批評的意義；而“春夏”則除了時節本義之外，別無他義，這正好合乎我寫這本小書的意圖。

我寫此書，只是寫寫淸代自順治朝迄乾隆朝一百多年中詩人的故事，雖然間亦涉及詩與詩論，但都是很膚淺通俗的文字，談不上什麼對淸詩的理論和批評有什麼見解，只是供詩的愛好者消遣和作爲談助的文字而已。而且寫作也沒有一定範圍，想到便寫，涉筆所至，有時不免“跑野馬”，讀者只好當它“漫話”便了。

謹用此書紀念逝去的兩位故人：法學家兼文學家吳經熊先生啓發我寫這本小書；不幸早世的天才學者徐誠斌先生，因爲他翻譯吳先生的著作，在今天勾起我們往日的誠摯的友情。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读书中文网
www.rbook.net

觀者 OCR、校對
2009 年 2 月 21 日星期六
22:36:20
ljctt@263.net